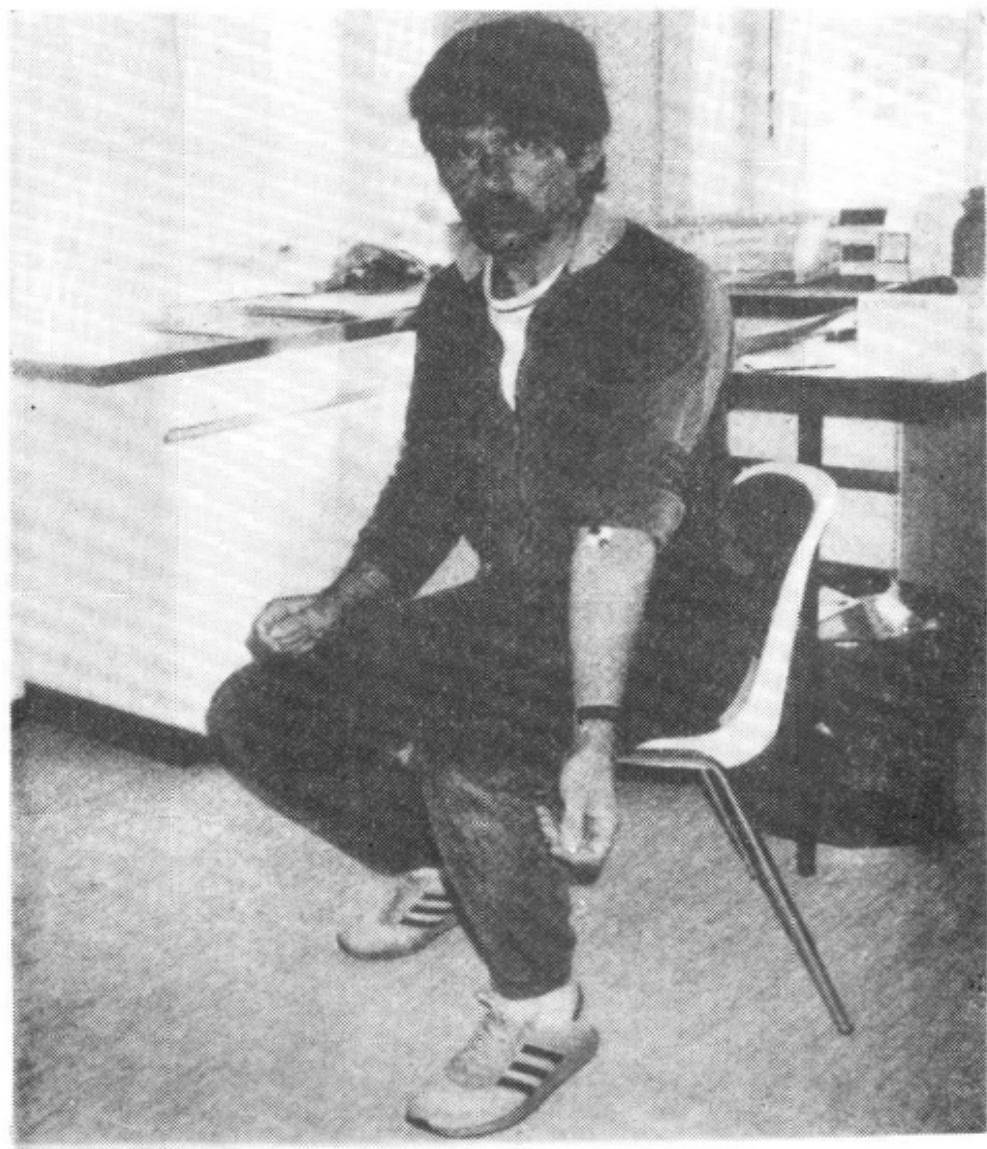


「阿里」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阿里」充当药物试验品

“阿里”在打扫厕所  
时的情景



为「阿里」题辞

施特劳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 译者的话

1985年10月，一本新书轰动了联邦德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爆炸效果。这本书出版后头两周就售出64万多册，创联邦德国乃至世界图书销售速度的最高纪录。这至1987年2月底，德文本的发行量已超过230万册。许多国家竞相翻译出版。这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就是冈特·瓦尔拉夫的长篇报告文学《最底层》。

冈特·瓦尔拉夫是联邦德国著名作家。1942年10月1日，他生于科隆附近一个工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当过书店学徒，最初写诗在报刊上发表。1964至1965年到几家大工厂去当工人，写出了第一批报告文学作品，辑成一集名为《我们需要你》（1966）。他当过记者和编辑，一再化名深入社会底层，把局外人不易了解的现实生活中违反人性、违反自由、进行残酷剥削压迫的种种事实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先后发表了《13篇不受欢迎的报道》（1969）和8篇《新报道》（1972），震动了社会。瓦尔拉夫从此成为著名的报告文学家。1973年，他与恩格尔曼合作写成《你们在上面——我们在下面》，揭露了权贵豪富生财之道的内幕。1974年，他到希腊参加反对军事独裁政权的斗争，遭到拘捕，在各国进步人士的声援下，直到希腊军政府倒台才获释。这段经历被写入《我们的法西斯主义在邻国》（1975年与斯波合作）一书。1977年，他又化名汉斯·艾塞尔，到联邦德国的《图片报》汉诺威编辑部工作了三个月，将了解

到的报社内情写成《头条标题》一书，又一次引起了轰动。该书出版后，《图片报》向法院控告他犯有“伪造证件罪”。最后这场官司以宣布瓦尔拉夫无罪结束。

1983年春，瓦尔拉夫化名阿里·西尼尔利奥格鲁，使用黑色假发，戴上深色隐形眼镜，改说一口结结巴巴的德语，以此冒充土耳其人，深入社会最底层达两年半之久。“阿里”到联邦德国的工厂和农村劳动，充当试验新药效用的试验品，历尽磨难，亲身经历了外籍劳工在联邦德国这个“福利社会”的悲惨遭遇，写出了震撼人心的杰作《最底层》。

为了取得有说服力的视听材料，“阿里”经常身背挎包去劳动。挎包里的暖壶是伪装的摄像机，另外还带有录音机，把许多场面都录制下来。如今，《最底层》的电视片已在联邦德国公开放映。瓦尔拉夫还请朋友拍了不少有关照片。

《最底层》问世后，举国轰动。许多报刊和电视台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许多工人为了购买此书第一次走进书店。广大外籍工人更是奔走相告，争相阅读。不少工会组织连日举行群众大会，请瓦尔拉夫前去讲话和朗读作品，以此推动争取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群众性斗争。一些大厂家在这种形势下也作出姿态，表示今后招工要优先录用那些充当“租赁工”的外籍工人。一部文学作品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果，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瓦尔拉夫步入文坛后曾多次因大胆揭露社会阴暗角落而受到攻击，曾被控犯有滥用职权罪、伪造证件罪、假冒姓名罪、诽谤罪、污辱罪等，但在著名作家伯尔等人的支持下每次都化险为夷，被宣告无罪。这一次《最底层》的出版，他也早已料到会遇到种种法律纠纷。受到揭露的两名人贩子雷梅特和伏格尔（书中易名为阿德勒）气急败坏，扬言要控告作者，但不

久之后就悄无声息了。雷梅特被暂时拘留，伏格尔作了交代。据杜伊斯堡检察长奥托声称，伏格尔的交代“与证人瓦尔拉夫的证言相符”。蒂森钢铁厂则向法院起诉，要求删除该书中涉及该厂的七点内容。在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期间，厂方一再向有关工人施加压力，阻挠他们出庭为瓦尔拉夫作证。1987年2月23日，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提出的七条中的五条，只有两条（即蒂森长期以来裁减基本工人和不向工人提供劳保用品）今后该书再版时须修改，已出版的书仍可继续发行。判决宣布后双方均表示不服，准备上诉。看来这场官司还要进行下去。

瓦尔拉夫不仅以自己的作品帮助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外籍劳工，他还把本书稿费的一部分170多万马克以及参加工会等举办的讲演活动所得的全部收入捐给新成立的外侨团结基金会。该基金会准备用这笔款子和其他方面的捐助（如出版《最底层》的基彭霍伊尔—维奇出版社也表示要捐助一大笔款项）来帮助外籍侨民克服困难，并在杜伊斯堡一个比较幽静的地区修建可供300名德国工人和外籍工人共同使用的住宅。鉴于他的义举，罗素道德法庭把他列为1985年的世界善人。

《最底层》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首先是因为作者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使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阅读小说，固然可以从虚构的艺术形象得到启发，受到感染，但优秀的报告文学更能猛烈冲击读者心扉和震撼社会情绪。真实的作品自有真实的魅力。其次，作者所选取的题材——外籍劳工在联邦德国的遭遇和德国人的排外情绪——虽然并不新奇，但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作者不是简单地报道事实，而是探索事实背后的社会原因；不是揭露个别人和

事，而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抚读之余，心潮澎湃，不能不使人掩卷思考。第三，情节曲折动人，真实可信。作者提供了许多详尽细节，有些部分直接采用对话形式（甚至学着外籍工人的语调），使人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第四，作家使用的语言通俗明了、简洁含蓄，没有耸人听闻、言过其实的渲染，也没有讽刺挖苦、哗众取宠的议论，却闪烁着新鲜活泼、幽默机智的火花；他的一言一语都使人感到作家的严肃工作态度和强烈的爱憎感情。最后，作家乔装私访的传奇色彩，也对读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不畏艰险，历尽磨难，深入基层，亲身参与其事，获得第一手材料，因此，他的作品总能受到密切注意，产生强烈影响。这也是别的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的。

1987年3月30日于北京

# 目 录

变形 .....	1
彩排 .....	4
初试 .....	6
精神原料 .....	11
“吃得香” .....	15
工地 .....	24
改变宗教信仰 .....	35
人间乐园 .....	55
殡葬 .....	61
活地狱 .....	67
情况紧急 .....	79
“最好是：什么也听不懂” .....	83
工间谈话 .....	86
梅赫梅特的苦难历程 .....	92
天下乌鸦一般黑 .....	96
嫌疑 .....	98
油漆栏杆 .....	104
犹如美国早期西部地区 .....	107
尤克萨尔的愤怒 .....	110
应急淋浴 .....	116
沉重如铅的肢体 .....	120

一次得病，贻害终身.....	122
试验 .....	123
W充当试验品 .....	123
晋升 .....	134
职工大会 .....	149
辐射 .....	170
核电站癌症发病率高 .....	178
代办业务 .....	179
尾声 .....	208



## 变 形

我早就想扮演这个角色，后来一拖就拖了10年，因为我已料到自己将会遇到何种情况。我真有点怕。

我从朋友们的叙述和许许多多出版物中了解到外籍侨民在联邦德国的生活情况。我知道，几乎有一半外籍青年患有精神病。他们再也无法领悟那数不清的种种苛求。他们在劳工市场上希望渺茫。他们是在我们这儿长大的，已不可能真正返回自己的故土。他们没有祖国。

行使避难权的条件变得很苛刻，排外情绪高涨，外国侨民越来越孤立于社会之外——这些我都知道，但从未亲身体验过。

1983年3月，我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外侨，体格强壮，寻找工作，累活脏活都干，不计报酬。请与358458号联系。

为了脱离正常生活，成为受排斥的少数中的一员进入社会最底层，这并不需要很多东西。我向一位眼镜专家定做了一副昼夜都可以使用的深色隐形眼镜。“现在您目光炯炯，象个南欧人。”眼镜商感到惊讶。通常他的顾客只要蓝眼睛。

我的头发已变得稀稀拉拉，于是我便戴上黑色假发，顿时便年轻了许多，这样我就可以冒充26岁至30岁的人，找到各种工作；如果说出我真实年龄——我已有43岁——是不可能找到那些差事的。这样一打扮，我显得更年轻、更精神、更有劲

了，但与此同时，我也成了局外人，变成一堆臭狗屎。我在变形期间讲的结结巴巴的德语，根本经不起推敲，手法并不高明；凡是认真听过客居我国的土耳其或希腊侨民讲话的人，其实都能发现我的破绽。我只是去掉几个尾音节，变换一下句子结构，或者经常干脆讲不太熟练的科隆方言。这样效果反倒更佳，没有一个人怀疑过我。这几招雕虫小技就已绰绰有余。我乔装改扮后，人们就直截了当、毫不隐讳地向我表明他们对我的看法。我装傻，使我得以洞察这个自以为明智、优越、完美和公正的社会的偏狭和冷酷。我当了人们对我实话实说的傻瓜。①

诚然，我并非真是土耳其人。但是，为了撕下这个社会的假面具，就必须乔装改扮；为了弄清真相，就必须改头换面，弄虚作假。

时至今日，我始终不明白外籍侨民如何能够忍受司空见惯的屈辱、敌视和仇恨。但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不得不忍受什么，对人的蔑视在这个国家究竟达到了何种地步。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种族隔离。我所经历的一切比我原先所想象的还要坏。本来只有在历史书上才能看到的19世纪社会的情况，今天我在联邦德国经历到了。

虽然活计又脏又累，使人筋疲力尽，虽然我亲身领略了对人的蔑视和屈辱的滋味，使我身心受害，但这也以另一种方式充实了我的心灵。我在工厂里和工地上——不同于在《图片报》编辑部工作期间——赢得了朋友，得到了团结友爱。由于安全的原因，我当时不能向这些朋友暴露身份。

---

① 德国有一句谚语叫做：“只有傻瓜才说真话。”——译注

现在，在本书出版前夕，我向几位朋友透露了我的秘密。没有一人责怪我乔装打扮。相反，他们对我完全理解，而且也觉得我在扮演我的角色时的所作所为是有益的。尽管如此，为了保护我的伙伴，本书不得不对他们的姓名大部分作了更动。

冈特·瓦尔拉夫

1985年10月7日于科隆

## 彩 排

为了检验我的化妆是否也经得起挑剔的目光，我的外观是否合适，我前往平时常去的几家酒馆。我没有被人认出。

尽管如此，我仍无绝对把握，可以放心大胆地干起来。我一直还在担心会不会在关键时刻被人识破。

1983年3月6日晚，选举结果使政局发生变化<sup>①</sup>，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的头面人物和从这次选举中获得好处的人在波恩康拉德·阿登纳之家欢庆胜利。我乘机进行了彩排。为了不至于在大门口就引起怀疑，我手提一盏铁灯，尾随着电视摄影组混了进去。会场挤满了人，聚光灯把大厅的每个角落照得通明。我身穿自己仅有的一套已穿了15年的深色西服，站在会场中央，用我那盏破灯轮番给那些名流照明。有几名官员觉得事有蹊跷，便问我是哪国人，大概是为了肯定我和伊朗人扬言要进行的暗杀活动无关。一位身穿豪华晚礼服的太太用蔑视的眼神瞅着我问：“这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一个上了年纪的官员模样的人说：“这是国际性活动。连高加索人也来庆祝。”

我和那些头面人物混得很熟。我向库特·比登科普夫<sup>②</sup>作自我介绍，说我是土耳其法西斯分子领导人图尔凯什的特

① 指在联邦德国执政13年的社会民主党下台，基督教民主联盟上台。

——译注

② 联邦德国政治家，1973—1977年曾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干事长。——译注

使。我们兴高采烈地谈论基民盟的选举胜利。劳动部长诺贝特·布吕姆作出各国人民大团结的姿态，主动挽起我的胳膊，一面扭摆，一面和别人放声高歌：“象今天这样的日子多么美好。”

科尔<sup>①</sup>发表祝捷演说时，我走到离讲台很近的地方。当他向他自己和手下人尽情欢呼后想要走下讲台的时候，我差一点打算扛起他穿过大厅，让人们向这位欢欣鼓舞的胜利者欢呼致意。但是，为了不被这位总理的庞大身躯所压倒，我放弃了这一打算。

为数众多的保安人员并没有看穿我的伪装，他们全都经过专门训练善于识破伪装。现在，经过这次测试之后，我减少了对面临的艰难的担心。我觉得更有把握、更有信心了，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我将会遇到的许多人中会有人认出我。

---

<sup>①</sup> 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联邦德国现任总理。——译注

## 初 试

启事登出后，我真收到了几个“招聘”通知：几乎全是脏活，每小时工资在5至9马克之间。没有一个是长期的。我对有些工作作了体验，同时也检验了我所扮演的角色。

例如，有一次在科隆郊区一个别墅区修缮马厩。我（阿里）搞的是“空中作业”，也就是说我得站在脚手架上油漆顶棚，每小时工钱7马克。另外几个干活的是波兰人，都是打黑工<sup>①</sup>的。他们都不理我，不知是语言不通呢，还是不愿和我交谈。女主人还经营一家古玩店，她也尽量避免和我（阿里）接触，只是寥寥数语：“干这活，快干，快！”我自然也和别人分开，独自一人在马厩里吃饭。唯一愿同我交往的是只山羊，它啃我的塑料袋，吃我带去的黄油面包。

有一天，这家的警报系统出了毛病，罪魁祸首自然是土耳其人。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最后叫来了刑事警察。警察也怀疑是我（阿里）干的。不理不睬变成了公开的敌视。几周后，我只好辞职不干了。

我的下一站是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农场，位于格龙德核电站附近。女农场主和她的女儿都是东方难民<sup>②</sup>，她们独自经营这个农场，如今又需要一名男劳力。她们从前曾雇佣过一个土耳其帮工，因此知道怎样和土耳其人说话：“我们不管你

① 指的是没有劳动许可证，私下里干活，工资不纳税。——译注

②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东欧地区逃往西欧的人。——译注

过去干过什么。哪怕你杀过人，我们也不想了解。最主要的是你得干活。干活就可以在我们这儿吃住，还给你零花钱。”

零花钱我可没有见着，每天却得干10个小时：挖荨麻，清除水沟里的淤泥等等。至于住处，我甚至可以自己挑选。女主人让我挑选：一处是停放在她房子前面的一辆生锈的旧车，一处是一个坍塌的臭烘烘的马厩，这里面还住着一只猫。我接受了第三种选择：在一个已被撤除的工地上有一间工棚，地上还堆满断砖碎瓦，并且连一扇关得上的门也没有，虽然在女主人住的房子里还有几间温暖洁净的房间空着。

我（阿里）得躲开邻居，别让人骂这个农场是个“土耳其窝”。我（阿里）被禁止在村里露面，既不能去商店购物，也不能上酒馆喝酒。我象牲口一样被圈着，而女主人却认为这是基督徒的善行。她对我这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竟然体贴到如此程度，甚至答应送我几只小鸡，由我自己把它们养大，因为我不能吃猪肉。这种大慈大悲使我不久就逃之夭夭。

将近一年左右，我就这样依靠五花八门的工作糊口。假如我真是阿里，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而我确实是什么工作都肯干的，比如我曾为伍珀塔尔市一家大酒店和电影院更换座位，帮助修缮酒吧间；在胡苏姆市鱼加工厂铲过鱼粉；也曾在巴伐利亚州施特劳宾街上演奏手摇风琴。我演奏了好几个小时，没有人给我一分钱。

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排外情绪早已司空见惯。如果不遇到这种敌意，反倒会使人感到奇怪。孩子们对这个在街头演奏手摇风琴的古怪叔叔十分亲切，他的风琴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土耳其人，无业，在德国11年，想留下。谢谢。”孩子们往往不肯离去，直至父母把他们拽走。后来还有一对街头艺人在施特劳宾市场广场上正

对着我摆摊售艺。他们也有—架手摇风琴。他们邀请我——他们的竞争者——到他们的流动演出车上去做客。我们度过了一个十分美好的晚上。

但是，很多时候却并非那么愉快。例如，在狂欢节那一天，我正在雷根斯堡。任何一家德国酒馆都不必在门口挂出“不欢迎外国人”的牌子。无论我阿里走进哪一家酒馆，都没有人理我，我什么也买不到。因此，当我在雷根斯堡一家挤满狂欢的基督徒的小酒店里听到有人大声招呼我时，我真感到意外。有一名顾客对我喊道：“你请大家喝一杯！”“不，不，”我（阿里）答道，“你们请我喝一杯。我没有工作，从前给你们干过活，为你们的养老金作过贡献。”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气得脸红脖子粗（施特劳斯也经常如此），怒冲冲地向我扑来。要不是酒店老板怕自己的家什被损坏，赶紧前来把他拉住，我就非挨揍不可了。后来那个喜怒无常的巴伐利亚人被几位顾客连推带拉地拖出了酒店。在此期间，有一个人（事后他自称是当地的大人物）镇静地坐在桌旁，若有所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见此人猛地拔出一把刀子，插进桌子，大声吼叫，要我这个“土耳其脏猪”快滚开。

尽管如此——这种狂怒的场面我很少遇到。更可怕的却是我（阿里）每天都受到几乎冷冰冰的蔑视。在挤满乘客的公共汽车上，自己身旁明明有着空座，可谁也不愿来与你并排而坐，这种事真令人痛心！

既然谈得很多的外侨一体化在公共汽车上都难以做到，于是我便同一位土耳其朋友一起，想要试试看能否至少在一家德国酒馆里设一个“Turk Masasi”<sup>①</sup>。我们打算不定期地经常在某一家酒馆里会面，在桌子上插上自制的一面小旗，用

<sup>①</sup> 土耳其语：土耳其人专座。——译注



两种语言写上：“Serefe! ① 祝你健康!” 我们向酒馆老板许愿一定要多吃多喝。没有一个——我们问了好几十家酒馆——肯向我们提供一张桌子。

我的 27 岁的同伴奥特甘·厄兹蒂克已有 15 年这种经验。他来联邦德国时只有 12 岁，现在他说德语几乎不带口音了。他长得很帅，为了隐瞒自己的出身，甚至把头发都染成了金黄色。可是这些年来，他没有能和一个德国姑娘交上朋友。只要他一提自己的名字，那就全完。

外籍侨民一般没有受到辱骂，至少他们听不到。人们喜欢在背后埋怨他们身上所谓大蒜气味。其实，今天德国美食家吃的大蒜远远超过大多数土耳其人。土耳其人至多只是在周末才敢于享用一瓣有益健康的蒜头。他们脱胎换骨，为了被人接受。但是，接触的障碍依然如故。

可是，德国酒馆也有优待外籍侨民的时候，如果服务员也是外侨的话。我曾在科隆居尔策尼希区一次盛大的狂欢节集会上有过这种经历。作为土耳其人，能参加那次盛会，我已感到受宠若惊。后来，当我又受到南斯拉夫服务员特别和蔼的招待时，我（阿里）几乎得意忘形，一直到开始唱摇摆歌。我坐在狂欢的人群之中，犹如一块岩石立在滚滚波涛之中。没有一个人肯与我手挽手。

排外情绪有时也会公开爆发。在国际足球比赛时几乎常有这种事。1983 年夏，德土两国在西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足球赛。赛前几周，人们就已担心会出事。里夏德·冯·魏茨泽克② 在电视上简直象是在向西柏林市民苦苦哀求：“要

① 土耳其语：祝你健康（敬酒时用语）。——译注

② 魏茨泽克当时为西柏林市长，1984 年后任联邦德国总统。西柏林是土耳其侨民比较集中的地方。——译注

使这场德土足球赛成为我市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和睦相处的象征，成为各国人民谅解的明证。”为此出动了空前未有的大批军警。

我（还是阿里）也想观看这场比赛，便买了一张入场券，位子在德国观众区。本来我并不打算隐瞒自己的土耳其人身份，甚至还带去一顶带有蛾眉月<sup>①</sup>的土耳其小圆帽和小纸旗。但我很快就把这两样东西藏起来了。我的位子正好在一群年轻的德国新纳粹分子当中。何谓新纳粹分子？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是个好人，大多数人都长着坦率而讨人喜欢的面孔，可是一到了这群人中间，这些面孔便变成了狂热的面具。这一天，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心惊胆战地否认自己是土耳其人，甚至还丢弃我那结结巴巴的用语，用标准德语同那些狂热的球迷交谈。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把我当成外国人，把烟头往我头上扔，把啤酒浇在我头上。在我这一生中，跑过来的警察还从来没有象这一次叫我感到放心；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确实目睹他们是维护秩序的力量。“胜利万岁！”“消灭红色阵线！”的呼声此起彼落，还有人不断怪声怪调地齐声高呼：“土耳其人从我国滚出去！德国是德国人的！”幸而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受伤人数并不比“正常的”国际比赛多多少。如果德国队输了这场球，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就难说了。我完全谈不上是个足球迷，可是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我却给德国队加油助威——由于恐惧。

---

<sup>①</sup> 土耳其国旗上的蛾眉月为伊斯兰教的标志。——译注

## 精神原料

在帕绍圣灰星期三<sup>①</sup>的喧嚣中，阿里在7000来宾面前与基督教社会联盟(以下简称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在一起——不知一个吉卜赛人参加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纳粹党人集会时，是否有过类似感觉。我至少有所感受。阿里始终是人们避而远之的麻疯病人。

帕绍，晨9时。我用不着去找尼伯龙根大厅，施特劳斯的信徒——其中有许多非巴伐利亚人——正从各条街道上向大厅涌去。11点钟，施特劳斯要宣布他的“政治圣灰星期三”开始。在这两小时之前，长桌前的长凳上都快坐满了人。这时巨大的厅堂内已经烟雾弥漫，在场的人大概都已有两三升啤酒下肚了。鱼和干酪的需求量很大。今天是四旬斋期<sup>②</sup>的第一天。

我(阿里)向着寥寥无几的空位走去。还在我勉勉强强在长凳的尽头坐下之前，我的邻座抢先大大扩充了他的地盘。接着他又这样向我表示欢迎：“哎，老兄，这是啥地方？连这儿也甩不掉那帮王八蛋。难道你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

从四面八方向我投来不友善的目光。我左边那位天主教治的公民唇角流着啤酒，他已经灌足了。我极力创造良好的

① 狂欢节后的第一天，也是四旬斋期的开始。按教规要把圣灰撒在忏悔者头上。——译注

② 复活节前的40天，在此期间教会禁止肉食。——译注

气氛：“我是你们施特劳斯的好朋友。他是个强人。”回答是哄然大笑。“咳，你们听到没有？他说他是施特劳斯的朋友。这可太妙了！”直至一位身体丰满的女服务员走来，他们这才放过我。女服务员穿着敞胸露怀的民间服装，尤其是那液体面包更使他们感兴趣。

此时我也很想来一口啤酒，可我什么也得不到。服务人员不理我，于是我就自己去柜台，可那儿也不卖酒给我。在第三次试探之后，售酒的服务员向我吹胡子瞪眼：“走开，快给我滚！”

这时施特劳斯已在巴伐利亚列队进行曲的鼓号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进入大厅。工作人员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为他开辟一条通往讲台的道路，他的夫人玛丽安娜已在台上等候。尤其是那些非巴伐利亚人高举他们的大幅标语（“我们派纳人<sup>①</sup>第七次来此”），又唱又嚷。

基社盟领袖的开场白还是在闹哄哄的声音中开始的。他讲了三个小时。在群情激奋的这种场合，很难听清他讲些什么。讲话的逻辑性也只是在三升啤酒下肚后才能这样归纳出来：“我们是有才智的人的政党，我们拥有有才智的选民阶层，因此我们在本州也占多数。要不是我们的选民这么富有才智，我们就不会占多数。”掌声雷动，顿足喝采，全场沸腾。

厕所已容纳不下拥挤的人群，许多人急不可待，过道里尿水汇成涓涓细流，会场里也有人尿在裤裆里。

台上的那一位大谈特谈精神：“感谢上帝给了我们精神原料，尽管有些重新分配官员<sup>②</sup>在胡说八道，但我们要更好地使用我们的精神原料。”

① 派纳是下萨克森州一城市。——译注

② 这里影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干部。施特劳斯攻击他们对脑力劳动不够重视。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译注

可是，目前首先得把那些喝得已动弹不了的酒鬼重新分配一下。医务人员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得把他们抬走。桌上放着党的宣传材料：《我们和我们的党》。这是基社盟支持者的自我表白。如一位肥胖的食品商写道：“我从未有过情结<sup>①</sup>，因为我是个右派。不知还有什么政党能比基社盟更适合于我了。这个党很合我的心意，正如施特劳斯也合我心意一样。他的形象也讨人喜欢。我们长得很象。要是说还有什么事情使我感到激动的话，也许除了足球之外，就是缴税了。”

使他激动的或许还有个土耳其人，此人在蓝白色尼伯龙根大厅内口渴起来。我(阿里)不得不采用近乎偷偷摸摸的手法搞到一升啤酒。乘着柜台后面服务员不留神的时候，我放下五马克，端起啤酒就走。施特劳斯正在大发宏论：“我们必须重新想到正常公民、正常男人、正常女人，而不是想到少数怪人。”后来他又谈到“无名人群的大杂烩”，他要“保持”“民族特性”，这时我明白，他在鼓吹“德国人人都有自由和尊严”时，并没有把我阿里包括在内。

我想重新坐下。还有两个空座，虽然会场已十分拥挤，我旁边的座位始终没有人来坐。“这人有大蒜味。”——“你的，土耳其人？”

那个“幸福的巴伐利亚人”(施特劳斯自称)终于结束了他的四旬节讲话。他的崇拜者坚持了五六个小时。退场时戒备森严，无人能接近他。签名要求也不能满足，至少不在当场满足。凡是想得到他签名的人可以写一张条子扔到会场的纸筐

---

① 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概念。指被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如弗洛伊德根据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误犯杀父娶母罪的故事，称男孩爱母憎父的本能愿望为“俄狄浦斯情结”。——译注

里。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出办法去会见这位巴伐利亚领袖。办法十分简单。

我自称是土耳其法西斯党头子、“灰狼”组织领导人图尔凯什的特使和观察员。这个图尔凯什对希特勒顶礼膜拜，数年前曾在慕尼黑秘密地会见过施特劳斯。据图尔凯什讲，当时施特劳斯曾向他保证：“将来联邦德国会通过适当的宣传为（土耳其）民族主义行动党和‘灰狼’创造有利的政治气候。”图尔凯什狂妄地叫嚣：“消灭一切臭犹太人、共产党杂种和希腊狗！”

我作为图尔凯什的代表立即被施特劳斯召见。他亲切地向我表示欢迎，象个有权有势的教父对从外省来的穷亲戚那样拍拍我的肩膀。他在《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大画册》纪念册上为我亲笔题辞：“阿里留念——弗·约·施特劳斯敬赠。”

在场的摄影记者们抢拍了这一镜头。

这本精美画册的前言中说，施特劳斯是“在履行其天职（天命？）的过程中成为政治家”的。不过对我来说，这是我和战后最醉心于权力、最反对民主的一位政治家的一次直接会面。他曾几度把我送上法庭。十几年前，我首次见到他本人。在慕尼黑天主教学院举行的一次公开讨论会（讨论题目是“记者或鼓动家”）上，我坐在他和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维什涅夫斯基两人中间。那天施特劳斯情绪很好，在思想比较开明的学院听众面前想要显示一番，甚至显然想跟我套近乎：“我终于有机会问您：耶稣会的约瑟夫·瓦尔拉夫神甫是不是您的亲戚？”我不想让他在听众面前以这种亲密姿态来掩盖他对我这种人的敌意。“是的，”我回答他，“我是他的私生子。不过请勿外传！”之后，在讨论的过程中，施特劳斯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本色。

## “吃得香”

许多批评我们的人都是真正的捉迷藏能手。他们不肯花费力气进行一番调查，更不用说看一看麦克唐纳的内幕了。

不看就不了解真实情况。

(1985年5月10日麦克唐纳快餐店在《时代报》上刊登的整版广告)

不久前，麦克唐纳对消费者协会和工会中的批评者发起一场大攻势：“对我们的攻击不会妨碍我们今后的扩展业务，从而向一大批现在还失业的人提供具有一切晋升机会的固定工作。”

向外国人和避难者提供的一次机遇？那就非去不可了，我（阿里）想。我们这里已有207家麦克唐纳快餐店。很快还要再翻一番。我（阿里）到汉堡去碰碰运气；我被鹅市那家店——它是德国最大的分店之一——录用了。如今我（阿里）不能再放过这一乐趣，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吃得香”。反正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麦克唐纳是一家物美价廉的家庭餐馆。麦克唐纳环境极其清洁，令人心旷神怡、乐趣无穷……欢迎您前来用餐，并预祝您在我们这个集体中心情愉快、万事如意！”

在这样一个快乐的集体中，我宁可说自己只有26岁。要是说出我的实际年龄（43岁），大概就没有什么可笑的了。

我象汉堡包一样也裹上了一层麦克唐纳的包皮：纸帽、薄衬衣、一条裤子。上面全都印有“麦克唐纳”的字样。只是还缺少事先也把我们送上烤架上去烤这一道工序了。我（阿里）的裤子没有口袋。我（阿里）如果得到小费，握着硬币的手沿着裤缝寻找而徒唤奈何时，就只好乖乖地把那些硬币交到店里所希望的地方去：钱箱。这件成衣杰作也叫人无法放一条手帕。你要是“流鼻涕”，就会流到汉堡包上或者掉在烤架上发出啦啦声。

经理立即对我表示满意，称赞我在烤架旁翻烤汉堡包牛肉饼的手艺。“你干得不错。速度挺快。大多数人开始时会出大纰漏。”——“这也许是因为我进行体育锻炼的缘故，”我（阿里）回答他说。——“什么体育活动？”——“乒乓球。”

汉堡包这种黑糊糊的牛肉饼直径至少有 98 毫米，重 145 克或 125 克，把它扔到烤架上就会象一个塑料筹码蹦跳，冰冻时会发出象一枚硬币击中玻璃的声音。

煎烤前它有十分钟所谓“保鲜时间”，可是往往在这之前早就不新鲜了。化冻后，过一会儿就开始发臭。因此，在冰冻状态中就得把它送去煎烤，加上著名的配菜和佐料，塞进一剖为二的象泡沫塑料一样松软的面饼，放到塑料盒子里盖紧。

“汉堡包柔软线条的侧影多么优美。认识这一点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快餐店创建人雷·克罗克一本正经地说。

柜台后面的工作场所很小，地面油污光滑，烤炉的温度高达摄氏 180 度。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干活时人们本应戴手套，反正安全条例是这么规定的。可是没有手套，而且戴手套只会使工作速度放慢。因此，许多在那儿工作较长时间或工作过较长时间的人都曾烧伤过或有烧伤的伤疤。一个伙



伴在我去以前不久进了医院，因为他匆忙之中直接用手去抓烤架。我(阿里)在工作的第一天晚上就被溅起的油点烫出了泡。

我(阿里)天真地以为，我的第一班如同说好的那样到清晨2点半结束。我(阿里)发觉人们开始议论我这个新手。经理剋了我(阿里)一顿，批评我想要提前下班。“我仅仅是按指示办，”我说。他警告我(阿里)，下班之前应亲自到他那儿去报告下班，接着又以威胁口吻问我是否已把外面真正打扫干净了。由于我刚才身穿一件单薄的衬衣被派到12月的寒夜中去过，于是我(阿里)就答道，一切都已收拾干净，可是一位特别细心的女职工发现地上仍有纸片。

此时已临近凌晨3点。经理说，我(阿里)劳动态度不对头，干活不积极，我的脸色看上去也不怎么高兴；不要以为没有人监督我，比方说，今天我在一个地方站了五分钟。“为什么不能？”我(阿里)答道。“我跑来跑去跑个不停，因为我把这工作也看作是一种运动。”

我(阿里)后来了解到，按照秘密的内部指示，夜班和加班时间只能四舍五入，凑成整数，半小时以下都不算，多数情况是把零头舍去。上班不看什么时候来，而是从换好衣服开始干活时算起。下班也是如此：先打计时戳，再更衣。这样一来，就从两头偷走了你的时间。

那时正是圣诞节前不久。顾客盈门，高峰时间营业额创造了最高记录。我(阿里)干的活可同任何流水作业相媲美，每小时总工资为7.55马克。此外，每一小时再补助我(阿里)一马克伙食费。八小时后经理对我说，现在我可以从麦克唐纳供应的品种中为自己挑点什么吃。我问有刀叉吗，人们都乐了。麦克唐纳快餐店会有刀叉，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大家都

笑得前仰后合。

我(阿里)的工作地点就在店堂后面,前后相通。我看得见顾客,顾客也看得见我。我无法离开片刻去喝口水消暑解热。而油煎和配菜,尤其是那许多芥末,使人口渴难忍。

一个汉堡包一根黄瓜,一个大麦克包两根黄瓜,再来一片干酪和种种调味汁:鱼汁,鸡汁,大麦克调味汁。

“爱情犹如制造大麦克包:躯体就是和谐运动中的两块肉。美味可口的小面包把躯体亲密地搂在怀里。亲吻犹如少许湿润的黏黏鲜汁<sup>①</sup>。两颗爱恋之心热得象葱头。希望还是孩子,绿得象生菜。干酪和黄瓜增添更多的味道。”

——摘自里约热内卢分店麦克唐纳内部报纸

《Quarterao》(1983年4月)

我们忙得不亦乐乎。不断响起叫人的铃声,再来一客苹果角或煎鱼,手指上充满鱼腥味,马上又去端下一个汉堡包。

休息时,我(阿里)自己试吃了一次。我在吃炸鸡块的时候,心里马上就嘀咕起来:这也许是鱼吧。这东西有这么一种淡淡的鱼味。吃苹果角时我也有这种印象:哎,这上面不又有鱼的气味吗?

过了一些时候,我才明白其中奥妙。我们把炸过东西的热油放在大桶里。到了晚上,用同一个滤器对每个桶里的油进行过滤,然后再继续使用。这就是说,不管是苹果角的油也好,鱼油也好,鸡油也好,统统都经过同一个滤器。用一张过滤纸滤清10桶油。

高峰时间柜台前排长队,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前面不时有人高喊:干吗不快一些!我(阿里)于是考虑是否把汉堡包

---

<sup>①</sup> 一种调味汁,用食油搅拌蛋黄,再加入黄瓜丁和调料制成。——译注

早点取出，可经理——他是唯一不戴纸帽的人——却教训了我一顿：“这用不着你管，这是机器的事情。也就是等机器发出叫声才取出汉堡包。”于是我(阿里)照此办理。没过五分钟，经理又来了。“干吗不快一些？”——“您刚说过让机器去考虑，现在我就等着。”——“可顾客呢，该死的，难道叫他们等着吗？”——“这儿到底是听谁的，听您的还是听机器的？您叫我怎么办？您说我干。”——“你得等机器发出叫声，明白吗？”——“明白了。”

麦克唐纳的诀窍是快速服务。作为所谓“服务目标”，提出了“无论何时不让一人排队”的口号。向经理们推荐了一些窍门。他们的座右铭是：“在柜台前等一分钟时间太长。这是排队人的最大极限。提出30秒的目标。你的餐馆加快服务速度是个工作态度问题。今后30天你要集中全力抓服务速度。把‘慢’字从词汇表上划掉。你的营业额有2%取决于你如何反应。速度万岁！”

“Fast-food”<sup>①</sup>在这儿确实只是几分钟的事情，尽管有些英语不大高明的伙伴认为，“Fast-food”不是“快餐”而是“凑合”饭。

我们那家分店以创记录的营业额而闻名。我(阿里)也躬逢其盛，看到麦克唐纳公司地区领导人奖给我们经理一个奖杯，杯上刻着：“创利成绩优异。”

麦克唐纳特别瞩目于儿童。慕尼黑总店销售科的一份内部文件指出：“快餐不仅是个年轻的市场。在德国，它基本上也是年轻人的市场……据说他们没有钱！”

全套设备都与此相适应，门的把手、桌子、椅子等全都大

---

<sup>①</sup> Fast-food(英语：快餐，快速食物)。德语fast有“几乎、差不多”的意思，故有“凑合”一说。——译注

体上符合儿童身高。麦克唐纳许可证持有人接到的专门指示是：“儿童使他们的营业额增长许多倍！”他们得到现成的程序安排，以便使孩子们、从而当然也使全家上钩。其中最主要的是“麦克唐纳儿童生日宴”。这种活动的整个程序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生日宴会的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活动	约15分钟
第二阶段：欢迎	约10分钟
第三阶段：点菜	约5分钟
第四阶段：取菜	约10分钟
第五阶段：吃得香	约15分钟
第六阶段：游戏或参观店堂	约10分钟
第七阶段：告别……	
随后记帐……”	

（麦克唐纳内部材料）

经过煎、烤和柜台工作之后，我（阿里）在第三个工作日被培养成为熟练的“堂倌”：我得清除桌上的包装和吃剩的东西。为此使用两块抹布，一块擦桌面，一块擦烟灰缸。可是有时一忙起来，常常就顾不上把两块抹布分开了。但这也无伤大雅，因为用同一块抹布去擦洗厕所也是家常便饭，食物循环这才得以周而复始。我感到毛骨悚然。我想再要一块抹布，可他们用生硬的语调对我说，我的抹布已够用了。有一次，经理让一个伙计直接从大烤架边上去疏通一个堵塞的马桶。他手里正好拿着烤叉，于是使用它迅速而认真地完成了任务，不过事后挨了副经理一顿剋。门外的整洁备受重视。入口左右50米得经常打扫，因为有大量包装废料扔在那儿。那就是说，我（阿

里)只穿一件单薄的衬衫,从暖烘烘的室内被支使到寒冷的室外去干活。

在休息室里,我们说说笑笑,拿那些看样子已驱逐不尽的蟑螂开玩笑。开始只是地下室有蟑螂,现在厨房也有了。不久前有一只蟑螂直接掉在烤架上。有一次,一位顾客在他的大麦克包上发现过一只大蟑螂。

有时年轻顾客,尤其是喝得微醉的阔少,把装着吃剩的炸土豆条的塑料袋丢在我脚下。油腻的土豆条洒落在地上被踩瘪。我得马上用水擦洗干净。

一个土耳其女同事处境尤其困难。作为女人,她受到调戏;作为外国人,她受到嘲弄,有时装得满满的烟灰缸扔在她脚下。有一次有人也把一个烟灰缸扔到我脚下。正当我把碎片扫进簸箕的时候,听到身后又有烟灰缸摔在地上的声音,一而再,再而三。我看不清是谁干的。餐馆内有人在笑。一定是有人在寻开心。

休息时我也是属于企业的。不准到外面去喝杯啤酒或咖啡。有过不好的事情:有一次有人逛妓院去了。

一个年轻的女同事告诉我,在八小时工作时间内她经常得不到休息。当她问的时候,回答只是:“继续干!继续干!”

谁想去看病,经理就会对他说:“这儿的人什么时候看病,由我决定。”

一次,我(阿里)问现在是否可以休息一下。回答是我所熟悉的:“你什么时候休息,由我决定。”

没有职工代表会。

六年前,麦克唐纳主管联邦德国的人事处长就已在一个月通报中出主意说:“如果从谈话中得知求职者是工会会员,就再提出几个问题,然后停止谈话,答应过几天决定。当然是决

不录用。”

公司创建者克罗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期望金钱，就象人们在打开电灯开关时期望光明一样。”美国将军亚伯拉罕把麦克唐纳奉为全国真正的楷模：“在麦克唐纳那里工作，对年轻人大有裨益。麦克唐纳使他成为讲求效率的人。要是汉堡包做得不象样，他就会丢饭碗。这种制度是一种不声不响地发挥作用的体制，值得我军效仿。”

### 请 用！

所有东西味道都差不多，这有几个原因。汉堡消费者中心对麦克唐纳产品的鉴定是：“味道主要靠人工食用香精产生。为了能尽量多保存一些时候，饮料里添加了防腐剂。”一份牛奶冰淇淋搅合饮料含有22%的白糖，这相当于16块方糖或40至45克。为了制造可食用的效果，什么都“添油加醋”。埃德蒙德·勃兰特——了解美国肉类工业情况的人——说，制造肉“馅”不能直接使用瘦的脖颈肉或前臀尖肉，否则肉饼就会散开，因此肉要经过“盐和液体蛋白质”的专门处理。“肉要是太新鲜，”勃兰特说，“对生产肉馅来说水份就太大。”肉要是放久了，又会发白：“这时他们就拿冰块扔进绞肉机，这样一来肉的颜色就变得鲜红一些。”虽然肉看上去很瘦，在已做好的汉堡包肉饼中仍有25%的肥肉。有关“快餐食品”名目繁多的诀窍，麦克唐纳在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工作中没有向顾客透露过片言只语。这种工业生产的“快餐”食品包装极其精巧——象是一种佐餐用的《图片报》<sup>①</sup>。正如《图片报》的读者即使不了解

---

① 《图片报》是联邦德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以造谣生事、耸人听闻而著称。——译注

内情往往也能凭直觉知道报纸想要使他们上当受骗一样，麦克唐纳顾客中也有人经过一段时间试吃之后感到恶心，快快而去。我(阿里)在打扫时发现有一张餐巾纸上写着：“麦克唐纳——狗屎不如！”“吃下去的东西比拉出来的东西还要坏，这是第一次！”“快餐食品”营养不足，会使健康遭受严重损害。美国营养学家已证明，经常吃快餐的儿童爱打架、失眠、做恶梦。原因是：甜的“快餐食品”分解体内硫胺储量，结果导致维生素B<sub>1</sub>不足，使神经系统受到损害。

## 工 地

清晨6点，我来到杜塞尔多夫市彭佩尔福特区法兰克福大街时，已有6个寻找工作的人站在GBI承包公司门前。他们也是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招工启事，经过电话联系，约定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的。公司一个职员给我们开了门。办公室就在底层：靠在一起的两张写字桌、一部电话。没有卷宗，没有书架，连写字桌上都好象收拾一空似的。黑板上挂着一块牌子：“本公司照章招工！”但无人查问我（阿里）的证件，我连姓名也不用说。

我们在分批前往工作地点之前，先得在毗邻的一套两居室住宅中等候。这套住宅墙纸脱落，窗户积满灰尘，没有厕所。它作为我们的休息室，以其特有的方式预示了我们在这里的“地位”。“西基”——一个满头卷发、双手和脖子上挂满金饰的壮汉——宣布要挑4个帮手“到科隆的一个高层建筑工地去”。我报了名并被选中了。

中途在汽车上，他向我们宣布了我们的计时工资和工作条件。“领班要你们每天干10小时，”“西基”对我们说，“我给你们每小时9马克，也就是每天90马克。”

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位于科隆霍恩施陶芬环行路的建筑工地，我看到牌子上写着：“这里正在出现面向寂静公园的漂亮城市住宅和优美的小公寓式住宅。”在这个工地为GBI公司



干活已有较长时间的队长让我们到更衣室去。我们正在换衣服，“西基”又走进来。“我还是需要把你们的名字报给领班，”他说。“阿里，”我说。这就够了。

我们这一队由“瓦尔特·托斯蒂·波斯沃”(WTB)公司的一个领班主管。后来我获悉，这家公司是联邦德国第六大建筑企业。以后数日，给我们派活的也都是这个领班，而且工具——从扫帚到撬杠——也都由 WTB 提供。GBI 只管介绍工人，自己没有什么工具，也没有自己的建筑工地。

我们之中没有人向 GBI 交出自己的证件，我们无一例外都是“黑工”，连医疗保险都没有。我问一个伙伴：“出了事怎么办？”——“他们就说你刚来三天，到医疗保险机构去给你补报，”他说。“他们共有好几百人，其中最多有一半是申报过的。”

休息时我们 15 个人挤在一起，坐在约莫有 12 平方米的施工车上。由 GBI 科隆办事处介绍到这儿来的一个木工说：“我在建筑业干了 30 年，可领班叫我在干活之前先注销执照，这种事我还从未经历过！”有几个人说，他们每天干活连同来回路上的时间达 15 小时。“可是你只能拿到你在这儿干的那 10 个小时的钱，路上的时间一分钱也不给。”

有一个年近半百的土耳其工人受到我们 WTB 领班的特别刁难。尽管他干活的速度比德国工人至少高一倍，领班仍骂他“土耳其佬”：“要是你不能干得更快些，下一回我把你同碎石子一起送走！”

星期五下工后，我们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领到工资。钱先得从外边取来。有几个租赁工看来知道这工资款的来处：“克罗塞现在才去朗根费尔德。”我们都坐在施工车上时，GBI 的一名非法的德国老工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帐户在那

儿，他去那儿给我们取钱。”至于为什么不从科隆或杜塞尔多夫的银行提款，这个工人也知道：“朗根费尔德的帐户是用某个私人的名义开户的，他把WTB和别的建筑公司的支票记入自己存款项下。而在杜塞尔多夫他们不能再开户，否则财政局马上就会来把一切都扣押。”

下班后还得再等两小时才能拿到我们的钱，这两小时当然是不给钱的。

不仅是公司帐户扑朔迷离，所有的一切都是鬼鬼祟祟的，为的是隐瞒我们在建筑工地上干活之事：我们发工资时虽然要在收据上签字，但我们拿不到一份复写的副本或工资清单。即使是领班登记我们工作时间的单子，在发完工资后他也马上又收回去。这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建筑行业搞这种按钟点计算的租赁劳动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为了回避禁令，象 GBI 这样的承包公司便签订假供销合同，名义上减去建筑企业例如“40平方米混凝土”的钱数，实际上却是赚到40小时租赁劳动的钱（在许多情况下，领班们拥有把租赁工人的工作时间折算成多少平方米混凝土或土方的伪造表报）。为了以后能证明我们的建筑工地暗中也在实行计时工资，有一次我故意分散领班的注意力，拿走了一张单据，上面印有“WTB 建筑股份公司”字样，单据上有领班填写的“30工作小时”以及日期和签字。

派给阿里的第一个活使得他从一开始起就明白自己的地位。工人厕所里有几个马桶已堵塞了一个多星期。尿水将近有脚面高。“拿水桶、地板刷和抹布去把它打扫干净。快。”我拿借条从工具科领来了东西。——“你划三个十字就够了，”负责的德国勤杂工说，他在工具集装箱干活并不太累。

集装箱厕所里臭气熏天。小便池也全部堵塞了。我觉得

这个活儿是刁难人。只要不请内行来消除其根源即管道堵塞，马上又会泛滥成灾。工地上有足够的管子工，不过他们的工作时间太宝贵了。他们的任务是为未来的房产主的豪华卫生间安装管道。

### 在我们的巴勒莫<sup>①</sup>

光建筑行业雇佣的非法介绍的土耳其人、巴基斯坦人、南斯拉夫人和希腊人估计就有20万。这意味着每年向国家少交100亿马克的税金和社会保险金。

人贩子常常享受能逃脱法网的足够的政治保护。法律规定很不严格，可联邦政府迟迟不去制止这种阴谋诡计。只有建筑工地自1982年起禁止使用租赁人员。基民盟执政的各州都拒不承认这种非法交易是犯罪。因此，介绍德国人和来自欧洲共同体国家的外籍劳工在法律上始终只不过是一种违纪行为。

警察、劳动局缉捕人员和检察人员甚至连建筑业黑手党的小伙计都很难抓住。“这个问题我们已难以控制，”例如科隆首席检察官法兰茨海姆博士抱怨说。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地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就有4000件。出租者骗取非法劳工的工资或殴打、恐吓“不愿干活”的外侨，等等。甚至还有——例如杜塞尔多夫州刑事警察局正在进行调查——勒索保护金和谋杀嫌疑的案子。

不仅是私人建筑企业常常通过其他的中间商人同租赁公司联系。在官方的定货中，那些“承包公司”也参与其事。

在修建杜塞尔多夫州议会大厦时，1984年警方曾进行多次搜捕，因为有不少人贩子在那里进行活动。

---

<sup>①</sup> 巴勒莫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是黑手党的大本营。——译注

在修建慕尼黑劳动局新办公楼时，在一次检查中捕获了50名非法劳工。连警方至今也不知道，在扩建希尔登联邦国防军军营以及新建波恩(巴特戈德斯贝格)联邦邮电部大楼时也都使用了租赁工。

由于邮电部长克里斯蒂安·施瓦茨一席林没有规定在工程委托过程中进行适当的检查，使得至少有一家非法的租赁工公司也大大地捞了一把。假定当局想要了解，这事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由杜塞尔多夫人贩子公司 DIMA 股份有限公司把人介绍给德国第六大建筑康采恩 WTB，这家建筑公司是邮电部大楼工程的主要承包者。而 DIMA 公司又是我曾作为非法劳工为之工作过的 GBI 公司的化身。

领班等工程指挥人员在一个专门的集装箱内有专用厕所。这些厕所门可以上锁，禁止工人使用，每天有清洁女工打扫。我(阿里)对队长说，我的工作毫无意义，得找个管子工来。“这儿你无权提什么意见，叫你干啥你就干啥。还是让驴子去思考问题吧，它们比你都要聪明，”他说。无奈，我(阿里)只好象其他外籍劳工那样唯命是从，而他们或许还会因为工作做而感到高兴。想到这一点，我就能——后来也是如此——略微克制住内心的厌恶，把一种奇耻大辱转变成为同甘共命运的义愤。

我用抹布、海绵和水桶把便池里的尿水弄走，前来上厕所的德国人有的就发表几句评论。一个小伙子和蔼地说：“我们终于有个厕所清洁女工了。”两个45岁上下的人坐在马桶上聊天：“有什么东西比屎尿更臭？”——“劳动，”一人回答说。——“不对，是土耳其人。”响亮的声音从另一马桶间的门里传了出来。

不过也有一个德国工人在解手时问阿里是哪国人，我答

道：“土耳其。”他对我深表同情：“又是这种事，老让你们给我们掏粪。没有一个德国建筑工人肯干这种活的。”

领班胡戈·莱纳有时跑来监视我。幸好他身上带着对讲机，机器发出叽叽嘎嘎、叽叽嘈嘈的声音，使我常常能及时发  
现他来，便加紧干起来。“加油，tempissimo, amigo,”<sup>①</sup>他催促阿里。当我(阿里)和气地向他指出，我并不是“Italiano”<sup>②</sup>而是“土耳其人”时，他的语气顿时就生硬起来：“那你早该干完了，这活你熟，你们的厕所老是堵塞。”

胡戈·莱纳曾经因为外籍劳工在工作时间内在靠近工地的电话间里打要紧的电话而把他们立即解雇。

以后几天，我们冒着30度的酷暑往七层楼上搬运泡沫混凝土板。因为我们比起重机便宜，所以把起重机调到别的工地上去了。莱纳监视着，不让我们有额外的休息。第二周，阿里被派去运送混凝土。我用“日本人”(这是一种半圆形大独轮车的名字)穿过料场，把拌好的混凝土送到浇灌地基的地方去。我两臂酸疼，使出吃奶力气才能压住车身不让它向前翻倒。工头海因茨——也是GBI的人——总是故意给阿里的推车装得特别满，看他如何使劲把车子保持平衡。手推车变得越来越沉重。由于天气酷热，我的体力已消耗殆尽。路上有一块木板，车子轻轻蹦了一下，这时我再也把握不住了。车翻了，混凝土撒在地上。其他人赶来抢在混凝土变硬之前把它重新铲到车上。领班跑来把我臭骂一顿：

“你这浑蛋，简直笨得要死。起码该会向前看吧！要是再翻车，就滚回安纳托利亚<sup>③</sup>去掏沙子吧！”

① 不规范的意大利语：加油，朋友！——译注

② 不规范的意大利语：意大利人。——译注

③ 土耳其的一个省。——译注

装下一车时，工头幸灾乐祸地咧开嘴笑着瞅我，不顾我抗议，把手推车装得满满的，稍一使劲就会溢出。妈的，尽管使出全身力气，我仍无法使车子保持平衡。第一次拐弯时，车子险些把我摔倒，一车混凝土又翻倒在地上。几个德国工人发出欢呼，站在周围袖手旁观；我吃力地把混凝土浆铲到车上去。我一边拼命地铲一边东张西望，看胡戈·莱纳是否走来。幸好领班到工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德国工人指出，我的手推车轮胎漏气了。轮胎上扎了个钉子。这也是翻车的原因。工头站在远处冷笑。当我再次走过他身旁的时候，他得意扬扬地说：“你们慢慢就会明白不该呆在这儿。”后来有一次我碰见他正用墨水笔在厕所墙上涂写：“土耳其人该死……”当我想质问他时，他向我吐了一口唾沫，未完成他的杰作就离开了厕所。

数日后，我在六层楼上打扫碎砖废料时险些跌进一个电线井道。井道口很不醒目地盖着一块塑料板，幸亏我只踩进去一只脚，把脚崴了，不厉害，踝骨被擦伤。那井道足有8米深！我差一点送了命。工头海因茨凑巧从旁边一间屋子里走出来，他说：“你真走运。想想看，你要是掉下去了，我们又空出一个位置。”

一次，一个德国同事放在小柜子里的钱包丢了。钱包里有100马克。于是我（阿里）便成了怀疑对象：“你说，你在干活时出去过15分钟，你究竟干什么去啦？”一个德国人说：“叫他打开他的钱包。”另外一个德国人阿尔方斯——也叫阿尔非——帮我说话：“即使他钱包里有100马克，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钱有可能是我们15个人当中某个人或生人偷走的，怎见得就是阿里呢？”

阿尔非也鼓励我学好德语（他一边拍拍我的肩膀表示勉

励)：“你的德语说得比你自己的要好多了。试试看！只要把词的位置颠倒一下，你的德语就很不错了。你只要说：‘我是土耳其人’，而不是‘土耳其人我是’。这不是很简单吗？”

阿尔非失业多年，后来杜塞尔多夫劳动局把他介绍给“巴斯图巴”公司。这家公司接受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委托，让他整天站在冷水中挖淤泥，清理堤岸。后来他才知道“巴斯图巴”公司没有将他申报，他象他的南斯拉夫同事们一样是在打黑工。他同他的头头吵了一架，被赶走了。过了一些时候，一位朋友把 GBI 的地址给了他。

有一次，我当着大家的面问 GBI 驻科隆办事处主任克罗塞，GBI 这个缩略语是什么意思。他向我们说：“这是‘长颈鹿’、‘狗熊’和‘刺猬’的缩写。”<sup>①</sup> 他就这样糊弄我们，而大多数人甚至还真信以为真呢。这家公司真有点怪，经常换名字，因此人们也就信了。

我们有一位新来的德国同事名叫弗里茨。他20岁，金黄色头发。他已自愿报名参加宪兵部队，一心一意想入伍，把在建筑行业打黑工这一段时间看作是过渡时期。休息时我们在地下室玩他发明的一种掷币游戏。谁要是用自己的10芬尼硬币击中墙上指定的地方，就可以把别人投的硬币归为已有。我运气很好，经常赢钱。弗里茨很恼火：“你们土耳其人老是想刮我们的钱。你们老是只顾自己，我们一不注意，你们就欺骗我们。”

另外一次他说：“我们德国人聪明。你们却由我们负担，象兔子一样大量繁殖。”

<sup>①</sup> 德语长颈鹿(Giraffe)、熊(Bär)和刺猬(Igel)的第一个字母是GBI。GBI的原意是“建筑施工和工业安装公司”。——译注

他对其他人说：“这人有时可野啦！”

由于盖屋顶的工人不够小心，屋架起火了。来了许多救火车，警察也来了。阿里和其他几个同事被派到还在冒烟的屋顶上去清理。球鞋鞋底开始发烫，被火烧过的房梁有几次在我脚下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一队警察和消防队员站在我们旁边，看着我们把燃烧着的东西往料场上扔。我们没有安全服，在他们面前爬上爬下。全都是非法劳工。我想他们知道或至少猜到这一点，但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也从我们身上得到好处，因为我们替他们干危险的脏活。

有一个德国同事叫欣利希，他20岁，已婚，有一个孩子。他拖欠房租，肿着脸来上工已有好几天了。他发着高烧。好几个牙齿已化脓了。接连几天，不让他去看牙。他向 GBI 驻科隆代理人克罗塞要一张医疗卡。直到那时为止，欣利希根本不知道他并未被申报，而是干黑活。他气得不得了：“这是禁止的，我要去告。”——克罗塞说：“你可以滚蛋。我们永远不想再见到你。谁要是说这里在干黑活，我们就以诬陷罪告他，要他赔偿损失！你晚交了证件，我们来不及把你申报。是你自己触犯了刑律。”欣利希后来不敢去报告警察。第二天，他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败血症。有生命危险！

一个星期五，下工后，我们正在更衣，WTB 的领班胡戈·莱纳来了：“现在这儿已度过了紧张关头，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

阿里在建筑工地上度过了六个星期。有几个属于 GBI 基本队伍的非法劳工，被换上新名称 DIMA 的这同一家公司派到波恩—巴特戈德斯贝格另一个大建筑工地上去，联邦邮电部长要造一幢新的邮电部大楼。可惜阿里不在其内。



## 一个现代企业家

杜塞尔多夫人阿尔弗雷德·凯特尔,50岁,是近年来获得难以估计的财富的企业家之一。1971年,他和一个合伙人一起创办了“凯特尔和弗里克股份有限公司”,以承包人的身份向各建筑企业出租工人。自1982年起,这遭到了禁止。在这之前不久,凯特尔购买了“建筑施工和工业安装公司”(简称GBI),继续干下去。

1984年夏天我在科隆给GBI干活的时候,税务人员早就在对凯特尔进行调查。可是非法交易仍在巧妙地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凯特尔逃避缴纳的营业税和工资税达到1100多万马克,另外还少缴了好几百万马克的社会保险金。凯特尔被拘留审查。1984年底,他被判处四年半有期徒刑。他之所以未被判处重刑,归功于一份证明他“嗜赌若狂”的鉴定书。这指的是他经常去赌场耍钱,而不是指他拿500人耍。根据税务局调查,有500人同时给他挣钱。

凯特尔仍然坦率地为自己的行当辩护:“没有疑问,我了解这一行的一切。当然了解所有的建筑企业,全部手法……只不过既然同他们进行过合作,那就别把他们牵连进来。”

但后来他还是这样做了:

“大工程项目,如果没有承包企业就再也搞不成。比如说ARGEN(大工程工作组——作者),他们全都和承包商合作,无一例外。现在已没有一幢大型建筑物没有承包商参加。”

凯特尔谈到他自己:“要不是我被人出卖的话,我现在还会放手大干的。”

全部业务手法,任何财政局、大众疾病保险储蓄金管理处都识不破,没有一个人能识破,除了有关人员。打官司时妙就妙

在没有人能证明各家公司有联系。和大公司签订合同，可以搞得天衣无缝；实际上我可以采取计时工资而不是一次总付，可我另搞一个合同，因为计时工资是被禁止的。谁愿来检查这个？劳动局怎能了解其中情况？在法庭上你可以说：请拿出证据！

外面的人是根本无法了解情况的。要不是与我合伙干的那人慌了手脚的话，外面的人是奈何我不得的。在这之前，税务局和警察就已在调查，但一无所获。”

至于获利多少，凯特尔也愿意交代：

“雇员么，他们能挣到钱，很多钱，不，并不总是很多，不过最主要的是能挣到钱。

建筑公司每小时给 22 至 33 马克。承包人能得多少，就看他给他手下的人多少了。看他申报了多少人。是否全都申报，还是只报几个。

技术工人的工资总额今天为 16 马克上下。外国人总是受到压榨，他们的工资很低，可德国人就不干。德国人或多或少知道自己的权利。

可外国人……10 马克，8 马克……都一样。”

略微推算一下，就得出下列景象：

凯特尔从每小时工资中扣留 14 至 25 马克。建筑业一般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每人每天共计在 140 和 250 马克之间。500 人每天就是 70000 到 125000 马克。从这笔收入中扣除微不足道的交通费和会计费。还有税金和社会保险金。或者不扣。

## 改变宗教信仰

基督说：“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

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马太福音<sup>①</sup>，第二十五章。

阿里想到天主教会去碰碰运气。他听说耶稣也是被赶出故乡，同生人和他那时候的受迫害者一起生活，因而自己受到严重指控和迫害。尽管如此，阿里并非作为请愿者前去的，虽然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他不要求容身之处，不要求物质上的帮助。他不想向上帝的官员提出苛求或者甚至诱惑他们。他所想的只是受洗！

1. 因为他想加入基督教徒的行列，不是投机，而是因为他很早就已了解基督的生平事业并认为真实可信。

2. 要尽快去办，因为他只有成为天主教徒才能和他那信奉天主教的德国女友结婚。女友的父母是这样要求的。

3. 希望这样做也能防止即将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走访的教士和显要姑隐其名。同教会人士的谈话都是真实的。）

---

<sup>①</sup> 《新约全书》1985年中文版，第35页。——编注

阿里的样子看得出是个工人。他衣着简朴，挎包里露出一个暖水瓶。

**第一次走访。**教士住宅位于优美的住宅区，有一个公园式的花园。

一位级别较高的教士，约60岁，把教士住宅饰有铁栅的沉甸甸的栎木门打开一条小缝，冷冰冰地望着阿里。教士说：“这儿什么也不布施，到民政局去。”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教士觉察到我的惊愕，未等我提出请求就毫不含糊地又说：“好多人都来向我要钱，因此这儿一概不给。我们这儿是教区办事处，不是……”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不要钱，只要受洗。”

门缝稍许开大了一点儿，他以好奇而挑剔的目光打量我，说：“原来如此，有许多厌恶工作、只想依靠别人为生的人到这里来……你住在哪儿？孩子有多大，什么时候举行洗礼？”

我把“我的”地址告诉他，由于这是一条豪华的街道，阿里连一周的房租都很难付得起，因此我又加上一句：“我住地下室。”并接着说：“不是孩子洗礼。我土耳其人，至今信穆罕默德。我自己想受洗。因为基督更好。可是要快，因为……”

他十分吃惊，不相信地瞪眼看着我，好象我向他提出的不是举行受洗圣礼，而是要求对我自己行割礼。

他又把门关紧，只留下一条小缝：“哪能那么快呀……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首先要有许多先决条件……”对我的寒酸相投以轻蔑的目光：“我们也不是吸收任何人参加我们的教会。”我想要强调由于有被驱逐的危险而迫切希望受洗，但他丝毫不为所动：“别那么着急嘛。我得先和区长商量。你先把你的户籍给我送来。”

我斗胆回答：“可基督也没有固定住处呀！”他一定把这当

作是一种渎神行为，便不再作任何说明，猛地使劲把门关上。接着我就猛按铃，以示我想要成为教徒大家庭中的正式成员的决心有多大。他又把门打开，对我进行训斥：“我们这儿不是收容所。你要是再闹腾，我就叫警察！”我最后一次试图打动他的基督徒良心，提醒他的职责，便跪下向他作揖哀告：“以基督的名义，洗礼！”代替回答的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这完全出乎阿里的意料。他显然找错了人。不肖之徒，哪儿都有。这个最最富的人们想保持自己清静的别墅区显然不是阿里呆的地方。阿里不肯就此止步。他跑到邻近教区离得最近的教士家去。那儿的房屋没有高墙大院，园子不在房后，门前有一小块长方形土地，人人都可以进去，往往并不比一间起居室大。居住在这儿的是中产阶级，有些地段也住有工人。

阿里由于第一次遇到敌意的对待而变得忐忑不安、小心翼翼起来，请他的土耳其同事阿卜杜拉陪同前往，充当证人，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下午5点钟。

教堂里空无一人。礼拜钟声是全自动的。可是没有一个教徒前来参加礼拜仪式。或许是他们也觉得天气太冷了。教堂没有生火。严寒使圣水一直到盆底都结成冰。当我们以沉着的步伐有点拘谨地向着祭坛走去的时候，独自一人的神父看到了我们。

他大概已打算下班，因为他企图赶在我们之前溜进法衣室。可我比他更快。

“对不起，”我挡住他的去路，“只有一个问题，想受洗，当基督徒，我土耳其人。”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不，不行。办不到。这不成！”

他的声音很轻，说话时眼睛不看我们，而是越过我们仰望

天空，好似他的最高首领在那儿会赞同他的非基督徒表现。

“为什么不？”我想知道。

“这不成，这需要学习好几年，”他喃喃地说。

“可我熟悉基督的书，我老念……”

“不，我不能这样做，没有红衣主教的批准我无权这样做。”

“不是说每个神甫都可以举行洗礼吗？”

“不，根本不是。”

“不许可？”

“不，不，不，不。名义上施洗礼就等于接受一个人加入天主教会，不是……”

“啊，你不是神甫？”我使用了激将法。

他明显地感到不快。他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

“我是神甫，”他坚定而自信地回答。

“这儿教堂的头头？”我穷追不舍。

“是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那就可以作洗礼了，”我毫不放松。

“是呀，可以给儿童作洗礼，”他承认。“不过给成人作洗礼需要科隆大主教批准，而这要求至少学习……”——他犹豫起来，似乎已明白我并非一窍不通——“至少一年。”

“那么长，至少一年……？”

我那忧心忡忡的问题又鼓起他想要把我打发走的劲头：“但也有可能更长一些。必须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我用手指着洗礼盆，向他显示我并非外行。

“那儿举行洗礼。洗全身还是只洗脸？”

在他的心目中，我大概是最后一个野蛮人了。他只说了一声“不”，没有听清我那句亵渎神明的话。

“也许头头，大主教，会讲情？”

他根本不让我抱有幻想：“我不信！我不信！”

我一直还不明白，探询他拒绝的原因：“现在想新加入教会的人是不是多多的？”

看来并不是这样：“不，不，可是……”这个“可是”就这样停留在教堂的刺骨寒气中而没有下文。

既然在超越感官直觉的领域里用道理打动他毫无成效，于是我就从实际方面去打动他。我指着圣水盆里冻得满满的冰层：“来一点防冻剂，就又能划十字了。”但是对这个建设性的意见他也无动于衷。他走出教堂。我们紧紧跟在后面。我抢在他前面到达教堂旁边的教士住宅，按了一下门铃。如同夜间售药处一样，一块狭长的木板拉开了，一位年老的女执事向外看。我们身后的神甫意识到我们不会轻易被打发走，相反，我表明了自己想要受洗的巨大决心，于是便让我们走进他的教区办事处。

“为使你安静下来，我这就给你找一个你能去的地址。不过如上所述，你别抱幻想，这需要时间。”

他慢慢腾腾地在一张大写字桌后面坐好，拖泥带水地翻阅起一本教会姓名地址录。他年约55岁，看上去身体健康，保养得很好，不象邻近教区那位教士那样傲慢和尖刻。他脾气随和，可神态懒洋洋的，如同一位在邮局工作一辈子的职员感到心满意足，尽管邮票在几年前就已全部售完，没有人再来要求盖专门邮戳，那块“暂停营业”的牌子肯定还会使最后一名信步而来的顾客望而止步，但他仍坐在窗口后面同公众交往以消磨光阴。

我不想让他轻而易举地逃避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因为他听到我要求时的反应，如同听到一个——在他看来——不正

当的要求似的。

“如果我现在还是小孩，是否更快些？”我又向他追问。

“是的，如果你是母亲怀抱中的婴儿，那就可以。不过也不可能这么快！那还得先保证能受天主教教育。”

我(阿里)：“可今天许多洗礼，父母都不是天主教徒！”

神甫(皱眉头，神情严峻)：“是的，我们不。我们这儿没有。”

我(阿里)：“我有些同事受洗了，可他们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他们笑我信基督和谈论基督的书。我们大家也都有一个上帝。”

神甫(不为所动，打官腔)：“给成人举行洗礼，得有科隆大主教赫夫纳红衣主教的批准。”

我(阿里)：“他会批准吗？”

神甫：“不会。如果经过至少一年……按部就班……学习，他就批准……”

我(阿里)(喜形于色)：“那他也做洗礼？”

神甫(断然地)：“不。”

我(阿里)：“听说人人都可受洗……”

神甫(一边毫无所得地继续寻找地址)：“对，对，可是……”

我(阿里)：“我也有问题：我想结婚，可父母亲不让女儿和穆罕默德……我和姑娘结婚，就能留在这儿，否则就得出境，被送回土耳其。”

我的同事阿卜杜拉赶忙帮腔，向神甫讲清是怎么回事：“要是他们把他送回土耳其，他就得进监狱。”

神甫大人不理睬这个令人难堪的断言，无动于衷、泰然自若地翻阅教会通讯录——(恼火地)：“哎，FELICITAS 究竟在



哪儿？”

阿卜杜拉：“因此他得尽快受洗。”

我(阿里)：“最好是马上，或者明天下班后来。”

神甫：“不成，这不行！”

我(阿里)：“我也可以付钱。”

神甫：“不，这反正不用花钱。受洗不收费。圣礼都不收费。”

我(阿里)：“要是给异教徒儿童捐款，是否可以快一些？”

神甫：“不，不，毫无办法可想，毫无办法。”

阿卜杜拉：“他不愿服兵役。”

我(阿里)：“我不愿开枪，不能杀人。现在我们土耳其有点象从前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土耳其是专制……”

神甫：“这和洗礼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些都是外因，不能说明什么信仰。”

我(阿里)：“举行洗礼是否大大庆祝，跟全区教徒一起？”

神甫(令人失望地)：“不。”

我(阿里)：“我指的是，是否大大热闹，跳舞等等？”

神甫：“不——不。我们这儿没有……”

我(阿里)：“我全会，我会背圣经，前面，后面，从后面到前面……”

神甫：“每个人都这么说，他什么都会……”

我(阿里)：“那就问我。随便问什么！”

神甫：“嗯，为什么？”

我(阿里)：“只是看看……”

神甫：“不，问题在于教会接纳成人要照章办理。叫我问什么？”

我(阿里)：“关于基督……”

神甫(好似我要谈什么大谬不然的东西一样):“基督?”

我(阿里):“关于他的生平什么的……”

神甫(好似从未有过基督一样):“啊,生平?是的,嗯,嗯……等一等,好……(犹如迅雷不及掩耳)他是怎样创立教会的?”

我(阿里)(不加思索):“基督直截了当地对彼得罗说:现在你去给我搞教会。”

神甫:“嗯,是的,还差不离儿。”

我(阿里):“再来一个难一点的问题!”

神甫:“不,没有用处,毫无用处,这样只会使你抱有希望。”

我(阿里):“请吧!再来个问题!”

神甫(十分勉强):“啊……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有好多教会都声称信奉基督?”

我(阿里):“是呀,因为路德是另外一个人,他搞改革,不再相信教皇。于是就有了许多教会,它们都好。想要基督活着,可知道太少了。想搞自己的教会,因为它们的领导不对头,失去牧羊人……”

神甫(惊异):“是的,不错。”

我(阿里):“我全读过。还有参考书。问答……叫什么来着?”

神甫:“教义问答手册。不错。我也完全相信你说的。可这在此地对我们毫无用处,因为我为成人主持洗礼需经大主教批准。”

我(阿里):“要是我现在……心不跳了,说:请给我举行洗礼?”

神甫:“在死亡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也就是有直接的死亡危险……”

我(阿里):“要是我现在突然感到疼痛,那就行了……我的心脏不好。”

神甫:“心脏不好,是吗?”

我(阿里):“老是有间歇。干重活,眼睛发黑。也住过院。叫什么:急病……”

神甫(予以纠正):“急诊处,嗯。可这不能成为缩短学习时间的理由。经过学习才能判断你的基督教信仰是否真正完全诚心诚意。”

我(阿里):“可是,在这以前我就得走,这还有什么用。要是我不能和姑娘结婚,就要回土耳其。也许我没有受洗就得死去,就不能上天见基督了。”

神甫(叹气):“不能这么说嘛。例外还是有的。”

我(阿里)(喜形于色):“那还是能快快受洗了?”

神甫(对我的迟钝略感失望):“不,我的天哪。即使你死以前没有受过洗,也不能肯定你就永远被罚入地狱。无意识的洗礼可能也算数。大慈大悲的基督也曾给那些按照他的意愿生活的异教徒和不同信仰者以真正的机会……”

我(阿里):“可是不能完全肯定。最好还是马上受洗。来吧。现在心脏不好。”

神甫(仍然无动于衷):“嗯,不,这有困难。”

我(阿里):“可主要的是,我已经信天主教了。”

神甫(绝望地):“是呀,可以这样说,但那不算数,没有盖章。绝对不行,因为我知道你这是故意装的。”

我(阿里):“可确实如此,可以找大夫。”

神甫:“不,不成,我甚至有可能违法。”

我(阿里):“可穆罕默德却十分简单。谁愿当穆斯林,他总是先说行。”

神甫(不无藐视地):“穆罕默德使你们过得也太轻松了。”

我(阿里):“他不管怎么说更宽容一些。”

神甫不理睬这一指责,沉默不语。

我(阿里):“要是从前,传教士跟随征服者去外国,说:你信天主教,你信天主教,你信天主教! 不管愿不愿意! 为什么今天时间要这么长?”

神甫:“是呀,可那算什么天主教! 从前的事情嘛,嗯,怎么说呢,搞得十分刻板。查理大帝在萨克森人那里这样说:要么受洗,要么杀头!”(笑得很开心)

我(阿里):“全都咔嚓咔嚓?”

神甫:“那是公元 800 年的事。”

我(阿里):“印第安人也得咔嚓受洗,不知是怎么回事。”

神甫:“可又有什么结果呢!”

神甫:“事后只不过是使他们对所有的基督徒都切齿痛恨罢了。”

我(阿里):“后来自己也对基督徒(做杀头姿势)搞了?”

神甫:“是的。”

我(阿里):“教皇给他们祝福吗?”

神甫:“祝福? 他用不着祝福。不祝福也可以杀头嘛。”

他原来的温厚表情变成幼稚无情的冷笑。

我(阿里):“教皇是点过头的……”

神甫:“这我不知道,根据当时教皇的地位,他们对传教士在美洲的所作所为是一无所知的。”

神甫换了个话题,想起我原来的心事:“谁要把你从德国赶走?”

我(阿里):“此地,外事警察。”

神甫(深为所动):“噢,外事警察。”

我(阿里):“要是我们和德国女人结婚,他们甚至会跑进卧室看是否睡在一起。”

神甫:“我们这儿学校里有许多土耳其人。他们一直参加我的宗教课,可他们根本不愿……他们连天主教是什么也不知道。”

我(阿里):“要是现在知道,也想受洗呢?”

神甫(惊恐失色):“不,相反,没有一个……”

我(阿里):“我也要学多多的,祷告、唱赞美诗等等?”

神甫:“你得融会贯通,不要死记硬背,融会贯通,融会贯通。”

我开始背诵主祷文。当我最后说到“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时,他打断了我,重新对我进行侮辱:“你们穆斯林已习以为常,象小孩一样喃喃自语,反来复去进行祷告,但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现在可完事大吉了,”他站起来,以便终于摆脱我,把一张字条塞到我手中:“这是信仰咨询处(FELICITAS)的地址,由他们进一步决定。”

天主教信仰咨询处(FELICITAS)的领导人是位身材修长的年长的教士。他风度雍雅高贵,象个贵族,使我想起格列柯<sup>①</sup>笔下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

这个教会机构不象有渴望受洗的改变信仰者经常光顾的样子。我是等待室里唯一的人,浏览一下摆着令人肃然起敬

<sup>①</sup> 格列柯(1541—1614),生于希腊克里特岛,本名多米尼柯·迪奥托科坡利。青年时期在威尼斯、罗马度过,1577年到西班牙,不久定居于托勒多城。他的创作以肖像画和宗教题材为主,画风独特,所画人物形体瘦削颀长,姿态夸张,色彩强烈而沉郁,有神秘幻想的气质。代表作有《奥尔加斯伯爵的葬仪》等。——译注

的古老华贵家具的空无一人的厅堂式办公室，并不能得出有工作做的结论。

穿着破旧工作服的阿里在这儿觉得有点寒酸和不合适。他恳切而有点茫然地说明了他的处境不同寻常之后，由于情况紧急呼吁教士迅速而灵活地作出决定。

我(阿里)：“请，我要尽快受洗。”

教士(不认真对待阿里的请求，略带嘲讽口吻)：“原来是这样！你的意思是多快？过一小时行吗？”

我(阿里)(装出欣喜的样子)：“行，可以的话，马上。多谢。不行的话最晚过几星期，否则要在土耳其坐牢。什么时候洗礼？”

教士(变得话不多、态度生硬)：“说不好。我是专家。”

我(阿里)：“好呀，那就问吧。基督的讲话我都读过，觉得好。”

教士(不为所动)：“是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我(阿里)(告诉他那个为了摆脱我而把他的地址找给我的神甫的名字)：“他说他自己不能做，要问这里，盖章。”

教士：“你在德国有多久了？”

我(阿里)：“10年。还想待下去。我是库尔德族，在土耳其得坐牢。我搞过反对独裁的政治工作。”

教士：“是呀，要是你在德国留下，就不用去土耳其了。”

我(阿里)：“得走，因为我没有工作，只有三个月失业救济。可我也觉得基督比穆罕默德好，没有那么多禁令。基督也更向着受迫害的人。”

教士(似乎从对基督的不同理解出发)：“啊，那好吧。除了你的未婚妻以外，你还认识的基督徒吗？”

我(阿里)：“认识，都是同事，也受过洗，只不过当我向他

们讲起基督的时候，他们老笑。休息时我读圣经，他们总是读《图片报》。”

教士(无视现实)：“首先要和其他德国基督徒多接触。不是学习，而是行动！是生活，不是学习。”

我(阿里)：“我愿意行动和生活。我要怎么行动才能参加呢？”

教士：“同教会一起生活。”

我(阿里)：“行动呢？”

教士：“上教堂。”

我(阿里)(自豪地)：“我做了。星期天我都去教堂。”(为了使她相信这一点，我向他讲了教区和教堂的名字。)

教士：“哦，哦。”

我(阿里)：“是呀，也会祈祷了。唱赞美诗也会。”

教士：“你去教堂多少次？”

我(阿里)：“星期天一次。”

教士：“过去两年中，现在这样已有多久？”

我(阿里)：“现在已有四个月，总是每星期天去。”

教士(轻蔑地)：“四四一十六次。”

我(阿里)：“从前也去过。可是假日常常也得干活。我觉得教堂的庆祝活动很好。基督我真正朋友。”<sup>①</sup>

教士(似乎本人和他的“主”的关系并非那么亲密无间)：“可是信基督并不容易。”

我(阿里)(充满信心地)：“不！”

教士(不相信地)：“不？”

我(阿里)：“他的一生作出了榜样，告诉人们怎么做，不仅

---

① 为了装成外国人，作者故意说不规范的德语。——译注

在书上，而且亲自去做，不仅嘴上说，而且为我们作出牺牲。现在请提问，看看是否正确……”

教士：“是呀，我们不能象学校里那样，而是通过接触、生活和交谈去了解对象。”（略带责备的语气）“要是10年前你来的话，现在就都万事大吉了。”

我（阿里）：“你不提问，看我会不会？”

教士：“问题不是学习，我们不能用化肥催促植物生长得更快些，什么都有一个过程。”

我（阿里）：“第一批基督徒到一个新国家去的时候，很快就施行洗礼，常常违背人们的心愿。”

教士：“是呀，不过那时教会也具有另一种力量和另一种想法。今天完全看接触如何，与基督徒的接触。”

我（阿里）：“我们接触不多，因为德国人不愿和土耳其人一起生活。”

教士：“这是主教的规定。我们大家都得有同样的纪律。”

阿里作最后一次努力，促使教士采取灵活变通的态度：“能不能先给我盖个章。否则外事警察就会把我逮捕驱逐出境，我得回土耳其坐牢，也许受刑……”

教士：“在这种压力下，在这样一种政治上的紧急情况下，我是不能施行洗礼的！这是不负责的。没有一位主教能这样做。”

我（阿里）：“要是我自己去问主教呢？”

教士：“你见不到主教。”

我（阿里）：“他不也住在这儿吗？”

教士：“可你见不到主教。”

我（阿里）：“要是我打电话问他本人呢？”

教士（轻蔑地）：“象你这样的人根本见不到他。他又不是



呆在家里无所事事，等着接别人打来的电话。主教是自己管区 100 多万天主教徒的最高主人。他的日程就象一位州长一样。差不多同样级别。”

我（阿里）：“可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以举行洗礼吗？”

教士（生气）：“主教任何时候都可以施洗。”

我（阿里）：“等他出来散步，我去问他。”

教士：“他也不能，不。他散步时你不能截住他，他身边总是有警察护卫。”

我（阿里）：“请提个问题，看是否正确理解基督……？”

教士（叹气，沉思良久后）：“耶稣是上帝吗？”

我（阿里）：“他是神和人，圣灵与他同在。三位一体……”

教士（惊愕）：“啊，很好，回答得好。这样回答就不错了。”

我（阿里）（不放松）：“基督说他爱众人，包括没有入教的人，甚至基督徒应爱敌人，只是他们不爱土耳其人……我说，基督向着受迫害的人。在我们那儿，库尔德人象早先的基督徒一样也坐牢，因为他们要有自己的文化。基督也是向着他们的。”

教士（十分恼火，僵硬刻板地站起）：“好了好了，我们现在得结束了。劳驾，请你再到第一个房间去。我的女秘书会送你出去……”

与第一次走访时的那个粗鲁的家伙不同，这次高级教士以高雅的贵族方式把我轰了出来。阿里在这里也不受欢迎。尽管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几乎没有一个土耳其人想要改信天主教（鉴于他们受到基督的仆人这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敌意和屈辱，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也完全不能容忍他参加到

官方教会这个心满意足自以为是的基督教徒团体中去。我们不得不在我们的学校、郊区和火车站容忍他们，那已经够了，我们的教堂——即使还是那么空空的——应当保持纯洁，不让土耳其人涌入。

阿里走访的下一个神甫的住宅是一幢多层楼房，到处都布满卡车上用的后视镜。房子共有十几扇窗户，每扇窗户旁都装着一面镜子，这样就可以事先窥视大门口的来客。

阿里第一次按铃，门没有开。过了半个小时，他再试一次，按完铃后立即贴紧房门，这样从镜子里就无法看到他了。

门开了，一个中年神甫藏在二层楼上。他冷漠地无动于衷地听阿里讲他的心事，并不请他进去。

“这是个固执的想法，”他训斥我（阿里）。“是谁让你这样想的？”

“基督在呼唤我，”我仿照给儿童看的圣徒故事的说法回答。“我愿追随他。”

“你只是想伪装自己，以便更容易搞到居留证。你承认不承认，促使你要求参加我们教会的是政治原因。你只是谋求你个人的利益。”

“基督也帮助政治上受迫害的人，”我回答。

“要是你反抗国家法律，你就会到处受到追捕。我们德国也是一样，”他教训我说。

“土耳其不民主，独裁，”我反驳道。

“这全都是时髦语，”他向我解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合适的国体。有些民族还不成熟，不能实行议会民主。”

他考虑片刻。“你究竟想要什么，你们土耳其有一个民选的议会。”

“是军人任命的，”我说，“民主政党受到禁止和迫害。”

“这一切并非事出无因，”他继续大谈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制止肆无忌惮的恐怖活动和动乱。”

“军警搞恐怖活动，拷打政治犯，”我回答。

“你实说吧，你是共产党，想混进我们中间。我们在监狱里向犯人提供灵魂上的帮助，帮助任何一个罪人，只要他迷途知返。可丧尽天良的分子在我们这儿是没有容身之地的……你最好回到你来的地方去！”

我不知所措地望着他。

“要是我把你看错了的话，”他改口说，“过了复活节你可以再来我这里约定一个时间。那时候我就有时间更仔细地了解你的情况，进一步考察你对基督的态度。”

阿里领教了。这就够了。他认为第二次走访是毫无意义的。在他看来，这个神甫对基督的理解同样是一清二楚的。

“您见到主基督时请向他致意，”阿里告别时说，想了一想，更多是对自己说：“不，他在这儿早就死了。”他一边下楼一边嘴里吹着他最爱唱的歌曲《万能的上帝我们赞美你……》，把神甫都搞糊涂了。

阿里仍不死心。总应该能找到一个教士严肃履行自己的基督教使命，不因为贪图安逸、偏见和近乎露骨的排外情绪而拒绝进行一次尽快的灵活变通的洗礼这种不言而喻的事情。

可是他后来走访的另外两个教士也无视他的困境的紧迫性。一个年轻一些的神甫用下面的话把他打发走：“我们不接受那些按照别人意愿，因为有利可图而改信天主教的人。我们不是保险公司，你得知道。”另一个年纪大一些的教士，作为上层社会的神甫，居住在一幢宫殿式教士住宅里，让阿里背诵“主祷文”，领读祈祷文“向你致敬，圣母玛利亚”并且还要领

唱一首赞歌。阿里决定唱克里斯托夫·冯·施密特<sup>①</sup>的“……他怀着为我们谋求幸福的深情厚意，走向死亡……”，可是到头来还是碰壁。

他想知道“祭坛侍者”这个词在土耳其语中怎么说，真使我格外为难。“古鲁尔，古鲁尔，”我胡编说。“古鲁尔，古鲁尔，”他一本正经地重复说。

神甫：“你住在哪儿？”

阿里说了一个地址，并补充说：“索纳家地下室。不让任何人知道，因为这个地下室——没有窗子，潮湿——是不允许出租的。”

神甫：“你究竟报过户口没有？”

我(阿里)(迟疑)：“没有，索纳家不愿意。此地人不把象样的住宅租给土耳其人。”

神甫(严厉地)：“那我就绝对不能让你参加神课。你先去搞一张合格的户口证。然后准备阶段起码要一年。你自己将会看到上神课大有好处，这样就能真正得到基督教信仰，知道现在自己真正是其中的一员了。”

我抗辩说：“要是到那时已在土耳其坐牢，这又有什么用？”

他无动于衷。“这些都是次要的政治原因，不能影响我们的决定。”

阿里已经不想再说了。这时他突然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他觉得这句话也适用于天主教教士。

迄今为止，阿里所走访的教士都是在他居住地附近和他

---

<sup>①</sup> 克·冯·施密特(1768—1854)，德国神甫、青少年读物作家。——译注

早先熟悉的地方碰巧找到的。这一次他到100公里以外的乡下，找到一个在他看来是最穷困的、那里的教堂也是最破旧的地方停住。他向神甫住宅走去。一个年轻人打开门。

我(阿里)：“我可以见神甫吗？”

“可以，我就是，”身穿便服、衬衣领子敞开的年轻人说。阿里第一次见到一个天主教教士不穿制服。年轻人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去。

阿里开始谈自己的问题。没有等他讲完，教士就打断他的话：“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现在你想受洗吗？”

我(阿里)：“是的。”

教士：“好，当然可以。我们可以做。过几天。那时你就是天主教徒了，我给你开一张洗礼证明书。不就完了！”

没有推三阻四，没有搬出主教，也没有提什么迷信的、伪善的、伪基督教的、宗教法官似的问题，他就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知道此事对阿里关系重大，便自发地作出了符合基督精神的行动。

“在这之前我们还要再谈一次，”他说，“然后你就第一次成为我们教会的成员，以后我们会更好地了解。尽管如此，要是外事警察还找麻烦的话，你可以指望得到我的帮助，那时就会万事大吉，”他鼓励我说，“那你就不会有困难了。”

我向他表示感谢。我发觉这个一点也没有官架子的年轻教士说话带有一点东部地区的口音。——后来我获悉他是四年前才离开波兰的。也许是他自身经历使他能够和一个受迫害的外国人打成一片，至少能体会其处境。不过他的移情能力也有可能是在我们这个“德国自由部分”<sup>①</sup>才学会的，因为

---

① 指西德。——译注

他自己曾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不管怎么说，我宁可姑隐其名，因为我不得不担心，公布他那充满人性和基督精神的行为，会使他被他的上司看作是严重失职而受到相应处分。

又及：我更多是偶然得知，在其他情况下提供圣洗可能非常慷慨，不按常规办。如果有个“不信上帝”的非天主教徒申请担任一个由天主教会主办的学校的校长，某些社会集团对候选人又取得一致意见，那末，在短短几天之内便可完成全部手续，吸收此人参加天主教会，而这是有助于一个人的升迁发迹的。

如果一个天主教医院的内定院长没有受过洗，那末不用经过神课学习和坚信圣经考试，也可以很快被吸收。只要向教会奉献一小笔自愿捐款，三天之内就可以举行闪电式洗礼。

有人可能会指责我（阿里）没有去找新教教士。这一点也许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因为我在五岁的那一年就毫无必要地被迫接受了一次令人十分难堪的天主教洗礼。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父亲得了败血症，躺在一家天主教医院里。他被认为已经没有希望，被送到一间小小的所谓临终房去已有三个星期了。护理人员——修女们——对他这个具有洗礼证明书的天主教徒反复诉说他对上帝犯下了严重罪行，因为他没有举行过天主教结婚仪式，并且让我——他的独生子——举行了新教洗礼。在面临死亡的情况下，他同意弥补这一切，于是便在一间斗室举行了一次婚礼，我第二次受洗，这一次是天主教的洗礼。时至今日，我仍记忆犹新，当时的场面别提有多么虚假别扭了。人们给我披上洗礼服，塞给我一支蜡烛，一个苦修会修士宣布我从今以后名叫约翰内斯。我还抗议说我叫冈特，但仪式仍不中断地继续进行。

按照天主教的信条，这种作法也纯属多此一举，因为天主教的主张是：一次受洗即终生受洗。

再者：我父亲在这次热闹场面后过了几周病就好了。医院的修女们根据我父亲“主动悔罪”而谈什么奇迹，不过她们避而不谈医院院长曾竭力使我父亲作为科隆首批病人之一得到美国军政府提供的青霉素的成功治疗。

反正，我就这样成了天主教徒。

## 人 间 乐 园

由于他们整天高高兴兴、和和气气，在红色衣服上别着椭圆形木质证章，象孩子一样无忧无虑，阿里还顺路到巴格万<sup>①</sup>的信徒们那儿去一次。

这是一种新的运动，自我标榜为世界宗教，对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的新形式进行试验，不象大多数其他宗教那样排斥性欲，把性欲列为禁忌或者使之失去乐趣成为单纯的繁殖本能，而是可以游戏似地、轻松愉快地、无拘无束地而且是不限于成双成对地尽情享受。阿里希望在那儿不会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遭受歧视。他的朋友和同事阿卜杜拉陪同前往。

与阿里相反，阿卜杜拉从一开始就不对官方教会掌管的基督教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和幻想。这一次他比较不带偏见地随同前往，也想要争取被巴格万们所吸收。

位于吕蒂希大街的总部是一个咨询处，地处上等住宅区，位居中心地带。这里的许多房屋都属于“拉纳希建筑公司、科赫及合伙人民法公司”所有。接待室里陈设着光洁、贵重、漂

<sup>①</sup> 印度一教派名，从70年代起在美国和西欧获得众多信徒，鼓吹集体生活、性自由、享乐。教主名拉纳希。——译注

亮的家具。没有象有些教派那里常可见到的那种拙劣庸俗的东西。

我们走进的时候，两位教徒正在两部电话机前打电话。他们电话打得如此专心致志，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看样子既不是在传教，也不是在谈信仰问题。一个在报营业额并且一再为自己辩护，因为申报的数目显然没有达到规定指标。另一个似乎在给他的谈话对方上有关财产转让的速成课，谈到什么“预先定好日期的赠与”和“完全合法地规避遗产税”。此外还谈什么“刚从美国传来的最新信息：下半年一定要抛售美元兑购黄金！”

这两位教徒看上去象是年轻的经纪人，或者更象是那种吊儿郎当的交易所投机商，一点也不固执，但就事论事却也毫不含糊。他们让我们足足等了10分钟，有一个才报完营业额，装作好象这时才看到我们：“有什么事？”他招呼我们。

“想入会，”我说。

他以轻蔑的眼光打量我们：“入会？这事可没有那么简单。”有点不怀好意地试探：“你们想要住宅和工作吧？”

“要是行的话也要，”我说，“不过不仅是因为钱。不想再孤孤单单，想要真正共同生活。”

他：“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我想，这对你们来说会需要一段时间的。”

我(阿里)：“多久？”

他不想说死。“各有不同。我们没有统一规定。这要看一个人对巴格万的教义是否熟悉以及入会的愿望多么强烈。”

我(阿里)：“非常非常强烈。”

他(怀疑地)：“你干吗这么着急？”

我(阿里)：“想一切从头来。不然也得去土耳其坐牢。”



我讲了受政治迫害的故事。

他虽然年轻、不教条并且自以为教诲得法，但还是明显地象教士一样作出反应：“我有点明白了，你是想以此做交易，希望从中得到和你的职业或政治地位有关的什么。对吗？”

我(阿里)：“不。只想留下参加。”

他：“是呀，你想到我们这儿来，是因为你想留在此地？”

我(阿里)：“也对。”

他：“这不是个理由。这样我们就不能接受你。”

我(阿里)：“不。可我也主张共同生活。不是各人自己挣钱，而是公有。女人也不归个人私有，而是大家共有。”

他：“我看你还是留在你原来的地方为好。对你来说，到我们这儿来，这条路太远了。”

我又把人惹翻了。巴格万运动初期所宣扬的共同生活的狂热阶段，可以说是吸引全世界中、上层社会形形色色失意者的诱饵。现在这位大师——本人由于某种痛风病而受阻，而且大概也怕得艾滋病——更多地提倡清心寡欲和一夫一妻。他的新口号不再是群交，而是老掉牙的货色：高消费，为了享受而尽情享受。例如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轿车，争取做到每天换一辆，每辆车的价格是30万马克。这连他的信徒也做不到，完全是好高骛远、想入非非。

对于巴格万的门徒来说，我的要求太狂妄无耻了。同某些半信半疑的左派导师(如巴洛)也许还可以共居相处，可是对待一个流浪的土耳其穷劳工，从前的优等民族<sup>①</sup>的全部偏见又都表现了出来。

我们又到靠近弗里森广场的芬洛大街巴格万中心去走

---

<sup>①</sup> 希特勒把某些民族视为“优等民族”。这里指德意志民族。——译注

访。坐在接待处的是两名妇女和一个年轻男人。

当那两个女人看到两个土耳其候选人走进来时，她们交头接耳并扑哧一笑。我们站在她们面前，她们先是不理我们，翻阅卷宗。

于是我们就继续四下里张望。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大约有30个巴格万信徒坐着和站着象着魔似地看电视。但所看的并不是足球转播，也不是鲍里斯·贝克尔<sup>①</sup>的网球比赛。正在放映的是来自美国俄勒冈州大师的一盘录象带。他被一群欢欣鼓舞、站着向他欢呼的信徒围住。他本人坐在罗尔斯—罗伊斯轿车里缓缓行进，把车窗放下，慈祥地向他的狂热信徒略略摆手，脸上流露出幼稚的沾沾自喜表情。

全部过程配上一种轻松愉快的、原地踏步的啦啦啦摇摆乐，而科隆的巴格万教徒们象俄勒冈的信徒们那样按照轻松愉快的节奏扭动着腰，有几人用手打拍子。一句话也不说。

### 巴格万语录

自私是人的天性。这不是一个善恶问题。最能干的人活得更长，能干的人应掌握权力。有权就有理。你们作为德国人应当懂得这一点。——我爱此人(希特勒)。他发疯了。他没有听他将领的话，而是听星占学家的话。尽管如此，他有五年之久总是打胜仗。他象圣雄甘地一样有道德。希特勒实质上是印度教徒，甚于圣雄甘地。他是圣人……我是完全不可侵犯的。我会攻击每一个人，而没有人会攻击我。这是事实。

——引自《明镜》周刊，1985年第32期

---

① 联邦德国著名网球运动员。——译注

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礼拜，我们又回到接待处去。我重新提出申请。我们似乎没有被人注意，实际上却被人偷偷地密切注视着，就这样等了半天之后，那个大约30岁的男人才向我们转过身来。阿卜杜拉已经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击柜台有一阵了。

我(阿里)阐明我的问题之后，对方满不在乎、吊儿郎当地说：“不，这样不成。这儿不是什么你可以随便参加的联合会。先得开始坐禅。这需要时间，每次功收费五马克(他指的是每一小时——作者)。等你做到一定时候，才可以和中心协调人谈教名问题。”

我(阿里)：“这是什么？”

他(语气生硬、玄妙深奥地)：“这就是我们这儿所做的。”

我(阿里)：“我们土耳其人总是很孤独，很想同德国人和其他人一起过集体生活。”

他(拒绝地)：“是呀，你自己根本无法判断什么对你有益。这要到以后由别人来替你决定。你得先对其他人产生感情……”

我(阿里)：“感情是有的……”

他：“你根本没有资格自己作出判断。”

我(阿里)：“你们的头头巴格万不也是个外国人。”

他(生气)：“巴格万是我们的印度大师。”

我(阿里)：“那就也有许多印度人参加了。”

他(思索)：“不，其实不。更多的是德国人和美国人。”(巴格万没有印度信徒。他在本国被看作是江湖骗子，因此印度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肉体和精神都已死亡的国家”。——作者)

我(阿里)：“巴格万住在哪里？”

他：“现在住在美国。可以到美国去访问他。”

（信徒们被定期大批送往美国，10天向巴格万缴费3000马克，另外还要从事无偿的艰苦的田间劳动，被称之为“礼拜”。）

我（阿里）：“我知道德国人在你们这儿过集体生活。你们为什么不收土耳其人？”

他：“问题不在于我们在一起生活。这儿关键在于巴格万是我们的精神导师。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这是最最重要的。你可以独自生活，你在外面有工作，干你的工作，每年可以比方说去俄勒冈一次。过集体生活的人就得互相合得来，而且事先还要经过特别考验。”

我（阿里）：“我们没有工作，没地方住。参加进来很不错。只要很少一点钱。”

他：“是呀，在我们这儿这样是不行的。你没有住宅或者没有钱，这不成为理由。如果你就是愿意和巴格万在一起，这就不同了。明白吗，这来自另外一个角落，不是你所说的。我差不多想说，我们不大合得来。”

侨居美国的印度教派领袖什里·拉纳希打破了他对公众长期保持的沉默，在1985年7月对ABC电视公司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说，他是“富人的宗教导师”，运动的最主要目标是“发财致富”。巴格万在回答他为什么不用他的巨额财富去消除社会贫困而是宁可花在他的罗尔斯—罗伊斯车队上的问题时说：“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关心穷人。我关心富人，请你们别来打扰。”

光是在德国就有十几家迪斯科舞厅、一系列素食馆、商店和建筑企业在为巴格万挣钱。

## 殡 葬

被上帝的雇员——除了一个例外——拒之门外，受到巴格万教派偏执狂者的教训和嘲笑的阿里，想要有个安身立命之处。由于他在活人那里到处碰壁，这一次他就到死人那里去碰碰自己的运气。他有此雅兴！德国有句谚语：“他们向活人和死人敲竹杠……”为了准备这次阴曹地府之行，他（阿里）穿上他的高档黑色西服。为了渲染他的虚弱，他借来一辆轮椅，一个陪同者推着他前往这座城市最大最著名的殡仪馆。

阿里事先没有预约。他被推了进去，殡仪馆女老板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这个女人年近40，神采奕奕，初看并不叫人感到讨厌。阿里叙述了他的问题。由于在石棉加工厂（尤里德工厂）工作，他得了支气管癌和肺癌。医生告诉他，两个月后他就要死去。他来此目的是为自己的入殓和运回土耳其作好安排。

以下的谈话（略有删节，但完全如实）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酷无情的和不人道的死者崇拜的文献。在这里，一个仍然活着的人就已象一样死东西，作为不再活在世上的人，象一堆垃圾似的被清除。女老板连问都不问一声我（阿里）的情况，虽然我（阿里）一点也不象病危的样子。她一句话也不提也许还有可能医治我的病。她不想表示任何一种方式的同情，因此很快便言归正传：

女老板：“空运也得看您的重量。棺材得放进运输箱，然后一起过秤。价钱按重量和路程远近……”

我(阿里)：“很远，在土耳其，卡什加尔山，靠近俄国边境。”

女老板：“这很可能要看我们是用汽车还是飞机运了。我们得把您送到机场，到了以后还得到机场去接您，不然您就得留在机场了。要是从头到尾都用汽车，我们就可以把您直接送到埋葬地点……您参加的是什么医疗保险？”

我(阿里)：“普通。”

女老板：“还工作吗，或是已退休？”

我(阿里)：“生病一年多了。”

女老板：“您生病前是否还在工作？”

我(阿里)：“是的，在石棉厂，没有面罩……”

女老板(不快地打断他)：“这与此无关。问题是，您想要汽车运还是空运。空运就有重量问题。”

我(阿里)：“我不重。医生说，过两个月，死了的话，轻得象小孩。因为变得越来越小。”

女老板：“不错，不过身長是否还是一样？小孩就不会那么重了，因为小孩的棺材小一些，而棺材还得再装进运输箱，不让旅客们和机场上的人看出是在运送尸体。”

我(阿里)：“我要是不用棺材，而是火化呢？”

女老板：“火葬？那您就会在这儿火化，然后骨灰盒可以邮寄。”

我(阿里)：“这不要那么多钱吧？”

女老板：“这就少多了，全部运输费用都省下啦。要是您在这儿火化，全部费用也许只要 2500 马克，再加上邮寄费用。”

我(阿里):“弟弟能否用塑料袋带走?”<sup>①</sup>

女老板:“不行,绝对不行,这里是不会给的。必须送到安葬的地方,这也得事先提出申请,实际上必须由安葬骨灰盒的老家向这儿的火葬场寄来证明,同意骨灰盒在那儿安葬。有了这个证明,才可以寄走。”

我(阿里):“能否这样,私下里花一点钱?”

女老板:“不,不行。这里是不会给私人的。”

这位太太很会做生意,亲自出马操持这件事。她推着坐在轮椅里的我(阿里)去看棺材。当我(阿里)问她:“骨灰盒和大棺材,哪个好看?”她变得木讷起来,转变之快令人吃惊,并把注意力转向价格更昂贵的运送尸体的棺材。“您说的是骨灰盒还是棺材?好吧,既然您问起我,棺材当然好得多。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来吧!”她对我的德国陪同者说,一边向坐在轮椅上的我弯下腰来给我量尺寸。棺材库的沉重滑门发出嘎吱声,从隔壁一间大厅里传来木工拉锯声。“您最好亲自去看看您最喜欢什么,各人的爱好都不同嘛。”——话里含有这种意思:“您可以躺进去试试,看哪一口棺材最舒服。”

她敲敲一口简陋的栎木棺材。“这种现在是标准式样。不过,如果您想要更结实耐用的……这种您觉得怎么样?”她的声调变得柔和起来,带有献媚的味道,好似在向我推销结婚用的可以毕生受用的双人床。“真正的德国栎木,十分坚固。这是眼下我们所有的最重的一种。全是结实的栎木,”她再次强调。“而且内部用绸子铺衬。”

<sup>①</sup> 这个问题并非生拉硬扯、想入非非,它是有现实背景的,不过不是发生在土耳其人当中。相反,科隆一家工厂老板,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外表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美国设有分公司,不久前曾用塑料袋把在国外疗养突然死去的兄弟的骨灰偷运回来。也就是说,把骨灰放在一个廉价骨灰盒里,套上一个免税商店装香烟的塑料袋。——原注

“我看一看，”我说。她的反应有点勉强，好象我在家具店里要求到双人床上躺着试试似的。“维利，来帮帮忙，”她喊隔壁房间里的伙计和（或）丈夫。维利很快走过来。他气派不凡，但有点拘谨。“我们在谈把他运往土耳其的问题。他只能再活两个月了，想看看棺材，”她介绍我（阿里）说。他们俩把沉甸甸的棺材盖掀起。

棺材内是原木。“没有好料子，”我提出指责。“你不是说躺在里面很软和吗？”

两人象是被抓住的骗子一样面面相觑。“肯定还会往里放的，这您绝对可以放心，”维利煞有介事地说，“这我们完全担保。”

“多少钱？”

“4795 马克，”维利看看一张价目表说。我（阿里）摸一摸木头，用指节骨敲击栎木发出噤噤声。

“经久耐用吗？”我（阿里）想知道。

“是的，这是上等木工活，可用五六年，”他安慰我说。

可是阿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在生活中人们从来没有让他选择，现在至少在死的时候他想要自由选择。“有没有看上去不那么令人伤心的棺材？完全彩色的，叫人心里稍许高兴？你知道，我老是住阴暗潮湿的房子，现在想至少能有个漂亮棺材，明白吗？”

两人交换了短促的眼色，但迅速掩饰了他们的惊愕。“直接用彩色比较困难，非常罕见，不过您看那一个怎么样？”维利说。那个女人推着我走向漆得锃亮的高档硬木棺材。一个比一个更难看、更俗气，阿里心里想并问：

“是塑料的吗？”

“保证真正的桃花心木，”维利急忙加以肯定，“我们这里



比较罕见的最珍贵的式样之一。”

“再来一点雕刻，”阿里要求说。

“嗯……，原来是这样，您指的是雕花。是的，您看这种法国式怎么样？价格优惠，如今只要 3600 马克。从前要 4000 多。”

我(阿里)：“是法国货吗？”

殡仪商维利：“不错，是法国货。”

我(阿里)：“你看哪一种更漂亮？”

殡仪商维利：“这是个人爱好问题。那是完全另外一种。”

我(阿里)：“有钱人——德国人喜欢什么样的棺材？”

殡仪商维利：“是呀，大多数是德国棺材——栎木什么的。”

我(阿里)：“那什么人要这种呢？”

殡仪商维利：“往往是为了运走。运往国外。法国人，或者还有意大利人。”

我(阿里)：“这经久耐用吗？”

殡仪商维利：“是的——不过运往土耳其还得要一个锌棺，里面加一层锌皮……”

我(阿里)：“是这样，白铁皮……”

殡仪商维利：“那就是说，要把您完全焊在里面，否则我们就无法把您送往国境。实际上在这儿先焊上，然后再加木盖。”

我(阿里)：“多少钱？”

殡仪商维利：“是呀，连锌皮和焊接在内大约 6000 马克。”

我(阿里)：“能不能打个折扣？”

殡仪商维利：“要是您预先定货并把货款事先付清，价格还可以商量。我们可以给您打九五折，那就只要 5700 马克。不过您得立即付清。”

我(阿里)(吃惊):“要是我此后死不了,是否能退款?”

殡仪商维利:“不行,顾客无权退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照顾,减价收回。可是,不是说,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他安慰我说,“您已完全肯定……只是还有两个月……”他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好。当着我的面,“死”字他难以说出口:“……对,我们还得知道把棺材送往土耳其什么地方,还得加上运送您的费用。”

我(阿里):“我们住在山上,靠近俄国,风景很美,你可以去度假,住我家,不要钱。”

他不动声色,没有答理:“我反正不会跟去。我们雇个司机,必须……(他顿了一下,算了算)……对,每公里得收费1.3马克。而且是往返都得算。”

他想知道卡什加尔在什么地方,然后说,光汽车费一项就需要约一万马克。“要是我现在还活着就回去,不是更便宜吗?然后再火化或做棺材?”我使他感到为难。“这就不属于我们管了,”他哼哼说。“只有医生开的正式死亡证,我们才可以接受您,如果火葬,还得有一名官方医生事先再专门检查一次。”

“死了也就死了,”我说,“全都一样。”

我(阿里)指着一个样子很好看的陈列品——一个很精致的骨灰盒,设计得很精巧,不象其他骨灰盒那么难看。“这个,要是火化,我能不能进去?”

“不,不行,这没法用。那是陶器。只是陈列品。不出售。那是从前的古物。”

我(阿里)明白了。在我的陪同推我出去的时候,我被告知,这家殡仪馆同有关的医疗储金管理机构“有关系”,他们“会偷偷地去打听,我们会知道医疗储金会会给多少丧葬费。到时候我们再看。”

## 活 地 狱

我不相信能够出现巨大的变化，如果自己不以某种方式也落进火坑的话。我对任何一种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的“外界”活动抱极端怀疑的态度。

——奥迪莱·西蒙：《一个工厂女工的日记》

我(阿里)想到汉堡附近格林德的尤里德工厂石棉加工部门去找个差事。这家工厂是生产石棉衬片的。土耳其朋友告诉我，在最有害健康的岗位上工作的几乎全是土耳其人。有关石棉加工的严格的安全规定在该厂不起作用。致癌和致人死命的纤维尘在空中飞舞。防尘面罩有时不戴。我认识几名以前的工人，他们在那里工作半年至两年后都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和肺病，如今正在进行斗争，力求使这些病被承认为职业病，至今毫无结果。

难就难在该厂目前暂停招工。虽然如此，还是一再有人受到雇佣，他们的办法是向某些工长行贿或“送礼”：真正的土耳其地毯或贵重的金币。我已经从一家钱币商店弄到了一枚古代奥斯曼帝国金币这样一件传家宝，后来碰巧遇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我获悉杜伊斯堡奥的古斯特·蒂森钢铁厂自从一些时候以来就在裁减基本工人，通过承包公司雇佣更便宜、更听话、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临时工。自从1974年以来，该厂

已解雇了约 17000 名基本工人。这些人的工作许多都由承包公司的人员顶替。仅是杜伊斯堡的蒂森钢铁厂就与 400 家承包公司有合同关系。

我认识一名 27 岁的土耳其工人，他是劳动局介绍给阿德勒承包公司的。我了解到，阿德勒公司把工人卖给雷梅特公司，雷梅特公司又把他们转卖给蒂森钢铁厂。他所叙述的工作条件和剥削方法——我只是听说，未曾亲身经历和证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或许可以与最黑暗的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相比。为何要舍近求远呢，恶劣的情况就近在眼前。

为了在 5 点钟赶到奥伯豪森——布什豪森高速公路岔口处雷梅特公司的集合地点，我清早 3 点就起床。雷梅特公司是一家正在大力进行扩张的企业。在合乎时宜的绿色公司招牌上写着“服务行业”。雷梅特公司承包清除各种污垢的业务。

这家公司为蒂森、曼纳斯曼、曼恩等工厂清除各种尘土、有毒的污泥和垃圾、腐烂发臭的油脂，清洗滤器。光是公司的车队就价值 700 万马克左右。阿德勒公司又是雷梅特公司的一部分，就象洋娃娃手中的洋娃娃。阿德勒把我们卖给雷梅特，雷梅特再把我们租给蒂森。蒂森支付的主要费用——按照任务和尘土、污秽或危险程度每人每小时在 35 到 80 马克之间——由两家均分。阿德勒付给劳工 5 至 10 马克的施舍。

雷梅特或阿德勒的工人在蒂森钢铁厂常常也顶替正式工人，例如在炼焦厂，和蒂森工人一起干活或在他们旁边干活。此外，雷梅特还在联邦德国许多城市把 600 多名清洁女工出租给大工厂。

一个工头站在一辆准备出发的破旧面包车旁，手持名单点名。“新来的？”他简短地问我（阿里）。

“是的，”我回答说。

“在这儿干过？”

我不清楚回答会对我的雇佣有利还是有害，为了以防万一，只耸耸肩膀。“你听不懂？”他又问了一句。

“新来的，”我也如法炮制。

“跟大家上车，”他指着一辆旧的奔驰面包车说。就是这些。欧洲屈指可数的最现代化的钢铁厂的招工就是这样简单。不要任何证件，连我的姓名都不问，在这家世界闻名的国际性企业中暂时似乎也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国籍感兴趣。这正中我下怀。

破车里已坐着9个外国人和两个德国人，挤在一起。那两个德国人占了车上唯一的固定座位。外国人坐在冰凉肮脏的金属地板上。我坐到他们中间，他们挤紧些给我腾出地方。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用土耳其语问我是不是他们的同胞。我用德语回答：“土耳其国籍。”但我是在希腊（比雷埃夫斯）长大的，母亲是希腊人。“父亲是土耳其人，在我一岁那一年，他遗弃了我们。”

这样，我也几乎用不着会说土耳其语了。这显得合情合理，在这以后我在蒂森工作的半年期间也一直沿用这一说法。每当有人问起我（阿里）童年呆过的地方，我可以扯一扯比雷埃夫斯的情况。在希腊法西斯军事独裁时期，1974年我在那里被拘留过两个半月。只有一次差一点要我好看，土耳其同事们非要听听希腊话怎么说不可，幸亏我在学校里犯的一次错误解救了我：当时我没有选修法语而是选修了古希腊语。至今我仍能背诵《奥德赛》中的片断：“*ándra moi énepe moúsa……*”<sup>①</sup>

---

① 希腊语：“女神啊，给我说那足智多谋的英雄……”——原注

虽然古希腊语和新希腊语的差别甚于古高地德语<sup>①</sup>和当代德语的差别，但这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汽车挤得满满的，稀里哗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一个椅子的固定处已经脱落，在车子拐弯时多次滑到坐在地上的外籍同事身上，使好几个人倒成一堆。暖气有毛病，后门又关不上，只是用铁丝缠绕着。如果遇上急刹车，一个人猛地撞上去，很可能把门撞开而摔到马路上去。经过颠簸和寒冷的折磨，15分钟后这次玩命的行驶才暂告结束，汽车停在蒂森第20号大门里边。队长发给我一张出勤卡。蒂森的一名警卫发了临时通行证。他对我的姓很反感：“这可不是人名。这是一种病。没有人会写这个。”我反来复去地把字母拚给他听：S-i-n-i-r-l-i-o-g-l-u。尽管这样，他仍然把它错写成“Sinnlokus”并且把它当成名字。我的第二个名字倒变成了姓。“怎么能叫这种名字呢！”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平静下来，尽管他自己的名字“塞曼诺夫斯基”诸如此类对一个土耳其人来说也很难念，并使人推断他的祖籍是波兰。再者，上一世纪被招到鲁尔区来的波兰劳工当时也受到类似的蔑视，起初也被孤立于社会之外，如同今天的土耳其人。那时候鲁尔区有些城市50%以上的居民是波兰人，他们曾长期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我向计时机塞纸卡时动作慢了一些，耽误了我后面一个德国工人几秒钟。他不满地叽咕道：“你们非洲是把章盖在脑门上的吧！”

土耳其劳工梅赫梅特帮我忙，教我怎样正确地移动计时卡。我感觉到，其他的外籍劳工把德国人的话也看作是冲着他们说的。我从他们羞愧颓丧的目光中看出这一点。没有人敢

<sup>①</sup> 德国中部和南部方言，自810年左右有文字记载起至1100年左右。

——译注

回嘴。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这种情况：即使是最严重的侮辱他们也忍气吞声，假装没有听见。这大概也因为害怕引起斗殴。经验表明，如果发生斗殴，外国人往往被说成是罪魁祸首，并在此借口下被解雇。因此，他们宁可退避三舍，忍受每日每时的不公正待遇，以免给人以口实。

我们继续乘车摇摇晃晃地穿过厂区，过一会儿来到一个堆放集装箱的地方。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早晨我们都得在寒风中等待“长官”乘坐他的奔驰汽车到来。“长官”是总监工的外号，他长得很结实，粗壮如牛，可自己什么也不干，只管给“他的手下人”派活，督促和监视他们。他的名字叫岑特尔，30来岁，是雷梅特公司的正式职工，有时应邀参加阿德勒的宴请，被认为是他的代理人 and 心腹。现在的时间刚过6点。新的劳工从雷梅特公司其它车辆上下下来，我们站在黑暗中，冻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集装箱是收藏工具的地方，那儿放着手推车、铁锹、十字镐、风动工具和吸管。我们无法呆在那里。

周围是一片喧嚣，稀里哗啦，从附近的厂房里传来时强时弱的轰鸣声。在这里，你抬头看不到蓝天，只有浅红色的烟云在翻滚。从高大的烟囱里喷出蓝色火焰。这是一座由黑烟和煤灰构成的工厂城市，它向周围的住宅区延伸得很远。工厂有20公里长，将近8公里宽。

人群活动起来。身穿黄卡其服装、活象个雇佣兵的“长官”把他的奔驰车车窗放下一些，开始点名。他每天都重新编组，每次都把队伍打乱，目的是防止工人们彼此搞熟，形成一支团结一心的强大队伍。工人们必须一再重新互相适应，还有新的等级斗争和你争我夺。这也许是漫不经心或专横跋扈，也许是别有用心的计谋。在相互一无所知的人群中，哪有团结一致可言，相反，占上风的是竞争、猜疑和恐惧。

叫到了我的名字。后面有人使劲揪我的耳朵。原来是队长想以这种方式使我明白该怎么办，应该参加哪一组，同时他向我（阿里）咧着嘴笑，也许并不怀恶意，虽然我起先有这种感觉。我们被当作牛马一样对待。

我们在一座提升井架前下了车，在半明半暗中带着铁锹、十字镐、手推车和风钻爬上好几层，去清除传送带下面积存的脏土。气温零下十几度，寒风刺骨，我们自动开始拼命干起来，以便使身上稍稍暖和一点。一小时后我们的队长偷偷地溜走了，因为他只是象征性地干几下，因而冻得更厉害。这时我们试图点火取暖。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周围，炼铁炉的炉火火光冲天，炽热的炉渣自动倾泻到巨大的运输车里，看上去好似它们在运输大炸弹，铁水象燃烧着的涓涓细流，注入指定的凹槽。

在有十几层楼高的炉膛里烈火熊熊，可是这儿在我们的井架上要点着一点点火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开动脑筋。我们在传送带之间寻找焦炭碎块，用风钻把几块木板——它是别的同事在休息时当板凳坐的——弄碎。可是，起先没有纸怎么也点不着。最后还是找到了几个空烟盒和几张用过的纸手帕，慢慢地，借助鼓风管，在一个手推车上把火引着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烤火取暖，我们就又被调走了。工头跑来下命令：“统统下去，带上工具，快，快！”我们试图保住火种。可是不行，这时手推车已经热得烫手。我可以体会石器时代人的难题，他们把火种当作最珍贵最神圣的宝物加以保护。我们又钻进冰冰冷的破汽车，紧紧地靠在一起，又摇摇晃晃地穿过有时被生产时产生的微弱闪光照亮的黑暗。一直还在厂区内，不过是完全另外一个区。到了施维格恩我们下了车，那里是磨焦机的地方。我们拾级而下，一段又一段，光线越来越暗，空气中的尘土味也越来越浓。你以为，现在这灰尘这么大，真



叫人受不了啦。其实这仅仅是开始。发给我们一台空气压缩鼓风机，用它吹掉堆积在机器上和缝隙中足有半寸厚的灰尘。转眼空气中充满尘土，伸手不见五指。这已不仅仅是吸进灰尘，而是在大口吞咽尘土。它使人窒息，每吸一口气都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你想憋住气，可是行不通，因为你得干活。工头象劳改犯的看守一样站在能流进一点新鲜空气的楼梯平台上。他说：“快干！两三个钟头就可以完工，又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了。”

三小时，这意味着呼吸 3000 多次，这意味着肺里灌满烟尘。此外还有焦炭瓦斯的气味，使人容易头昏。我问有没有口罩，梅赫梅特告诉我：“不会给的，因为戴上口罩干活慢。头儿还说没钱买口罩。”就连那些并非头一次来此干活的工人也害怕起来。一个名叫赫尔穆特的德国工人——他还不到 30 岁，看上去快有 50 了——说：“一年前高炉区瓦斯突然泄漏，死了六个工人。他们吓懵了，不是往下跑，而是往上跑，瓦斯也往上走。我的一位好友就在那个组里，他只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喝醉了，第二天早上睡过了头才逃了一命。”

正当我们站在尘土堆中把地上的尘土装进大塑料袋的时候，在我们下面几米处干活的几名蒂森安装工从我们身边急速跑过，爬上楼梯奔往室外。有一人在我们身旁跑过去的时候向我们喊道：“你们疯啦，这么脏的地方怎么能干活！”半小时后，蒂森钢铁厂的安全检查员光临。他捂着鼻子匆匆走过，一面对我们说：“安装工抱怨你们扬起的尘土太大，他们没法干活。你们快点把它干完。”说完就又跑了。我们一直干到下工。最后一小时，我们扛着沉重的集尘袋，沿着铁梯向室外走去，把袋子扔进一个集装箱。尽管这活儿很累，但我仍觉得能上去短暂地吸一口“新鲜空气”，令人有如释重负之感。

在 20 分钟休息中，我们坐在灰尘稍许少一点的铁梯上。土耳其伙伴们看到我没带吃的，就一定要我分享他们的面包。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内迪姆从自己的保温壶中给我倒了一杯热茶。他们彼此分享为数不多的东西，大家相处十分融洽，这是我在德国工人那里很少见到的。我发现他们休息时往往不同德国同事坐在一起并且自己很少用土耳其语交谈。他们往往用十分蹩脚的德语交谈或一声不吭，而德国工人却在那里高谈阔论。后来内迪姆把此中缘故讲给我听：“德国人以为我们在讲他们坏话。还有人认为，如果我们在一起讲土耳其语，我们就会变得太强大。他们什么都想听明白，以便能更好地指挥我们。”我自己后来有一次目睹土耳其工人在休息时用土耳其语交谈，因而德国人的代言人阿尔弗雷德勃然大怒，打断了他们：“你们有什么话要说，那就讲德语。在德国一直还讲正经的德语。等你们滚回你们老家的破窝时再说你们的屁话吧——但愿你们马上就滚回去。”

后来我和内迪姆谈起此事时，他把吕嫩的一个土耳其劳工从地方公共设施“青年之家”得来的一张纸片给了我。这张《外宾须知》上写着：

——“当着德国人的面要说德语，至少是在谈论德国人的时候。”

——“在德国，如果我们吃了大蒜，那就两天不和别人接触。我们要求我们的客人也这样做。”

——如果外籍青年认为自己“有权使用青年之家，因为他们、他们的父亲或某位叔叔在德国纳税，那末这种看法大体上也不错，只要他们接受这儿的风俗习惯，他们才可以这样说！”

蒂森没有这种铅印的守则，但许多德国人期望外籍侨民也这样做，而土耳其人往往也照此办理，克制自己，以免“惹起

事端”。

次日，在零下 17 度的室外，我们在 10 米高处干活。到处都有画着骷髅标志的牌子：“闲人莫入！”“小心，瓦斯危险！”另外几处是：“请戴防毒面具！”

没有人对我们讲过这些危险，也没有“防毒面具”。我们自己也不清楚我们算不算是“闲人”。

我们这个突击队的任务是用镐把金属平台上巨大的管道中流出的半冻的泥浆敲碎铲走。

在这上面，寒风刺骨，耳朵差一点冻掉，戴着劳动手套的手指冻僵了。没有一名蒂森工人需要在这种气温下露天干活，整个建筑业都有恶劣天气补助，可我们却得干。我们先用大镐把外面的冰层砸碎，常有碎片迸到我们脸上。本来我们是需要戴护目镜的，但没有人敢去要。从那些污垢中升起一股股呛人的浓烟，有时会使人看不见东西。我们用手推车把烂泥推到竖管口。铁锹在重负下不断变弯，连手推车也得重新敲直。从周围的机器房传来轰隆隆的巨响，彼此说话很难听得清。这一次用不着监工了，他已溜到某个餐厅里去了。由于稍一停歇便冻得难以忍受，我们自动地使出最大的干劲。有时我们当中有人偷偷地跑到一个小机器房里去。那儿机器轰鸣，声震九霄，犹如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里面，但机器是热的。我们把身子紧紧地贴在机器上取得一点温暖。这样做并非毫无危险，因为那儿同时有一根联杆在转动。得注意别让手指被弄断。有一次我摸错了铁皮，响起一声可怕的哗啦声和嘎吱声，火花迸发，好象一切马上就要迸裂似的。

接着又到外面去做苦工，我们冻得发抖，皮肤发青。一个叫优素福的突尼斯劳工干了六小时后说到了点子上：“这儿是寒冷的地狱。”“从前，奴隶的待遇也比我们强啊！奴隶还有一

定的价值，奴隶主希望奴隶干活的年头尽量长一些。而我们这里却不管你死活。反正等着找工作的新人有的是。”

在这当中，蒂森的一个负责生产安全的工程师过来，把一个盒子放在管道周围摆弄来摆弄去，用手敲敲盒子，嘟哝道：“不可能。”并吃惊地望着我们。

我（阿里）问他：“这个盒子是干什么用的？”——“这是检测瓦斯的，”他解释说，“你们这儿难道没有检测仪？那你们其实就不能在这儿工作。”——他解释说，如果指针超过一定标记，情况就十分危险，必须立即撤离现场，否则人很快就会昏迷。可是这个时候指针已超过红线。当我（阿里）向他指出这一点时，他安慰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仪器有毛病。我去拿个新的来。”——他去拿一个新的。半小时后他回来了，而新仪器的指针又超过红线。他恼火地拍打仪器，企图使我放心：“这不可能。这个破玩意儿又不灵了。”——当我（阿里）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的时候，他说：“即使仪表指示正确，这个数字还不足以引起恐慌。再者，风把瓦斯都吹跑了。”说罢就带着他的宝盒又走了，而我们则以瓦斯万一溢出还有刺骨的寒风来安慰自己。

土耳其劳工海尔韦利·拉吉数周后在同一工作地点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有那么一个仪器突然发出信号。我问这是什么信号。他们回答，如果瓦斯溢出，仪器就会发出信号。于是我说，这儿有瓦斯，仪器发出信号，我们是否应当停止工作？工长说绝对不行，继续干。我们又干下去。工长把仪器拿走了。之后他又把这个仪器拿回来，重新放上去，仪器继续发出信号。我说，这儿有点不对头。他说仪器肯定坏了。于是他再次把仪器拿走。以后来了，企图叫仪器不叫，可是后来它又叫起来，再次发出信号。是呀，我们就这样在那上面度过了整整一天。

我们当中有几个人感到不舒服起来，可我们还得继续干。他们不发给我们防毒面具。我们这些承包公司的人员可以在那儿工作，自由呼吸，有可能把命丢掉。他们对此毫不关心。他们只关心把活干完，别无其他。”

蒂森规定工作时必须穿脚面有钢套的安全鞋，也得戴头盔。按照法律规定，阿德勒必须向我们提供这些用品，还有劳动手套。可阿德勒在这方面也精打细算。他大处小处都要花招。“积少成多”是他的一句座右铭。——如果“人手”不足，领班和蒂森的工长们就睁一眼闭一眼，让阿德勒的新手有一次穿着运动鞋干活，虽然我们在干活时经常存在着危险，例如有东西掉下来，满载的手推车、装卸车翻倒，或者有叉车驶过，但直到最后我也没有穿过符合规定的钢套安全鞋，其他的一些劳工也是如此。幸运的是没有出什么事。

我们到垃圾桶或废物集装箱里去捡劳动手套。大多是蒂森工人使用过的满是油污的或破烂的手套，他们在工厂发给新手套后就把它扔掉了。

头盔得自己掏钱买，或者运气好，捡到一个已严重损坏的、被扔掉的。德国工人的脑袋要比外国人的脑袋更宝贵，更值得保护。领班岑特尔曾有两次把我(阿里)头上的头盔夺去给忘带自己头盔的德国工人。第一次我(阿里)提出抗议：“等一等，这是我买的，是我的。”岑特尔教训我说：“你在这里一无所有，最多有一堆臭屎。你可以让他下班后还给你。”——这样就在不征求我同意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剥夺了我的财产。第二次我和一个新来的德国人分在一起，他从雷梅特那里免费领到了一个头盔，可是当时仍然不带头盔干活。阿里又得把自己的那一个让给他。这一次阿里不干了：“这是私人的，是我的。我不干。我不戴头盔干活，有可能被解雇。”领班的

回答是：“你给他头盔，不然我就马上开除你！”——于是阿里只得屈服，不戴头盔在轧钢机旁干了整整一班，而离我们不到几米的地方，多次有烧得通红的矿石轰隆隆地掉下来，如果落在我的头上，起码也会被烧伤。

德国同事维尔纳完全心安理得地接受由我来负责他的安全。当我(阿里)向他提出这一点时，他只是说：“我也没有办法。别人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应当到别的地方去提意见，对我说没有用。”——后来他还让阿里感受到他的蔑视：“你们阿德勒的人算什么东西。没人把你们当人看。为了那几个马克，我是不会干的。”这也就是说：你没有任何权利。对官方来说，你根本就不存在。既无证件，又无劳动合同等等，因此他看不起我们。他作为德国人受到雷梅特另眼相看。他拿加班津贴和节假日补助，每小时工资总数为 11.28 马克。(不过雷梅特不给脏活补贴，尽管大多是在肮脏的油脂、臭烘烘的陈油和厚厚的金属粉尘中工作。)

我们阿德勒的人干同样的活工资还要少——究竟多么少，下文还会交代。

我(阿里)在杜伊斯堡狄塞尔街租了一套小小的只有一间半居室的住宅。我想要更进一步接近阿里，想真正地象一个土耳其工人在联邦德国那样生活，不仅仅是跑很远的路去上下班。我越来越深入角色。夜里我现在常常在睡梦中说结结巴巴的德语。我现在体会到，忍受一段时间外籍劳工必须忍受一辈子的东西需要付出多少力气。找到这一套住宅并非特别困难，因为布鲁克豪森是个行将死亡的市区。有好多年，几乎只有土耳其人住在这个地区，如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返回故乡。许多房屋空着，或者已破得无法住人。这套住宅既

无水槽又无淋浴设备，厕所在楼道里由几家房客合用，房租是180马克。在进行修缮时，我自己掏了不少钱，请一位朋友在房间里给我安装了一个浴缸。

我努力把我的新家打扮得漂亮些。我从屋前小花园里扫除了足有两垃圾箱的碎石和垃圾。由于这个地区的“生活质量”也已不能再恶化，邻居们把他们的垃圾都倾倒在在这里。这个布鲁克豪森区紧挨着钢铁厂。谁要是长年在此居住，健康一定会大受损害。许多地方都贴着通告：如果再闻到特别浓重的气味，就打电话通知某个单位。可是这儿几乎总是可以闻到特别浓重的气味。

尽管如此，我仍愿在布鲁克豪森住下。我在这儿还不是孤身一人。也许到夏天还可以在我那收拾干净的小园子里和邻居或同事举行联欢……

### 情况紧急

我的同事中，有些人一连工作数月也不休息一天。他们象牲口一样任人驱使，没有个人生活。放他们回家去住，只是因为自付房租，可以给公司节省一笔开支，否则就会让他们住在厂里或雷梅特公司里。他们通常都是年纪不大，在蒂森的垃圾堆里最多呆几年就会成为筋疲力尽、未老先衰的病人，常常是抱病终身。在资本家看来，他们是一次性用品，用过了就扔掉，再换一批，反正找工作的人有的是，这些人对任何工作，确实是对任何工作都感恩不尽。这种有损健康的工作，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能坚持干一两年的原因。干上一两个月，常常就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要求两三班连轴转的时候。我有一个不到20岁的同事，他一个月干300至350小

时是家常便饭。蒂森的工长们知道这事，工厂从中获利，证据都有蒂森考勤钟的记号并被保存下来。

蒂森常常很突然要求雷梅特派突击队去。于是就发生这种情况，工人辛苦劳动一天后从杜伊斯堡被送回奥伯豪森，已在进行淋浴，“长官”突然赶来叫他们回去接着再干一班。或者当他们工作得极度疲乏后刚刚入睡的时候，被人打电话从床上叫起来去干活。我询问过很多人，包括年轻力壮的，他们都认为，一星期干活超过 15 或 16 班是受不了的。好不容易得到个休息日，就会象死睡不醒。有个小伙子 F 几乎每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连续干，总是两班两班连着干，叫他干啥就干啥，从不抱怨。他钻进最肮脏的洞里也毫无怨言，他把机器上不断往下滴落的臭乎乎的和滚烫的油泥刮掉，事后自己满身都是又滑又黏的油脂。他总是精神恍惚，一副未老先衰的模样，说话总是颠三倒四。他下面有 12 个弟妹，4 个已经出去。他和 8 个弟弟妹妹同父母住在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宅里。他总是吃不饱，见谁面包吃不完便要过来吃掉。每月挣的钱他只留下 100 马克，其余的全交父母，以维持家庭生活。

每当有人对工作发牢骚时，他总是说：“我们可以高兴至少还有工作”和“我什么都干。”有一次当我们正在休息，被蒂森的监工发现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干活，因此受到了监工的表扬。

他谈到他连续工作的最高记录是 40 小时，中间休息 5 至 6 小时。几个星期以前他还连轴转了 24 个小时。他经常到废纸篓和垃圾箱里去捡蒂森工人扔掉的脏劳动手套。单只手套他也要，到什么时候总能再找到一只合适的。他捡呀捡呀，已捡到一大叠，约 20 来只。我(阿里)问他：“这有啥用？这么多手套你又用不了。”他说：“不知道。又不发我们手套。有这些



手套，你可以高兴。老兄，你知道我在捡什么吗？你还需要好些头盔，要是有什么落到你头上的话。”我很同情他。他总是喜眉笑眼。几星期后我看到“长官”又在要求F在周末干两班。“我不行啦！我不行，干不了。”——“什么，你在这儿可总是顶下来的！”——“今天可不行。不，不。”长官：“我会记住的。过去你一直是靠得住的。”——事后我（阿里）向他表示祝贺：“今天你拒绝不干，我觉得对，你身体已经不行了。”

他简直是干不动了。他已几乎站立不住，走路摇摇晃晃，面色煞白，双手颤抖。

一个同事说起他们去年复活节一连36小时不睡觉连轴转：“当时雷梅特接到为波鸿奥佩尔汽车厂清洗色带的任务。这活儿必须得干完，因为复活节后星期二6点钟新的一班就要接着干。”但汽车厂的马拉松班对这个同伴来说还不是“最高记录”。“两年前我们曾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一家体育旅馆工作过。我们和一同前去的那个小队一直干到累得趴下——大约干了50小时。”

德国工人赫尔曼·T，约35岁，是雷梅特最积极的“计时工”之一。从他身上看得出来。他面色苍白，又干又瘦，有一阵子没有工作，他是能够一直干到趴下面感恩不尽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从1985年2月开始，他月复一月地拼命干，1985年4月据他自己声称首次达到350小时。6月他又“一个小时不落”，到6月25日就快满300小时了，“而这个月还没有结束”。赫尔曼说：“上星期我从星期五到星期六接连干了四班。星期五早晨6点，我和你们一起到了蒂森，星期六下午2点1刻我才离开工厂。”这种马拉松式工作时间对赫尔曼来说并非不寻常的事情，为了使这种露骨违犯工作时间规定的行为不被发现，他被支来支去，在蒂森的巨大厂区里一班

倒换一个干活的地方。“星期五上午我在鲁尔沃特工地，有一个不大的厅堂让我们打扫，下午到一号氧气车间，夜班在弗尔德发电站干活，星期六上午又回到鲁尔沃特工地干。”最后他累得筋疲力尽，两腿发软，晃晃悠悠地回到家中：“我还吃了点东西，那时我已不感到饿了，后来我躺下前还对我老婆说，晚上8点一刻叫醒我，我还想看电视里放的电影呢。可是不料我一觉睡到星期天中午，一次也没有醒过。”

他讲述了他们在蒂森干活的情况：“每天12小时、13小时、16小时，每星期六和每星期日，每个假日——都不歇。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也干，那才真叫热闹哩。整个高炉都歇火了，所有一切都得打扫干净，你知道我们干什么苦活吗，不管刮风下雪下雨天冷，衣服经常是潮湿的，总是10至15个雷梅特的人，也有阿德勒的人。我们总共在那儿干了将近五个月。”

土耳其劳工塞泽尔·O(44岁)可以说是连续工作最高记录的保持者。在慕尼黑地铁工程中，他们在地下坑道里连续干了72个小时，在短短的休息中有时迷糊半个小时。他说，许多人在这种马拉松劳动中出了事故，全都是外籍劳工。

有一次“长官”确实确实强迫——在法律上讲是一种侵犯他人自由的行为——我们干两班，当时我(阿里)也在场。我们正乘汽车前往集合地点。我们已精疲力竭，有几个坐着就睡着了。这时领班挡住我们的汽车，满不在乎地说：“继续干！双班！”

有几个人提出抗议，要回家去，已经累坏了。

他们被告知，是蒂森要求他们继续干的。

无论如何要回家去的阿尔及利亚劳工T当场就被开除了。他被赶下车去，可以另寻高就。

在这之前发生了如下的千真万确的谈话：

领班：“今天你们得多干一会儿，到 22 点。”

阿尔及利亚伙伴：“去你的吧！我不干，我又不是机器人。”

领班：“你们都得继续干。”

阿尔及利亚同事：“我得回家，有急事。”

领班：“那你就永远不用再来了。现在情况紧急。”

阿尔及利亚同事：“我得回家。”

领班：“那你明天也不用再来了。给我滚，这儿你完了，永远。”

领班(对怯生生地不吭一声的其他人)：“我需要 40 人，明天也是！这是蒂森的要求！我也想下班，我必须干，也没有人问我。今天下午我还有镶牙预约呢。这也不成了。完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战争时期，一切还要糟得多！”

### “最好是：什么也听不懂”

我们在三号烧结设备一条数公里长的阴森森的人迹罕至的通道里休息时，蒂森的一个工长在领班的陪同下向我们走来。他们检查我们清除泥浆和烧结粉末的情况，因为这台设备何时又能开工首先取决于我们。年轻的工长被优素福的东方人外貌勾起了假期回忆：“你是突尼斯人吧？”优素福说：“是。”工长：“一个奇妙的国家。今年我们——我和我妻子——还要去休假。那儿可以休养得极好，而且什么东西都比这儿便宜得多。”

优素福感激地友好地向他微笑。德国上级屈尊和外籍劳工谈工作以外的事情，那已是不常有的，更罕见的是他还对他的祖国发表友好的看法。优素福说他的父母在海滨有一幢房

子，说出了地址，请工长“不久后去突尼斯时前去访问他们”。工长马上一口答应：“放心吧，我一定去；只是你得给我几个地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们那儿有很漂亮的女人陪人睡觉。这可真叫人不可思议。现在你们那儿这要多少钱？”优素福答：“不知道。”“你们那儿花20马克就什么都能弄到手。”

优素福的自尊心显然受到了伤害，答道：“我不知道。”工长一直还兴致勃勃，毫不放松。他说：“我说，你们那儿的女人很富有肉感。真正的骚货。只要把她们的面纱拉下来，她们可浪荡了。你难道没有姐妹？或者岁数还小？你们那里总是得马上结婚。”

优素福企图在我们其他伙伴面前掩盖他所蒙受的屈辱，说：“您不是把夫人也带去吗？”工长：“这没有什么。她反正整天躺在海滩上，什么也不知道。旅馆真棒。完全象这儿的洲际大饭店。住两个星期只要两千多一点。什么都在内。我们从那儿还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逛了一次，嗯，你说那个国家叫什么来着？”优素福（彬彬有礼地）：“摩洛哥。”——工长：“不错，摩洛哥，我刚想起。那儿也有漂亮娘们。我说，你们究竟讲什么语言？你们说西班牙语吗？”——优素福已忍无可忍，转身就走，但还是自我表白说：“不，说阿拉伯语。我得上厕所。”——

领班借此机会在我们中间坐下来，也沉湎在休假的气氛之中。他伸伸懒腰。“现在到南方去。不工作。老有太阳。还有女人，女人。”他转向我（阿里）：“我说得对不对？在你们安纳托利亚，用一只羊就可以买个女人。”当我（阿里）无动于衷地把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方向时，他缠住我不放：“难道不对吗？你是怎么把你老婆弄到手的？”——“德国人老是认为什么都能买到，”阿里回答。“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因此德国人也很可怜，尽管你们有很多钱。”领班受不住

了，便回敬阿里说：“你们安纳托利亚女人，白送我也不要。她们可脏哩，有臭味。先得把她们好好地洗一遍。等到你把她们的衣服脱掉，把破衣裳全脱光，你就已经又没劲儿了。”

优素福后来把我（阿里）拉到一边说：“我们学会德语并不好。老是叫人生气。最好是装作听不懂。”——他说，有些年轻的突尼斯劳工由于类似的经历和屈辱完全有意地不继续学德语，“不管工长说什么，总是说‘是，工长’，这样也就没有那么多废话了。”

蒂森工厂里的许多厕所墙上都涂写着蔑视外国人的口号和胡话。工厂的围墙上也常常涂写一些排外口号，没有人认为有必要清除它们。下面仅仅从一号氧气厂好几百条茅房口号中举出几个典型例子：

“土耳其人是臭狗屎！”

附近的食堂墙上写着：

“土耳其人滚出去。德国永远是德国人的！”

在这近旁，有一个动物爱好者贴了一张有一只熊猫的小招贴画，上面写着：“保护濒危动物。”再过去20米，有一行大字标语：叫所有的土耳其人都死光！——或者在冷轧厂镀锌车间的厕所里。我记下了几条，它们已经褪色了，也就是说，它们在那儿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宁可床上有1000只耗子也比地窖里有一个土耳其人强

把土耳其人和同他们乱搞的德国姑娘全都绞死

另外一种笔迹写道：

土耳其浑蛋，把他们吊死才解恨，我痛恨他们所有人

土耳其猪猡，我把你们通通枪毙

另一种笔迹：

我高兴自己是德国人

德国是我们德国人的

还有：

宁可做个党卫队猪猡也胜过土耳其猪猡

没有比希特勒更好的德国人了。

杀掉土耳其猪猡，德国人才称心如意。

## 工间谈话

德国工人米夏埃尔(34岁)、乌多(26岁)和他们的代言人阿尔弗雷德(53岁)在轧钢厂下面地下防空洞里弄来一块木板搭在两个圆桶上，他们坐在一起，彼此分享香烟和饮料。阿里坐在他们对面一张摊开的土耳其报纸《自由报》上，只得充当听众的角色。谈话一再被不断滚落的矿石的轰隆隆巨响所打断。

阿尔弗雷德：“相信我，希特勒时期偷同事的东西——哪怕只是一根鞋带——都要枪毙。我这话一点也不假。这种人是罪有应得。谁要是偷同事的东西，或者是被打死，或者是被枪毙。生活中就得这样。其他人的东西是碰不得的，这种事不能干！”

我(阿里)：“可头头可以拿走你的东西？”

阿尔弗雷德：“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可谁要是得罪哥儿们或偷东西……”

我(阿里)：“要是头头偷东西，是否也会被枪毙？”

阿尔弗雷德(略带威胁口吻)：“从前希特勒时期你该到这儿来，那时欧洲还是好好儿的。”

我(阿里)：“枪毙了好多人？”

阿尔弗雷德：“从前你真该到这儿来。”

乌多：“可那时老人们还能在街上跑。”

阿尔弗雷德：“听着，那时候一个70岁的老太太可以在口袋里装着1万马克晚上出门，不会出事。”

我（阿里）：“那么多钱，她不会一个人上街，她坐汽车……”

阿尔弗雷德：“我爹住在大城市，在一个非常大的城市——莱比锡博览会城，我的老家——，他有摩托车、汽车和自行车。那辆自行车一年到头放在院子里，等到它生锈了，他就再买一辆新的，然后又放在院子里。永远在那里……”

我（阿里）：“肯定坏了——自行车。”

阿尔弗雷德（继续对我谆谆教诲，犹如把所有外籍劳工都看作潜在的小偷）：“你也好好听着，用你那笨脑瓜子牢牢记住。”

我（阿里）：“为什么？”

阿尔弗雷德：“关于偷盗之事。听着，从前并非家家都有全自动洗衣机。我们请了一个洗衣妇，米勒太太，因为我们开了一家店。每四个星期大洗一次，明白吗？衣服冬天晾在阁楼里，夏天晾在院子里。我们洗的衣物，从床上用品开始，全都挂在院子里。连一条手绢都丢不了，什么都丢不了。”

我（阿里）（对其他人）：“我可不要他的脏手绢，我用纸手帕。”

阿尔弗雷德（不为所动）：“连一条手绢都丢不了。”

我（阿里）：“可外国人那时日子不好过吧？”

阿尔弗雷德：“听着，那时德国还有纪律，有秩序。”

我（阿里）：“可是犹太人呢，你们把他们杀了。”

阿尔弗雷德：“滚你妈的犹太人。我们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必须尊敬老人，老师、学校、家庭全都向我们灌输这句话。

你不会相信我们年轻小伙子可以大模大样地坐在电车上。我们反来复去受到教育，要给年纪大的人让座，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我(阿里)：“你是说从前国家比现在好……？”

阿尔弗雷德：“那时是全面独裁，可我觉得比今天好——今天是什么世道！”

我(阿里)：“听着，你们干吗把犹太人都杀掉？”

乌多(想提示阿尔弗雷德)：“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阿尔弗雷德：“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阿里)(装傻)：“不，不。”

阿尔弗雷德：“希特勒犯了一个错误。他只要再活五年，那些人当中就不会再有人活着，不会有一个活着。凡是犹太人插手的地方，通通只是在演戏，在全世界，不管是穷犹太人还是富犹太人。有犹太阔佬，如洛克菲勒、摩根索等等。那是在世界历史上只会制造祸害、不和、恐怖的人。他们有钱进行研究。他们有钱有势，掌握人们的生死——他们就是这种人。听着，要是希特勒再干上五年，事情的结果对他有利的話，那种人今天就不会再有了，我相信——不会再有一个。”

我(阿里)：“你们也杀吉卜赛人。”

米夏埃尔：“凡是不是德意志民族的，他通通都杀掉，只有纯种的德意志人不杀。”

乌多：“是的，不仅仅是希特勒！”

我(阿里)：“他也会把我喀嚓了？”(没有回答)

阿尔弗雷德：“听着，最早搞集中营的是谁？实话实说吧。”自己作了回答(大声)：“英国人。”

乌多：“是美国人，最早搞的是美国人。”

阿尔弗雷德(固执己见)：“是英国人，英国人。丘吉尔，是



的，丘吉尔是英军中尉。听我说，丘吉尔是中尉——在殖民战争中，是的，也就是军士。”

米夏埃尔：“希特勒不该搞这个。”

阿尔弗雷德：“你知道丘吉尔搞了什么吗？”

米夏埃尔（仍然坚持）：“不，这糟透了。”

阿尔弗雷德：“他也是两线作战。”

米夏埃尔：“无所谓，反正是糟透了，听我说，这……”

阿尔弗雷德（打断他的话）：“他夺走了我们的殖民地西南非洲。他还把布尔人——听说过他们吗，布尔人？他把妇女儿童包围在沙漠中的帐篷里，让他们全都死掉，妇女儿童，全都丧命……”

米夏埃尔：“这也不对。可希特勒是历史上最大的杀人凶手……”

阿尔弗雷德（他的同伴米夏埃尔对他进行反驳使得他晕头转向）：“听着，你不傻吧？”

我（阿里）：“看怎么说了……”

阿尔弗雷德：“土耳其人和犹太人有什么区别？”

我（阿里）：“都是人，没有区别。”

阿尔弗雷德（扬扬得意）：“不，有区别！犹太人已经吃过苦头！”

乌多要求发言。对阿尔弗雷德：“嗨，我还有个更好的。”

阿尔弗雷德：“说吧！”

乌多对我（阿里）：“一辆大众汽车可以坐多少土耳其人？”

我（阿里）：“不知道。”

乌多：“2万。信不信？”

我（阿里）：“既然你这样说，那就不会错。”

乌多：“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阿里):“宁可不知道。”

乌多:“很简单。前面两个,后面两个,其余的都装进烟灰缸。”

阿尔弗雷德(不动声色):“哈哈!我早就笑不起来了。这已经老掉了牙,我至少已听过100次。你们知道这最新的笑话吗:有一个土耳其男孩牵着一只德国狼狗出去散步,在路上遇见一个成年的德国人。此人问道:‘你和这个猪要到哪儿去呀?’土耳其男孩说:‘这根本不是猪,这是一条地道的德国狼狗,甚至还有家谱呢。’那人说:‘住嘴!我根本没有问你。’”

阿尔弗雷德和乌多扑哧扑哧地笑起来。

米夏埃尔说:“我觉得不好。你们当着阿里的面说这个。他会误解的。”

我(阿里):“我可笑不出来。关于犹太人的笑话也没有什么可笑的。(对阿尔弗雷德)为什么德国人没有什么可笑的,老是拿别人开心?”

阿尔弗雷德(生气):“开个玩笑罢了。你们别管我们的事情,不然管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接着又挑战似地对我:“你知道门格勒大夫吗?”

我(阿里):“知道,集中营杀人大夫。”

阿尔弗雷德:“啊,那个门格勒根本不是那么傻。至少他没有用土耳其人做试验。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宁可默不作声。

“那是因为,”他以充满仇恨的目光望着我,“那是因为你们毫无用处,连用来做人体试验都不值得。”

米夏埃尔:“你可知道,当我读到和听到这些报道时因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感到羞愧,竟有这种事,说真的。”

阿尔弗雷德(津津有味地):“于是他就把他们放在里面,

然后看他们蹲在冰水里能活多久。”

阿尔弗雷德(对我):“听着,你究竟算是哪国人?你又不是真正的土耳其人。你母亲是霍屯督人<sup>①</sup>的后裔吧?”

我(阿里):“我母亲是希腊人,父亲是土耳其人。”

阿尔弗雷德:“是的,现在你是土耳其人,还是希腊人?”

我(阿里):“都是。还有一点德国味。因为在这儿已有10年了。”

阿尔弗雷德(对其他人):“你们听听这个笨蛋的话。他说他什么都沾上一点边。人种都串秧儿啦,就成了这模样。这样一来,以后就什么也分不清了。他没有祖国。这种人是共产党。他的老家共产党简直成堆。这应当取缔。你们知道曼纳斯曼是怎么搞的吗?土耳其人通通滚蛋。在雷梅特那儿有不少土耳其人,通通可以烧死,嗯,一看到那些人,气就不打一处来……昨天我还在(对土耳其工人——作者)说,你要是现在不逐渐学会服从,我就一脚把你踹回家。哼,我一见他就来气。”

米夏埃尔:“他们在这儿工作过,你们在这儿工作过——好——我们需要过你们——完了。你们在这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阿里):“我们并不是自己来的。是你们把我们请来的。那时候老是说:你们来吧!来吧!这儿能挣大钱,我们需要你们。我们来的不易。”

米夏埃尔:“嗯,这话不假。我们应当向他们提供补偿。”

乌多:“是呀,看看曼纳斯曼是怎么做的。”

米夏埃尔:“目前失业的人那么多,我们自己面临危机。”

<sup>①</sup> 纳米比亚的居民,其体质、语言、文化与布什曼人近似,多数在殖民者的农场或厂矿做工,备受种族歧视和剥削。——译注

乌多：“曼纳斯曼马上说：每人给1万至3万马克。”

我(阿里)：“只是如果现在大家都走了，你们就再也领不到退休金了，你们的全部退休金就吹了。我们要是都走，可以拿到我们的钱，而你们就没有退休金了。”

阿尔弗雷德：“哼，一派胡言。哪有那么多土耳其人。”

我(阿里)：“有的，150万。那你们就会破产。”

阿尔弗雷德：“你知道瑞士是怎么做的吗？你要是在瑞士当外籍工人，你的劳动合同期是11个月，第12个月休假。这个月你回家休假的时候，他们写信通知你是否可以继续工作还是留在家里。瑞士就是这么搞的。在这一个月里他们决定你能否回来或是去放骆驼消磨时间。”

### 梅赫梅特的苦难历程

梅赫梅特是我们当中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他那平心静气的态度一再引起我(阿里)的注意。他在接受最苦最危险的活时也都泰然自若，近乎淡漠。他和蔼可亲，头发花白，圆脸上有一些皱纹，象个慈父。雷梅特的另一个工人克劳斯说梅赫梅特刚49岁，我(阿里)感到有点吃惊。我以为他已有60岁了。

一天，梅赫梅特向大家告别，说他要回土耳其去“休假五周”。我(阿里)问其他伙伴：“雷梅特那儿休假多吗？阿德勒那儿要求休假五周是不行的，马上会被解雇。”——“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五周也是没有的，”一个人说，“可是梅赫梅特一年之内遇到三次事故，所以这次老板才这么慷慨。”我继续询问，伙伴们异口同声地谈到梅赫梅特所受到的几次重伤。第一次事故还不是发生在蒂森厂，而是发生在雷梅特在米尔海姆的

价值数百万马克的豪华别墅里。梅赫梅特和一个德国工人奉命在那儿地下室里安装芬兰式蒸汽浴室。为此就得挖土并拆除部分墙壁。“这时就出了事。德国同伴正在下面挖着，梅赫梅特发现有一堵墙正在倒下。他就把同伴拽上来，不然此人也许就完了，可梅赫梅特的左肩却被墙壁狠狠撞了一下。”经医生透视为粉碎性骨折，证明梅赫梅特为46%的重残。

梅赫梅特住院治疗了两个多月。他没有从雷梅特那里得到任何赔偿或补助金。作为报答，人贩子雷梅特答应他尽管身受重伤仍可以在蒂森厂继续干活。2月里梅赫梅特在烟雾警报声和刺骨严寒中又开始工作：上夜班。在烧结厂，他踩在薄冰层上滑倒了，不幸的是他出自本能地用那条好胳膊去支撑，因而手腕子严重扭伤，不得不打石膏。梅赫梅特有一个老婆和三个孩子靠他养活，有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有残疾。他还没有完全痊愈，就一个夜班接着一个夜班又干起来。一连干了14夜以后，梅赫梅特极其疲劳地倒在床上。两小时后来了电话，要他马上再接着干一个白班。梅赫梅特去了。到了晚上8点，梅赫梅特想下班回家，领班却让他吃过饭后马上再去钢铁厂接着做夜班。梅赫梅特又去了。

梅赫梅特在一个拱顶地下室里清除下水道，那儿一再有烧得通红的铁块掉落，造成雾气腾腾，使人伸手不见五指。梅赫梅特由于过度疲劳、筋疲力尽，一只脚滑进一个坑里。医院确诊为韧带撕裂。动了两次手术，梅赫梅特的腿仍未治好。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工作。休假回来后，他对我说：“叫我怎么办呢？我得干活。孩子、债务……”

同梅赫梅特谈话，不是容易的事。几天后他又累垮了。他的时间只是按班分配，已常常记不清什么月份，只还记得在蒂森厂干活时天气特别冷或者活儿很脏。虽然他在1960年就

来联邦德国，但他只会说很糟糕的德语。生存斗争使得他没有时间好好学习语言（因此我们在进行交谈时请一位土耳其同事当翻译——作者）。不需要动嘴，只需要“动手”。

梅赫梅特历尽艰辛，努力为自己和他的亲人建立一个新的家园，而这在任何一个德国人身上都会被视为一种美德。

他说，在头10年，哪儿有活他就到哪儿去干，全国都跑。最后，1970年他终于在杜伊斯堡蒂森钢铁厂找到了固定工作，当叉车司机：“那儿我每月净挣1600到1700马克，倒班干。另外还干点别的活，安汽车车座……”依靠多年积蓄和银行贷款，梅赫梅特为自己一家人在杜伊斯堡一梅特曼购买了一幢半新不旧的标准式房屋。“要是我能在蒂森干下去，现在这笔钱早就还清了。”可是他的德国领班使他的要求不高的打算落了空。“1980年我去休假。领班来了，对所有土耳其人说：给我从土耳其带一条地毯来，要真正的地毯！我说：听着，真正的地毯在我们那里至少要5000马克，上等质量。我可没有那么多钱。他说：你要是不给我带来，回来后要你好看！”梅赫梅特从土耳其回来后，领班天天给他穿小鞋，叫他干重活，作为对他不送“礼”的“惩罚”。“后来他说：到我办公室来一次！我到他办公室去了，他骂了几句，我什么也没有说。后来，过了三个小时，那时我已经又在干活，厂卫队来了，把我带走，叫我回家。据说我打了领班。这根本不是事实。”不经认真调查，梅赫梅特在蒂森厂工作10年之后被立即解雇了。事实上对他连一次告发都没有，比如说“人身侵犯”。但是，由于蒂森在解雇书中列出这一理由（“殴打同事”），劳动局起初拒绝支持他。梅赫梅特不得不提供证人。好几位同事，其中也有德国人，都向劳动局一致作证，解雇的理由显然是捏造的。梅赫梅特：“这一切，对我是当头一棒。之后我东奔西跑，寻找

新的工作。开始两三个月什么工作也没找到。后来终于在杜伊斯堡—霍姆堡的一家刨花板厂找到了工作。还是当叉车司机。我在那儿干了五个月，万事大吉，没有问题。只是后来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我到头头那儿去问，能不能请一星期假回家奔丧。头头说：不行，我们这里干五个月还不能休假！我说，我母亲死了。他只是说他不管。尽管如此，我还是回去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了，解雇。”在买房欠下的债务的压力下，梅赫梅特去寻找新的工作，一无所获。又失业了三个月。“后来我拿到了二级驾驶执照，开卡车，到处找工作。后来我终于可以开送货小卡车了，给一家小公司干，挣得不多。工作两天后，‘莱茵明珠厂’来了一封信。从前我曾在该厂修理过车篷。于是我就去了，头头说：你可以马上在我们这儿工作，开叉车，以后也许还开卡车。我呆了四年。”一个“更好”的差事诱使梅赫梅特换了个地方：杜塞尔多夫一家运输公司每小时工资13马克。“外加18马克杂费，当然啦，我马上就干了。”但只干了五个月就来了解雇书：“没有任务”。

“我又跑呀跑呀。劳动局说：过三四个月再来看，现在没有工作。又到各家公司去打听，四处奔波。后来邻居告诉我，雷梅特需要司机。我说：雷梅特在哪儿？他说，到曼纳斯曼那儿去打听。我就去曼纳斯曼。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等候雷梅特的头头，可他没有来。我老是进四号门，找雷梅特的人，等待着。后来我问一个电焊工：办事处在哪儿？他说：奥伯豪森。我立即去奥伯豪森，下午三四点钟。领班只是说：可以马上开始，我们这儿有脏活重活。我说：我愿干，不管脏活重活，必须工作。餬口，不干不行。”

梅赫梅特付出了他的健康，雷梅特每小时总共付出12.24马克。

## 天下乌鸦一般黑

阿德勒想有朝一日“象雷梅特那样了不起”。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

事实上,从一个阿德勒成为一个雷梅特,其间并没有太大的鸿沟。也就相当于下层社会和半上流社会的差距:阿德勒出卖他的人员时不经任何官方批准,而雷梅特至少有时还采取合法手段。

公司老板阿尔弗雷德·雷梅特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几乎只还需要清点他的两家公司出租工人“回收”的钱。他那所谓“工业清洁股份有限公司”(阿德勒又把人卖给这家公司)雇佣了170人,此外他还通过SWI建筑物清洁公司让约660名清洁女工和清洁工给他干活。

对在蒂森或曼纳斯曼进行的极端辛苦的工作——至多只有拆除工作和建筑施工还能与之相比——雷梅特根据工资等级表发给建筑物清洁工的工资是11.28马克。工作坚持一年以上的人还可以增加60芬尼。建筑技工的工资按规定应为14.09马克。

雷梅特的“工业清洁股份有限公司”所雇佣的36名外籍劳工就更惨了。一个曾为雷梅特在曼纳斯曼工作的土耳其人谈到企业领导人用空洞的诺言刺激工人多干活:“人家告诉我们,要是你们每天生产超过20吨,每超过一吨,我们就多给你们两马克。于是我们就拚命干,到月底我们增产了1600吨,这就是3200马克。我们一共是八个土耳其人和三个德国人,每人应多得将近300马克。可事实上雷梅特一个芬尼也没有多给我们。”



伊尔马兹·G：“作为雷梅特的租赁工在炼焦厂工作的劳工也对他们的工资不满，因为那儿有好多其他公司的工人，他们干同样的活却拿更多的钱。来自杜伊斯堡一家拆房公司的人，每小时多挣 3.5 马克。”

如同蒂森一样，曼纳斯曼也经常要求加班加点。伊尔马兹估计雷梅特的人员每月在曼纳斯曼工作的时数达到 230 至 250 小时。

这些人在曼纳斯曼那儿也象亡命徒一样“被充分利用”，那里也是哪儿有尘土、浓烟和事故危险的地方便派他们去干。曼纳斯曼职工代表会的一名成员说：“例如凡是作为炉前工在钢铁厂工作的人，整天都以一种不自然的弯腰曲背姿势干活。外加炉火的不断烘烤。”——“这几乎象是从前在橈舰上划桨<sup>①</sup>的囚犯，”阿里·K说，“要是你筋疲力尽，他们就把你扔到海里。我们有一个土耳其同伴，给雷梅特在曼纳斯曼当炉前工。一天，梅赫梅特在装铁时膝盖被一根铁链打了一下，两条腿都断了。此后他住院治疗了六七个月，不久雷梅特就把他除名了。梅赫梅特基本上恢复健康后，有一次到我们公司来问，能不能再雇佣他每天干四五小时，因为在那次事故之后他已不能站立那么长时间，经理没等他把话讲完就把他轰走了。”

事故常常是由于雷梅特要求和事先规定工人们经常干双班和三班而造成的。比如说，雷梅特公司在钢铁厂用卡车运矿渣。同伴们谈到，在这些拖带几辆拖车的卡车上出车有时连续 36 个小时。这不仅对雷梅特的工人有危险，而且也对所有在厂区道路上行走的人有危险。“要是一个人在驾驶室坐

---

① 中世纪的一种刑罚。——译注

了36小时，遇到急转弯，那发生严重事故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阿里·K担心。

杜伊斯堡施塔歇尔公司——除雷梅特外向曼纳斯曼厂出租工人的另一家公司——让租赁工上午在炼焦厂干一班，下午在冶炼厂干一班，晚上到米尔海姆钢管厂分厂去上夜班，24小时连轴转。

曼纳斯曼是在成批地把土耳其和其他外籍基本工人赶出企业之后开始这种奴隶交易的。为了甩掉外籍劳工，曼纳斯曼向他们提供4万马克以下的“回国补助金”，想要裁减600人。同时，企业领导在德国工人中煽动恐惧情绪：如果没有足够的外籍劳工返回自己的家乡，德国工人的饭碗也会受影响。这种恐吓导致企业中产生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许多工人希望土耳其人离厂，例如为了使自己在厂内当徒工的儿子能保住他们的工作。还对年纪大一些的土耳其人进行了一次德语测试，目的是证明他们不够格。在这之后谁要是一直还不“愿回国”，就通过一项社会福利计划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改作临时工，或有可能被解雇。这样一来，1000多名土耳其人离开了曼纳斯曼。这是向雷梅特等承包公司发出的和曼纳斯曼携手合作的信号。

## 嫌 疑

“阿德勒的人都过来。”一次工间休息时领班拍拍手把我们召去。“为了让你们知道，阿德勒先生打算今天下班后下午4点在斯卡格拉克街‘运动员之家’酒馆会见你们，和你们谈谈劳动组织和你们老是要钱的问题。你们要准时，因为他时间不多，他让我转告你们。”

那是我们的无报酬业余时间。下班后我们呆了一个多小时，就动身前往上述酒馆。我们等了一刻钟，等了半个小时，谁没有来呢？是阿德勒。“他只是耍我们，”梅赫梅特说，“我们回家去吧。”唯一留下的是阿德勒的忠实领班沃尔姆朗和他的弟弟弗利茨（23岁），还有我（阿里）。

我们站在柜台前面，这时有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和一名便衣走进酒馆，以审视的眼光扫视在场的约20名宾客。有一个问：“刚才这儿是否进来过一个人，40来岁，黄头发，约1.7米高？这条街转弯角上的商业银行遭到抢劫，被抢走了4万马克。”

站在柜台前面我身旁的一个年近花甲的德国人已喝了八杯啤酒，这时咯咯地笑起来：“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也不会说，不会对任何人说。”他的声音很大，警察都听见了。“他只要和我对半分，我就守口如瓶。”——“外面那辆有科隆牌照的绿色大众牌帕萨特汽车是谁的？”年纪大一些的那名警察厉声问道。我从窗口看出去，看到一辆警车就停在我的汽车前面，几个警察正在好奇地观察我那辆被撞得完全变形的有点生锈的破车。该死的，要是他们在这里认出我，一切就都提早暴露了。虽然我在申报这辆汽车时改用另一个名字以防万一，但我身上并没有带假证件。

我的汽车看上去确实相当破旧——对我来说，汽车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和日用品，不是摆门面的东西——，因此看来完全符合警察的思维模式：谁要是开这样的汽车，也就有必要抢劫银行。

我没有理会，朝另外一个方向看去。我的德国同事弗利茨推了推我，说：“听着，这不是你的车吗，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闭嘴，”我（阿里）骂了一句，“这辆车没经过技术检

验，会罚款。”弗利茨快如闪电地利用阿里的困境为自己谋利：“要是我不说，你给多少？100马克，或者我去说。”他示威地向警察望去。——“我没有那么多钱，”我（阿里）说，并把价钱压低到一箱啤酒。

此时警察已开始对顾客逐一进行询问这辆可疑的汽车是谁的，而且有一个也向我们走来。可我们也无法提供进一步的情况。警察小分队又走了。我松了一口气，心里已经在想刚刚逃过难关，可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队警察，这一次是三个穿制服的和两个便衣。看来正在进行一次组织得很差的大搜捕，好比一只手不知另一只手正在干什么，因为队长提出的问题和方才他的同事提的问题一模一样：这里是否进来过一个年约40、黄头发、身高1.7米左右的人，拿着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约4万马克。有几个顾客哈哈大笑，把这一切当作是一次成功的玩笑。“是呀，他上厕所撒尿去了，”一个年约40、有点醉醺醺的人说，此人的头发颜色和身高很象作案者。——“请您别胡闹！”队长不懂什么玩笑，“不然我就以欺骗和妨碍执行公务罪逮捕您。”

他的目光转了一圈，停在我（阿里）的身上。我是酒馆里唯一的外国人，身上穿着工作服，看上去有点邋遢，脸上的黑油泥也没有洗干净。“你来一下！”队长用手指着我（阿里）说，他的两个年轻部下蠢蠢欲动地向我走来。我完全懵了，心想我的工作终于要毁于一旦了。有片刻之久，我曾考虑从他们身边向外奔去，逃之夭夭。可是外面有很多警察，某一个厉害的家伙有可能从后面开枪打死我。我心里想，现在要保持镇静，千万别慌张，反正我有理。他们能把我怎样？“为什么抓我？”我（阿里）马上展开进攻。“我是年轻人，28岁，身高1.83米，黑头发。抢钱的人比我老，也比我矮得多，”我向他们指

出明显的不相称。队长可不讲什么逻辑。他似乎由于我（阿里）的启示发现了重大线索。“跟我们走，”他不客气地说，“问你时你就回答。”——他的一个同事想要抓住我的胳膊，可是我挣脱了，说：“别这样，我跟你们走。”

在酒馆前面，其他的警察也把我包围了，其中也有便衣。真该死，我怎样才能脱身呢？由于真正的作案人已溜之大吉，他们感到失望，现在需要找个替死鬼。“出示证件，”队长要求我。“我没带，”我（阿里）说，“头头阿德勒拿走了，每天给蒂森干活，不给钱，”我企图制造一些混乱，以便转移对我的注意。但他并没有理会。“姓名，住在哪里？”他审问我。

我（阿里）把我的土耳其名字“S-i-n-i-r-l-i-o-g-l-u”一个字母地费力地拼给他听，当他因为这个名字复杂而骂骂咧咧的时候，我友好地笑眯眯地望着他，想要给他打气：“我知道，名字难。也可以叫我阿里。”——看来这一点也没有使他消气，反倒脸色更加阴沉起来。我告诉他我的地址：“狄塞尔街 10 号”，不过我在那儿至今还未申报户口。无线电话很快也证实那儿并没有阿里·西尼尔利奥格鲁此人。年轻的警察又抓住我（阿里）的胳膊，说：“我们去你家，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证件拿给我们看了。”我试图再次以攻为守：“证件在头头那儿，马上来。他是大坏蛋，偷我们钱，该坐牢，应当把他带上。”接着我（阿里）又把话题转到蒂森：“可以和我一起去，20 号大门，这是我的计时卡，可以证明我是在那儿工作的。”他们有点糊涂了，但一点也不想进一步了解阿里的头头，尽管一切有着强烈的贩奴味道。把蒂森的名字也搭上，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构成犯罪行为，看样子他们不想招惹是非。

一名警察向队长建议：“我们最好送他去银行对质。”——“好啊，可以，”阿里立即欣然应允，并准备登上警车，身上仍穿

着那套肮脏油污的工作服。队长一把拽住我(阿里),大喝一声:“下来!你的油泥把我们的座位全弄脏了。”——这时在我们周围已围上一群人。“这家伙曾企图袭击一个德国姑娘,”一个年近半百的家庭妇女把一个装得满满的购物袋放在身后房屋墙根旁,恶狠狠地说。

“他的眼睛多么冷漠刺人,”一个约有65岁的老头附和她说,“患有精神病的杀人狂就是这样的。”——“他只是抢了银行,”一个靠自己自行车站着的年约25岁的小伙子说。——人群中产生了争论。多数人同意年轻人的看法,其他人仍然坚持强奸的说法,有一个妇女甚至说那个被袭击的姑娘“被救护车送走”时她还听到了她的“哭喊声”。

他们在大街上审问我(阿里)约有20分钟之久——在此期间真正的抢劫犯大概可以从容溜掉——,一直到队长作出决定:“你现在回到酒馆去,等我们把证人带来对质。别想溜。一名警察将守在门口,不让你跑掉。”我(阿里)等了将近一小时,没有证人前来。一定是他们自己后来觉得这种嫌疑太荒唐了,大概不想在证人面前出乖露丑。当守在门口的警察走掉之后,我就小心翼翼地上了我的汽车开跑了,心里感到难得有过的轻松。

离去前,我(阿里)还向酒馆里的德国客人说:“你们都看到了。只因我是外国人,就得去。可真正的是黄头发,只有1.7米,而且年纪更大。”

“是呀,你也有可能戴上了假发,”柜台前一个年近半百的财政官员开玩笑说。酒馆里的人全都扑哧扑哧地大笑起来。“我在外面也听说了,”微醉的财政官员还向我透露,“你们在钢铁厂打黑工。你们不是唯一的。我们一再听到有人说,可是我的上司不敢去碰他们,即使我现在去报告。”

我与警察的第二次交锋是在三个月后。我(阿里)疲惫不堪地从阿德勒那儿回来，登上我那停在几条马路远拐弯处的汽车，在倒车时撞上了一辆崭新的大众牌高尔夫汽车。

人们转眼之间把阿里团团围住。汽车的女主人激动地跑来，阿里承认是自己的过失，愿意立即赔偿损失并且也给她立下字据。后面有一些未参与其事的德国人喊道：“别信他，他是外国人，他在骗您。马上去把警察找来。”

我只有一张驾驶执照，执照的持有者是一个土耳其工人，不过他的照片根本不象阿里的长相。要是因此而被警察发现，那整个行动就会十分平淡无奇地宣告结束。于是阿里就向那位太太苦苦哀求：“别叫警察。会在弗伦斯堡记录在案<sup>①</sup>，我已经有过一回了。会罚款的，也许会吊销执照，甚至被赶回土耳其。”那位妇女还在犹豫，可是人群却异口同声：“必须找警察。”有人已经急忙到对面的商店里去打电话给警察了。

不久后来了一名上了年纪的警察，十分怀疑地打量我(阿里)，听取了事故发生的过程，要求我跟他到附近的派出所去。“要是他有什么在案的话，我马上通知您，”他安慰那位女士说。他把驾驶执照上的照片和阿里的面貌作了比较，点点头，好象想说：“一致。”尽管根本一点也不象。

他通过计算机检查了其他的资料，看来使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计算机的报告全都没有问题。

“什么问题也没有，可以走了，”他打发我(阿里)走。

“工作很好，”我向他祝贺，“在土耳其这种事要一两天。”

“我们这儿是德国，”他不无自豪地教训我说。

“我知道，”我答道，“尽管如此，向你祝贺。”当我重又到外

---

① 联邦德国在弗伦斯堡设有交通违章记录中心。——译注

面时，心中十分高兴。

## 油漆栏杆

为了调剂生活，阿德勒为我(阿里)安排了一项特别活动。“明天早晨7点你到特奥·雷梅特公司去报到，那是我们雷梅特的兄弟，你去做计件活，油漆栏杆。”——“有多少活儿？”阿里想知道。“多长时间？”——“哦，有的是活儿，”阿德勒说，“够你干一年的。”——“挣多少钱？”——我问这种不该问的事，使阿德勒感到狼狈。他假装算了算，脱口而出：“唔，每米一马克吧。”

次日上午，我去厂房向那位了解此事的工长作自我介绍。他得知我是阿德勒派来时露出温和的笑容，问起商定的工资是多少。当他听到每米一马克时，他说：“要是你想挣点钱，就得加劲干，不能休息。”看来特奥·雷梅特公司在赶任务。雷梅特为鲁尔化学公司一套新设备制造的铁栏杆马上就要交货进行安装。

将近有一周之久，我累死累活地干。如果我(阿里)从早干到晚——不管怎么样有时休息10分钟——，每天最多油漆50米。栏杆高1.25米，三根圆杆要用刷子油漆，下面还有一个较大的底座，你得用小刷子伸到每个细小的缝隙和犄角里去刷。在此期间还要用吊车把栏杆的部件从厂房的另一角落运来，油好以后再运走。这些时间没有人付给阿里报酬。有时工长跑来指责有些栏杆刷得不够仔细，有几处细小的地方没有刷到。这意味着，再用吊车把这些笨重的东西运来运去。

我(阿里)试着同时用两把刷子刷以节省时间，但收效不大。一个受雷梅特长期雇佣的德国工人曾在我之前按计时工



资油漆过这种栏杆，他同情地望着我说：“这种速度一天下来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你很快就会累垮的。慢慢来吧。”——当他听说计件工资是多少时，他摇摇头：“这我可不干，我一个也不会刷。”——他坦率承认自己至多能达到阿里的 workload 的一半，每小时计时工资 13 马克。按阿里的速度，每小时大约是 5 至 7 马克。

虽然待遇差，但计件活使人产生完全不同的劳动态度。尽管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但这种压力不同其他。没有人老是站在你的后面催促你。用不着害怕上司、工长、监工。你干这种活时心情比在蒂森干活要愉快一些，虽然你回家时也累得要死。当你看表时会十分奇怪，时间已这么晚了，你宁可时间还早一些。在蒂森那里情况恰恰相反，时间过得很慢，到了下班时候，你会非常高兴。你计算每一个钟头，当你看表，发现到下班还有四个没完没了、折磨人的钟点时，你会大吃一惊。计件工作是假想的独立自主的最低最发育不良的阶段，并无任何与此有关的真正好处。

雷梅特的工长每天检查我的日工作量并验收我的活。有时我还得对某些部件再刷一遍或把油漆时产生的流挂重新用砂纸打平后再上一道油漆。这个时间也是无报酬的。——当我（阿里）向工长谈到我的工资太低，每小时只挣 5 至 6 马克时，他摆摆手说：“这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付钱给阿德勒。他得的钱还不少哩。你得找他去说。”究竟这次他获利多少，工长不愿向阿里透露。可我估计，他即使什么都没有做，只是介绍奴隶工人，他的收入至少也要高三至五倍。

我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用赭黄色油漆把 210 米栏杆刷完，我的鞋子、裤子和衬衣当然也沾满油漆，至此我的任务暂告一段落。雷梅特的工长说，我油漆的栏杆将尽快由雷梅特

的手下人安装到鲁尔化学厂的新厂房去。再过几个星期才会焊接新的栏杆。

阿德勒所许诺的一年持续工作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当我(阿里)在电话里向他谈到这种情况时,他说:“没关系。明天早晨5点你再到蒂森组去报到。”阿里问起油漆栏杆的报酬,他说:“等到我从雷梅特那里拿到钱,我们就结帐。”并说:“周末你仍可继续去油漆栏杆。”

三个星期后,我(阿里)一直还未得到完成艰苦的特别任务所挣的那210马克,于是就向阿德勒提出质问。“你那些栏杆油得不合格,”他厚颜无耻地说。“我不能把这钱给你。由于你我遇到很大麻烦,没有拿到我的钱。”我问:“为什么?”他瞎扯什么“我的数目”不对,大概指的是油漆的厚度不符合要求。——我认为这是他惯用的借口和伎俩,但是,即使这是真的,那也不是我的过错。我干的活儿都经过雷梅特工长的检查和符合规定的验收。于是,阿里就去找雷梅特先生本人要钱。为了吓唬一下雷梅特,我在蒂森下班后身穿工作服,一脸黑灰,径直前往特奥·雷梅特工厂的办公楼。在楼梯间的前厅里,一幅大镜框内装着雷梅特公司老板特奥·雷梅特的处世格言,十分引人注目:

“有人把企业家当作是十恶不赦的恶狼。有人认为企业家是可以不断挤奶的母牛。只有很少人把他视为拉车的人。”

阿里这个吞食灰尘、油漆铁栏杆的人、搬运工和苦力,动身去找那位拉车和制定格言的人雷梅特。我人不知鬼不觉地从接待处的女士身边走过,进入头头办公的那一层楼。雷梅特本人不在,他的一名经理正在打电话谈一笔好几百万的生意。他看到我(阿里)走进来时愣住了。“油度怎么啦?”我向他提出质问。“我干了活,工长说行,可现在没有钱。”——“你

指的是油漆的厚度，”他纠正阿里的话，“我一无所知，去向阿德勒要钱。”

皮球还在踢来踢去。阿德勒派阿里到鲁尔化学厂去“补刷”，据他说：“不然就没有钱。”——阿里在奥伯豪森边缘地区鲁尔化学厂一眼望不到边的气味呛人的宽阔厂区里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令人眩晕的高空发现他的栏杆已经安装在一个钢架子上。他想爬上去，可是一个监督人员不让他上去。“有生命危险，那儿还得安装围栏。”——他不知道什么“油度”或“厚度”。他说：“这都一样。要紧的是栏杆牢固。”——我又一次向阿德勒抱怨（打电话）：“是的，还是阿里。工长说油漆无所谓。栏杆牢固，没有人再会掉下来。”——阿德勒大发雷霆：“先补刷，下星期再去，不然没有钱。”——

对鲁尔化学厂的下一次访问也没有什么结果。如果我（阿里）果真把已安装好的栏杆再刷一遍，那我每小时的工资就减少到两马克了，因为在高处爬来爬去，干活时间就会大大延长。

不管怎么说，这次特别任务直至最后也没有给阿里带来一个芬尼。可那是一次值得自豪的艰苦劳动。他油漆的栏杆如果连接起来可以围半个足球场。

### 犹如美国早期西部地区

为了起码得到我们的一部分工资，我们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

阿德勒住在奥伯豪森一个整洁幽雅的别墅区，离奥古斯特·蒂森钢铁厂约有15公里，附近有一片森林地带把工业污染隔断。从灰不溜丢的肮脏的工人居住区到阿德勒的住处得

换好几次公共汽车，而公共汽车的班次又并不很多。工人们要等很久。有些事先打电话和阿德勒约好的人会吃闭门羹。更为保险的是出其不意地蹑手蹑足地走近他家，而且按门铃时不要让他从窗口看清是谁。阿德勒有一套反复使用的固定说法来对付他的手下人：“现在我不明白。”——“我不会少给任何人一小时工钱。”——“我这儿没有支票，现金反正没有。”——“我找你好几天了。工资到星期一结清。”（当然不是这样——作者）“我的办事处通常在丁斯拉肯。我在那儿还有一家钢结构企业。我的东西都在那儿。”——他请某人改日去那儿，到时自己却不露面。——或者他对我（阿里）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谁也别想再增加一个马克什么的。这你可以放心。下个月我们再谈一次。——他从不加薪。他不但没有按照诺言把阿里的工资增加一马克，反而在两个月以后扣掉他一马克。他说了他不想给加班费——即使是在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和圣诞节干活——的原因：

“我们索取的报酬比别人少。为此蒂森才找我们这样的中小公司，因为我们通常能比蒂森的自己人更便宜地工作。所以他们才找我们干！他们很想再解雇更多的蒂森人员，更多地找我们这种公司干，因为我们要价更便宜。”他教人们耍花招，对当局制造合法的假象：“开临时工收据！德国有一个法律，每月纯收入不到 390 马克的可以免税，要是再借用一个亲友的名字，那临时工的纯收入就是 780 马克了。这是完全合法的。”或者他遇到有人生病时便向大众疾病保险储金管理处进行补报。

为了逃避早就到期的支付，他老是向他的工人要求：“计时单！由领班岑特尔签字，否则就不给钱！否则我记不住。”我的印象是他和岑特尔商量好耍这个花招，因为岑特尔通常

在下工后拒绝在计时单上签字。“没功夫，”他往往推托。“反正我每天都向阿德勒具体汇报你们每个人干了多少钟头。”我们就这样跑来跑去，拿不到所要求的计时单，因而也领不到工资。虽然我们的工作时间在蒂森的计时卡上同样有精确的记录，但阿德勒却不予承认：“我不想知道。对我来说，计时卡不足为凭。”

我(阿里)和奥斯曼一起去找阿德勒，事先没有约好；为保险起见，我们等到晚上6点半钟，以便能在家里找到他。那天是奥斯曼在联邦德国的最后一天。他不干了，准备在第二天乘公共汽车永远返回土耳其。前一天他曾去找过阿德勒，但没有找到，尽管他事先曾打电话通知过他。

阿德勒见到我(阿里)时大吃一惊：“你这象什么？真糟糕。”我(阿里)说：“是啊，干活时就是这样。老是垃圾和尘土，得洗干净，可洗不掉。脏东西太多了，进入皮肤。”——阿德勒(担心他的壁纸)：“请你离开我的白墙，至少保持一米距离，不然你会靠上去的。你困得都站不稳了。”——对奥斯曼：“你们随随便便就来了。你们大概疯了吧。真不害臊！晚上7点还跑到这儿来。”奥斯曼说：“明天我就要回土耳其去，还想买点东西。一点钱也没有。”——阿德勒：“我也没办法。这种事真气人。”他再也无法恢复自制，这一次他的气愤不仅仅是假装的。他至少还重复了三遍“真气人”这句话，然后又更加气愤地说：“以后你们还会在夜里10点或11点跑来。”——“不，不，别害怕，”我(阿里)说，“这么晚不会，我们也得睡觉。”阿德勒却不为所动：“你们疯了。晚上7点钟到我家来捣乱。真不害臊。别再干这种事了。我又不是好欺负的。明天去土耳其，这也是骗人的，我可不上当。”——我(阿里)：“那是实话，我送他上车。”阿德勒：“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最好别管。7点或

7点1刻受到这种人的拜访。我们这儿又不是生活在美国西部地区。”

奥斯曼不放松：“可是，阿德勒先生，你叫我怎么办呢。明天我就不在了，那我实际上就等于白干了。”

“我过礼拜也没钱了。请给点钱吃饭。”

阿德勒：“哼，你以为我是摇钱树吗。快给我滚，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

在外面街上，奥斯曼眼泪汪汪：“他骗走了我的钱。现在我永远在土耳其，毫无办法可想了。”

### 尤克萨尔的愤怒

又是在蒂森。下工后我筋疲力尽，浑身是土，在等车时和尤克萨尔·阿塔萨亚尔(20岁)作了如下的谈话。

尤克萨尔：“我买30至40马克彩票。不常买。”

我(阿里)：“每星期？”

尤克萨尔：“有时这样，也许我运气好。宁可这样花三四十马克也比抽烟强。想想，每天抽烟，一个月呢？算一算：4乘30。”<sup>①</sup>

我(阿里)：“是啊，120马克，一年就是1440马克，10年14000，再加上利息，20年就快到三四万马克了。”

尤克萨尔：“要是还能活20年……那也不坏。”

我(阿里)：“不，干这种脏活，两年就可能完蛋。得癌症。不总是马上发作，有时五年以后才发作。”

尤克萨尔：“是啊，先是感到痛什么的，一下子就死了。你

---

<sup>①</sup> 联邦德国香烟每包通常为四马克。——译注

死以前，至少攒一点钱，然后全都花掉。要是我有一些勇气的话，那我就提前结束。你想要活多久？这种狗屁生活！你相信上帝吗？”

我（阿里）：“不信。在我们心中，不在外界。你不能信赖他，他不会帮助你的。”

尤克萨尔：“要是上帝的话，那上帝为什么创造阿德勒？”

我（阿里）：“设计错了。原来想的完全不同，他失算了。”

尤克萨尔：“要是上帝的话，不，要是有的话，他是不会犯错误的。上帝就是上帝，不应当犯错误，也就是不可能犯错误。”

我（阿里）：“也许是个傻子、疯子，什么时候糊涂了。否则就不会有阿德勒，不会有这种狗屁工作。”

尤克萨尔：“嗨——我诅咒这一切！”

20岁的尤克萨尔·阿塔萨亚尔是土耳其劳工中最细心的观察者之一。他知道德国人中谁对土耳其人抱有偏见，即使他并不明言。他甚至能看出德国领班和班组长每天的情绪，及时提醒他的朋友们提防他们发脾气刁难人。“注意，岑特尔今天要找人出气，”当“长官”还坐在他的奔驰车里打盹儿的时候，一清早他就在集合地点说。他从一些细小的征兆中感觉到暴风雨即将来临。的确，几小时后岑特尔大发雷霆，把一个土耳其工人打发回家，因为此人竟敢在不计报酬的休息时间内离开工作场所，因而岑特尔在巡视中没有见到他。

尤克萨尔·阿塔萨亚尔只是名字象土耳其人。他是在德国长大的，说一口标准德语，并且自己也觉得是个德国人。他的外貌也完全不象一般的土耳其人。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眼睛是蓝灰色的。他父亲是俄罗斯族。只是他的名字把他推

到土耳其劳工的队伍中，他和他们彼此言语不通。他要是有一个德国名字，就不会受队长阿尔弗雷德的气了，此人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向他和其他外籍劳工撒气。

有一次，阿尔弗雷德又让大家拚命干活而完全忘掉了时间，尤克萨尔竟敢提醒他说，休息时间早就到了。阿尔弗雷德气势汹汹地站在他面前，向他怒吼道：“干完活再休息。在德国过去一直是这样的。我们德国人都是这样长大的。你知道我对你怎么看吗？你是个大浑蛋，你是浑蛋。”在休息时，阿尔弗雷德又大发雷霆：

“你知道，要是你碰上门格勒的话，你知道他是谁吗？是我们最优秀的医学家之一，他还活着，他们没有把他弄死。如果他站在斜坡下，你走过这儿，他保险会对你说：从右边出去！进毒气室！我不能用你作试验。你知道为什么吗？”尤克萨尔脸色煞白，不敢反驳，只是说：“不，为什么？”——“因为跟你根本没法打交道。你来到此地，只是为了逃避军事独裁，在这儿德国幼儿园里长大，在这儿被抚养成人。如果你留在那里，就会学会什么叫规规矩矩地生活。你们土耳其啊，你们还从来不曾经历过什么民主制度。你们根本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你们先得学会在军事独裁下生活，别在此地依靠我们混日子。”

尤克萨尔没有对这种发作进行反抗。他从其他经历中得知，再说下去就会动用武力。他宁可回避进一步的辱骂，一声不吭地拿起他的面包，坐到厂房比较远的一个角落里听不见看不到的地方去。15分钟后他回来上工的时候，在他那沾满灰尘的黑脸上眼睛底下可以看到擦过的比较明显的泪痕。

再者，尤克萨尔也是发觉我在短短的休息期间频繁地作笔记的唯一的人。他有时向我眨眼示意，好似想要向我表示他同意我的作法，这也符合他的心意。尽管如此，这仍使我感



到惶惑不安。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否会跟其他人谈这事。

一天，在高炉区干活又热又累，下工后我们筋疲力尽地坐在工厂围墙外面地上等候面包车来接的时候，他问我：“你全都记吗？”——“请别跟别人讲，”我乘机说，“现在我还不能讲，可以后你全会知道的。”

他看到我是多么惊慌、多么严肃，就不再问了。整整几个月，他滴水不漏。“你要把这些畜生在这儿对我们干的一切都一五一十地记下来，”他还悄声对我说。“你要详详细细地记。”——他似乎猜到我打算干什么，经常向我提供目标明确的情报，而不要我作更具体的说明。他倒不如说是个不问政治的人，但他——虽然几乎还是个孩子——却遵守保密纪律，出于一种深受蹂躏和绝望的感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休戚相关的感情。

尤克萨尔·阿塔萨亚尔介绍自己的情况：

“我刚出生，父母亲就来到德国，那是20年前。我们的老家是阿马西亚。这个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不太清楚。反正是靠近亚美尼亚，具体我也不清楚，实话实说。

我们在家里讲土耳其语，谈简单的事。可是我讲不好。真正谈论一个问题，我就不行了。报纸，也就是土耳其报纸，我也只能看懂一半。不过我父母，他们讲一口土耳其语，他们只用土耳其语交谈。只是他们又不会讲很好的德语。我觉得自己更象是德国人而不是土耳其人。

我父亲在蒂森工作，在轧钢厂，紧靠着蒂森。他收入也很少。1200、1300马克。

我是怎么去的？是一个同事把我介绍去的。我只是去见领班。这个同事让我穿上工作服。我也穿上了。我问他们还要不要人。他们说要，可以上车。于是我就上了汽车，然后汽

车就开往蒂森。到了那儿，我们又被分散到各个建筑工地上去。

第一天很糟糕。脏透了，全是灰尘、浓烟，什么都有。对人体健康十分有害。很坏。我们在铸铁车间打扫卫生，清洗机器设备，总是吸进灰尘和烟雾，使人几乎要吐，有一人昏过去了。有的已经昏倒了，他们已无法呼吸。

干这种脏活，我们很恼火。连劳动鞋都不发给我们。阿德勒那家伙是个毫无同情心的人，他不顾别人死活。如果有人死了，他也毫不在乎。这话也是他说的，比如说到钱，他说，你又用不着这么多钱，单身一人，你要感到高兴，在这儿有工作做！

他完全不管别人怎样。别人死活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就象靠妓女为生的皮条客。他只要我们为他挣钱。他是那种自己总是藏在幕后的表面手脚干净的恶棍。

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全部工资。目前我还该从他那儿要800多马克。

有些时候活特别累，累得人腰酸腿疼。由于灰尘和烟雾，本来就一直很糟糕。这使人十分虚弱，其实每天都很糟。我发现这很伤肺。我原来象个运动员。从前我总是至少跑步一小时。可现在只要跑几分钟，我就有所感觉，肺部不适。年纪大一些的工人看上去很糟糕。雷梅特的人也是这样。

有的人干了三四年，看上去很衰老，他们年龄只有30来岁，看上去却象50岁了，甚至60岁。头发全掉光了，脸又瘦又小，面色煞白。

有时我认为自己得了癌症，肺癌；我们所吸进的灰尘，有时使人伸手不见五指。制氧设备有时十分糟糕。我怕会在那儿痛苦地完蛋，我怕这个。

有一次我觉得好象在那儿发生了一场原子战争，看上去

是这样。全是灰尘和烟雾什么的——我不知道，这非常可怕，就象电影里那样，几乎可以和战争相比较。

有些地方干活很危险，例如有一个地方有瓦斯危险，能叫人丧命。我们必须在这种屋子里工作，那儿非常危险。挂着的牌子上说，如果瓦斯大量溢出，就会叫人丧命。而瓦斯是看不见闻不到的。那儿有一个小小的检测仪，可以进行测定。我也经常感到头晕。我还感到恶心。有些时候真顶不下来。有些日子我一点也不饿，一口也吃不下，只吞吃灰尘。真可说是吃灰尘，真是咽下去，空气中那么稠密。有铅、镉等等，不知道里面都是什么。有时我跑到角落里去吐，坐到那儿呼吸几口空气。

你得亲自经历这一切，即使事后洗过淋浴，这一切都积攒在肺里不走。你外表上虽然干净了，可是体内，一切都在里面。实际上你就是站在垃圾中清除垃圾。可第二天垃圾又有了，老是这一套。

钱又给得那么少，我真不明白。他们想尽量发财，一毛不拔，已经很有钱了。要是阿德勒进了班房，哼，雷梅特公司也会继续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完蛋。而蒂森也是知道这些情况的，蒂森雇的人，他们肯定知道。

对我来说，生活其实什么也不是。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意义。开始，十四五岁，也就是慢慢长大时，有个女朋友，想跟她上床睡觉，是吧？睡了，那又怎样？不，这不是最了不起的事情。这就是说，一个人自己想干什么，头脑里这样想，这时生活就有意义，否则就什么也不是。这时人们也有兴趣干些什么，可是此外总的来说生活毫无意义。生活究竟是什么？

我什么时候最幸福？在一生中？那是我12岁那一年，我和父母一起到土耳其度假。那可棒极了。完全另一种感情。

最糟糕的事？是的，现在我在这儿受雇于阿德勒公司替蒂森干活，这是最糟糕的事，还不如死了好。”

## 应急淋浴

我们每周至少一次被派往制氧厂去清除不断沉积在那里的尘土。

我们必须在封闭的屋子里，在50或57米高空中用压缩空气把机器上的灰尘吹起，至其落下后把它同约有一至三厘米高的厚厚的粉尘扫在一起，再用手推车运走。尘雾沉甸甸地进入支气管和肺脏。这种尘埃中含有很多铅，此外还含有象锰和钛这些极端有损健康的贵金属，自然也含有大量细铁粉末。蒂森厂一个监督我们工作的工长，有一次对在干活时咳嗽起来并呼噜呼噜地要求口罩的尤克萨尔说：“我们没有口罩给你们。铁有益于健康，能造血。”还说：“要是你长期吞吃铁粉，你可以把一块磁铁放在胸口，保险会吸住。”——根本没有心思开玩笑的尤克萨尔，后来向我们领班打听磁铁之事是否是真的，当着全队人员面前被说成是“土耳其傻瓜”而备受嘲笑。

我们在工作时，报警器和红色报警灯一再警告我们立即离开现场。为增强其效果，信号灯牌还经常发出灯光信号：“在进行吹氧作业时立即离开转炉整个现场！有爆炸危险！氧气逸出。”——但我们仍须继续工作。一个土耳其工人害怕起来，想要撤离危险区。蒂森的一名工长明确告诉他必须继续工作。如果不干，那就是拒绝工作，他可以回家去了。

一个领班后来以他的观点向我们解释了经常发出警报的意义：“过去在转炉区曾经出过事，因此钢铁厂必须安装这种警报系统。要是情况不妙，再出什么事，那蒂森就不负责任

了。因为曾明确警告过你们，不得在那儿工作。”

这就是说，蒂森钢铁厂这样就摆脱了责任。如果出事，那是我们自己的过错。警告是明确无误的，也就是说，那是我们自己愚蠢。不过使我们放心的是，在这个危险区几个地方装有淋浴设备，一旦起火，可以躲到喷头下面。为了使不掌握德语的外国人也能看懂，在瓷牌上画着一个身穿全套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工人的剪影站在喷头之下，旁边是熊熊烈火，牌上写着“应急淋浴”的字样。

终于在三号烧结炉附近有一次愉快的工作了。我们站在房顶上，用绳子把灰土桶和烂泥桶往垃圾桶里送。活虽然很累，很快就出汗了，可空气还过得去，可以眺望工厂景色，甚至可以看见远处的莱茵河。从阴森森的地下土牢来到室外，使人耳目一新，俨然有隔世之感。即使下雨也心甘情愿。我们尽情享受自由了望和呼吸，有一种好似从监狱中被释放的感觉。我们得以享受这种相对的自由近三个小时，突然间我们又被撤回到制氧厂方向去。我们蹲在工具和手推车上，乘着奔驰牌大轿车以相当快的速度前去。在一个看不清楚的地方，一个上了年纪的土耳其工人差一点被我们的车压死。队长对我们的土耳其司机说：“尽管加大油门，有奖金，因为少了一个土耳其人。”——领班岑特尔向我们说明是怎么一回事。生铁导管——一个庞然大物——堵住了。全部生产都停顿了。每一分钟对钢铁厂都意味着巨大损失。由于堵塞，一个机器部件也损坏了，新的已运来，正在安装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钻进狭窄的排尘管去设法把它疏通。“你们要加紧干，”领班说，“等设备修好后才能出来。要求最迟到13点完成。”

我们从摇摇晃晃的梯子上爬进还没有肩宽的隙缝，试图用撬棍、大锤和铲子把已粘结在管道上的铁矿石敲掉。可是，

由于已结成硬皮，很难弄掉。队长阿尔弗雷德一个劲地催我们快干，他看到硬块只是一点一点地落下时火冒三丈。“你们这帮可恶的霍屯督人，你们这帮臭卡内加人<sup>①</sup>，你们这帮傻土耳其人和臭犹太人，”他一下子用他所知道的所有民族来称呼我们。“你们真是废物，统统该枪毙！”他暴跳如雷，险些儿动手打人，把一根撬棍向新来的印度伙伴头上扔去，幸而撬棍只擦过他的脑袋。“还是留在自己家里吧，”他向他吼叫。“我也不会去你们土耳其工作的”。——“他是印度人，”我(阿里)试图纠正他。但阿尔弗雷德仍然坚持：“从远处看，人人都象是从安纳托利亚来的。他脸上同样有那种傻呵呵的表情。不管什么人，我都从外表看得出是否是笨得出奇的安纳托利亚人。”

阿尔弗雷德也对一个德国工人硬说我(阿里)来自安纳托利亚。“他老提一些颠三倒四的问题，真叫人受不了。”有一次他问我为何不留在土耳其，我答道：“由于政治原因，因为那儿军事独裁。”这促使他对那个德国同伴说：“阿里在这儿工作，因为他不能回土耳其，因为他们那里有疯狂的霍梅尼<sup>②</sup>。”

在阿尔弗雷德作了一小时毫无意义的催逼和折磨后，领班来了，亲自察看后确信用我们的原始工具是无法取得进展的。他搞来了气锤、气凿和长长的刮具，我们必须在尘土飞扬的情况下，不带口罩，把凝结成块的铁粉吹起来。在不住口的骂声中，我们侧着身子匍匐爬进机器的内脏。在狭窄的钢管中，轰隆隆的气动工具的响声震得耳朵疼。诸如听力保护是没有的。眼睛火辣辣地作痛，所有的人全都在咳痰、咳嗽，喉咙呼噜呼噜地响，一个赛过一个。那真是地狱。后来梅赫梅特对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宁可蹲几个月监狱也比再受这种活

① 卡内加人是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土著居民。——译注

② 伊朗宗教领袖。——译注

罪几小时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阿德勒想出最坏的死亡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下定了孤注一掷的决心，去干一次值得一试的破门盗窃，甚至去抢劫银行。凡是呆在这儿的人已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对他们来说甚至监狱也不可怕了。——膝盖擦破，血透过了劳动裤，劳动手套被撕破。管道一直还没有打通。到了下午1点、2点、3点。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笨重器械使劲去捅，把一切都吸进体内。在这当中来了蒂森的一位领导干部。他破口大骂，说下一班已在等候再次开动机器，叫我们不要这样疲疲塌塌。可是我们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一门心思渴望尽快离开此地。“你们给我呆在里面，一直到设备重新正常为止，”领班命令说，“即使是20小时。”

内科医生尤塔·韦策尔博士谈到她的外籍患者的情况：

“通常外籍劳工都被指派在特别恶劣的操作条件下工作。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肮脏工作，而且——这更为严重——常常是一些身体采取强制性姿势达数小时之久的活动，其后果便是脊柱和关节提前出现劳损现象。同时强烈的粉尘和烟雾引起支气管炎和胃炎。此外还由于接触有害健康的物质（如石棉）而使危险增加。

这些工作场所我当然只是从一些患者可信的叙述中听来的。在视察过程中，即使我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给我看这些地方。尽管失业人数众多，但公司也很难找到德国人肯干这些工作。企业（如钢铁厂、矿山、道路工程、汽车制造业、造船厂、化学工业）如此依赖外籍劳工，因此也只得接受比较高的发病率。在这一方面，完全有必要把德国工人和外籍工人的发病率同他们不同的工作条件联系起来。”

尤克萨尔鼓起勇气以近乎乞求的口气向蒂森的这位领导

人要求防尘口罩。此人无动于衷地答道：“这种东西我们没有。你们他妈的快给我干！”到了18点15分，经过12小时奋战，我们这次备受熬煎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在汽车上，大多数人以不舒服的姿势坐在工具上就已困得打起瞌睡来。

在这次劳动之后，我(阿里)的支气管几乎得了慢性炎症。今天——六个月后——我要是咳嗽，吐出的痰常常还总是黑的。

### 沉重如铅的肢体

虽然好些工种的粉尘负荷十分严重，我们不仅吸入灰尘，而且确确实实大口吞咽灰尘，却没有有人认为有必要对我们的健康状况和那些物质至少检查一下。他们有时发给我们一些牛奶。就是这些。我(阿里)偷偷地收集了闪烁着各种颜色的尘土的样品。一小把的重量就象一块石头。这些材料被转交给不来梅大学不附属于工业的环境研究所。这种检查是不来梅多年来所进行的日常工作。例如该所也对柏林“日光”电池厂厂区的样品进行过检验，致使这家从前属于联邦邮电部长施瓦茨·席林个人所有、如今属于他妻子所有的企业在报上引起轰动。本书付印之前不久，对蒂森厂粉尘进行检查的初步结果已经出来。这个研究所迄今还从未见过有害物质集中到如此危险的程度。对第一批样品的分析就已使科学家们为难，-因为灵敏的仪器几乎无法对付如此高度的集中。所发现的元素犹如重金属界的“名人录”：砷、钡、铅、铬、铁、钒、钴、铜、铀、铋、铍、汞、镉、铷、钼、锡、锑、铈、钇、钨、钽、铪、铟、铊、铀和镭——共计有25种不同的有害物质。

有两种金属数量特别多，其危险性最大：汞和铅。不来梅



大学研究所对此说：

“铅是一种蓄积毒，这就是说，即使少量吸收也会积聚在人体内。这种积聚有可能导致慢性铅中毒……性格改变、神经错乱、瘫痪和遗传病”均有可能。汞造成的后果不亚于铅。科学家们说：“汞中毒的初步症状出现在感觉中枢，表现为手脚发麻坏死，其次为口腔麻痹。同时视觉中枢出现损害，视角受到限制。接着而来的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结果是肌肉灵活性减少和动作不协调，从而造成严重的平衡障碍，臂腿时常痉挛并由于肌肉抽搐而变成畸形。大脑萎缩可达35%……”

两种元素“最少的结合”就有可能产生毒素，因此法律准许的食品中汞的“最高剂量”为每公斤一毫克(100万分之1)，铅的“最高剂量”为每公斤10毫克(100万分之10)。我们被迫吞吃的蒂森“伙食”中的汞含量要多80倍(准确地说是100万分之77.12)，铅含量多200倍(100万分之2501)。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每人每周吸收三毫克铅是尚能容忍的最高值。而尤其不幸的是：“沉重如铅的肢体”这句俗语名符其实，因为进入体内的铅90%汇聚在骨头中。

第二种成问题的物质是汞，情况也类似。它也在人体内积聚。

这些有害物质以何种程度集中地沉积在钢铁工人的肺脏、血液和骨骼中，实际情况要看验血结果才能得知。大多数工人老是诉说身体很不舒服，如哮喘、恶心、食欲不振、呕吐、血液循环障碍以及严重的支气管炎。科学家们毫不怀疑，支气管炎同粉尘刺激有密切关系，其他的病痛则是重金属，尤其是铅中毒的典型症状。

## 一次得病，贻害终身

研究病因的人曾对全世界炼焦厂工人健康损害情况进行过多年的调查，因此毫无疑问，炼焦厂的工作会使人得病。

主要危险来自炼焦厂废气中的炉尘，因为炉尘中含有焦油物质。“焦油或焦油物质有致癌作用，”汉堡曼茨教授在《劳动医学》专业杂志上写道。

只是对炼焦厂工人癌症发病率的说法有所不同。在联邦德国，当局至今只承认皮肤癌是职业病，是接触煤焦油的典型后果。但最大的问题远不在于此。

炼焦厂工人患肺癌的比例比所有德国男人平均高三倍半，膀胱癌和胃肠癌比平均数高一倍。拿炼焦厂工人同机关职员相比，比例就更为惊人：炼焦厂工人因膀胱癌死亡的人数高10倍，患肺癌的人数高8倍。

其原因为科学家所熟知：煤焦油含有苯并芘，这是一种强烈致癌物质。抽烟时也会有苯并芘，在炼焦厂的空气中它的浓度要高三四百倍。

对波兰炼焦厂工人进行的一次普查表明，“一般的呼吸器官慢性病”（如慢性支气管炎）同焦炉气有密切关系。但不仅如此。谁要是得了支气管炎，就很容易患其他疾病，因为焦炉气会大大地削弱人体的免疫系统。

一次得病，贻害终身。这是一句警句。

曼茨教授了解其后果：炼焦厂工人的寿命要短得多。

## 试 验

“停止用动物作试验——用土耳其人代替！”

杜伊斯堡—韦道—幢房屋正面墙上的标语

### 充 当 试 验 品

我的土耳其同事奥斯曼·托卡尔（22岁）失去了他的住宅。阿德勒一再以空话敷衍他说以后发给他工资，可他的房东却不肯再等了。奥斯曼不得不搬走，并且还留下几件破家具。房东把这些家具作为抵押品锁在地下室里，一直到奥斯曼还清他拖欠的620马克房租。从此以后奥斯曼就没有固定住处，有时睡在堂兄弟家过道里的床垫上，有时到朋友家去住几天。他不能在什么地方长期住下去，因为他们自己住得都很挤。

奥斯曼不好意思地向我承认，有几回他在露天公园长凳上过夜。现在他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因为他不能证明自己有固定住处，而且还申请过社会救济金。他不愿返回土耳其。他只是偶而回去探亲访友，在德国冷冰冰的异国他乡，他感到比在他父母的故土更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在自己祖国只度过最初两年。他说德语比说土耳其语更好一些，但两种语言对他来说始终都是外国语。他不知道自己真正属于何处，他

觉得人家“偷走了他的灵魂”。

我让奥斯曼住狄塞尔街，但他拒绝了。他由于在蒂森工作得了慢性刺激性咳嗽，害怕“在靠近炼焦厂的毒床上”睡觉。有时他想自杀。有一次我同他一起在一个满地尘土的地下室干活，我们大口大口地吸入脏物而禁不住呕吐起来，当我们在短短的休息时间内爬回阳光下的时候，他说：“我真想一头跳进高炉烈火中去。咚的一声，你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我(阿里)难堪地沉默不语。

“我们只是害怕，因为对我们是新的，还没有人做过，”奥斯曼说。“象虫子一样在尘土中爬并总是被人踩，这要糟糕得多。”他讲到有个工人在一次事故中掉进高炉，马上就被烧掉。由于他片骨无存，就从钢水中象征性地取出一些交给其家属去“埋葬”。实际上他的身体已同钢一起被轧成薄板，拿去制造汽车、锅盆或坦克。

奥斯曼说他想去看望在乌尔姆的叔叔。他可以住在那里，找到工作，虽然至少象在蒂森那儿一样有害于健康，但至少能拿到工钱。起初他不愿讲是什么工作：“在蒂森那儿，我们得吃灰尘，干很多重活。干其他工作，我们只需要吃点什么并献一点血。”奥斯曼说，非常欢迎土耳其人和其他外国人如印尼人、拉丁美洲避难者和巴基斯坦人从事这种特殊工作：给制药工业充当**试验品**。我问他能否让我替他去参加定于几天以后开始的一次试验。作为补偿，我愿把他由此而失去的工资的一半即 1000 马克送给他。他同意了。这正中我下怀，因为我由于肩膀受伤和渐渐变成慢性的支气管炎，本来早就要放弃在蒂森的沉重体力劳动了。

奥斯曼把我介绍给新乌尔姆 LAB 研究所。那是一幢阴森森的大楼，带有 50 年代青年旅舍那种混浊空气。作为“旅舍

主管人”，一个 25 岁左右、乐呵呵的年轻人坐在接待处。他力求制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在候诊室里有几名打扮成易洛魁人<sup>①</sup>模样的朋克<sup>②</sup>，他们已是这儿的常客了，还有几个具有明显南欧人特征的外国人和若干失业青年。有两人是在车站过夜的流浪汉，其中一个满口酒味。

乌尔姆 LAB 是欧洲最大的私营试验所之一。登入卡片索引的被试验者有 2800 人。被试验者就是被当作试验品的人。也可以这样说：在我们身上检验一些药品的效果，以保证制药工业的利润，作为副作用，也有可能对病人产生某些好处。

大多数人体试验并非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并不是研究什么新药，而是为旧药品的销售、扩大市场、广告宣传服务，用新的名称为其开辟新的销售市场。事情十分简单，除了已用不同名称上市但几乎全都以相同的化学成份构成的 100 种药品之外，再推出第 101 种完全多余的药品。

已经多次得到证明，那些公司自己篡改和改写有声望的临床医生的鉴定，虽然这些鉴定是根据公共医院对人的试验作出的。那么，那许多事先就在雇请的“健康”的被试验者身上试验药品，实际上完全依靠工业提供任务的私人研究所的情况又会如何呢？

有一点很清楚：不良的甚或是惊人的结果无论如何都会妨碍生意，不管是医院医生还是试验所透露给公众的。

“不来梅预防研究与社会医学研究所”所长埃伯哈特·格赖塞尔教授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实践中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被试验的药品如得出不良结果，则药品试验的情况就不会公诸于众。这是我多年来在审查委员会（卫生部所属专

① 北美印第安族。——译注

② 打扮得奇形怪状、举止反常，以表示对社会不满的年轻人。——译注

门委员会)接触过的许多鉴定人都谈到过的一条经验。”\*制药康采恩虽然委托进行许多人体系列试验并得到有关鉴定,但它们只向联邦卫生部上报对它们有利的结果。当局几乎只是在个别医生和制药工作人员不再对这种做法负责并将情况透露时才得知消极的结果。从官方来说,联邦德国药品批准监督部门甚至不了解究竟在何处进行何种研究。这个国家制药康采恩的实力使得这成为可能。其他国家有着十分严格的申报义务和规定。

我(阿里)把奥斯曼给我的单子交给“接待处长”并问他能否分派一个危险性小一些的试验。奥斯曼警告过我(阿里),预定的试验将会产生相当强烈的难受的副作用。——“别害怕嘛,”他安慰我说,“至今所有人还都是活着出去的。”还有:“我们这儿做得很轻松。”——旅舍主管人惯于同他的被试验者用一种十分亲密的语调交谈,对任何人都以“你”相称。他对我(阿里)说:“首先得看看你是否派得上用场。”

我(阿里)被送去作规定的检查。我被取若干次血样,化验尿,然后还作心电图,测量我的身高和体重。最后验收由一名医生进行。刚开始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把他当作是同胞了。幸好他不是土耳其人,而是流亡的保加利亚人。但他很熟悉“我的祖国”,和我聊了一会儿土耳其。

他说,过去土耳其被试验者人数更多,近来有不少人已返回土耳其。他说,这儿对我的土耳其同胞的印象很好,他们“经得起重击”,不会“因为任何疼痛而怨天尤人”。——他还照一照我(阿里)的眼睛,发现我戴着隐形眼镜,但幸而没有发现眼镜是染成深色的。我解释说,我这付眼镜是为从事专门电焊

\* 1985年8月26日德国电视二台S·马蒂斯和B·埃伯纳的星期一报道《不令人生疑的副作用》中的话。——原注

工作配戴的，干这种活戴普通眼镜很不方便。

阿里被认为合格，这就是说，他能够派上用场，可以作为健康的人试用有可能使人得病的种种药品（药片或针剂）。

阿里必须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同意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他拿到一份有关这一次将要试验的药物的五页长的德文说明书：“关于四种以苯巴比妥和苯妥英钠为主要成分的不同复合制剂比较生物可行性研究的说明（供被试验者参考）”。

这些药品的名字他还从未听说过，“旅舍主管人”也说得结结巴巴：“苯巴比妥”和“苯妥英钠”。“过一会儿你就忘了，”他说。“这些药根本也不是治疗常发病的，按照说明是治疗儿童‘癫痫’和‘高烧痉挛’的。”

几乎所有不附属于工业的科学家都严厉批评使用这一类复合制剂。两种高效物质的强烈结合，会妨碍根据患者不同需要规定剂量，而这样做常常是必要的。复合制剂对于马虎的医生来说是完全求之不得的，他们就可以更少地关心患者了。

“苯巴比妥”此外还属于使人很快就能上瘾的巴比妥酸盐族。因此，近几年来有数百种含有巴比妥酸盐的药品，由于有上瘾的巨大危险而遭禁用。

一次对本应禁止销售的早就有名的复合制剂的药物试验。没有人说明为何还要对它进行试验。

这次试验为期共 11 周，包括住院 4 次，每次 24 小时。总酬金 2000 马克。说明书列举了比较常见的副作用：“疲乏、心情烦躁、运动机能障碍、神经官能和血液性质受损、影响造血、视野变化、皮肤过敏性反应。”“约 20% 的患者齿龈增生”。此外，如果倒霉的话，还有可能“引起发痒的皮疹、呼吸困难、炎热感觉、恶心呕吐”，“极少数”可能“发生窒息和血液循环休克等致命状况，必须立即进行医疗手术”。

但是这一切并非那么严重，因为发生意外时由保险公司付款：“如果由于参加该项研究出乎意料地受到健康上的损害，由LAB或其委托人提供数目不限的免费医治。”不过：“仅仅与参加研究间接有关的损害（如车祸）则不在此例。”这么说来，要是“被试验者”由于“循环系统和运动机能障碍”而遇到交通事故，那又怎么办呢？

在同意声明上签字后，我（阿里）得到一张服用药品和每小时抽一次血的时间表。

有人告诉我（阿里），试验要到明天才开始，但是从现在起我就不能离开现场即房子和房后的院子。“自愿被俘。”人们发给我们：一条带被套的毯子、床单、枕套。——二层楼上是“治疗室”：化验室、抽血室、急诊室。三层是电视室和寝室。

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坐在双层床下铺的那个人没有抬头。坐在桌旁的两个人继续在玩他们的纵横填字游戏。我（阿里）走进朝着院子的第二间寝室。左边是汽车房，汽车房前面，在围墙和垃圾桶之间，放着几个灰色塑料花园桌椅。右边是一个仓库和农产品批发部。后面是铁路货运站。一个荒凉的地带。

所有充当被试验者的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根本没有什么风险。“对他们来说，风险比对我们要大得多，”一个人说。“如果发生意外，就会引起轰动。而这是他们担当不起的。”有几个已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有些“职业被试验者”，其中有许多外国人，到一家又一家研究机构去，有时同时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双重试验。在这一行，人们称之为“药物卖身”。专门有人去招募和强拉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各种身陷困境的人去从事试验而得到酬金。

到了吃晚饭时候，所有的人都坐在一长排桌子旁。有四名妇女坐在一起。她们住进来进行一次怀孕试验。如果她们在



往往长达数月的药品系列试验期间仍然怀孕，孩子有可能落下严重的终身残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LAB答应提供“医疗和精神上的帮助”，不管叫什么名堂。每人从小窗口领到一个盘子，有面包、黄油、几片干酪、一个西红柿、一条黄瓜、一个青椒。电视正在播放影片《美女与克莱德》。窗帘都拉上了，以防电视机被夕阳照射。天线已经坏了。一个人得扶住天线，画面才依稀可辨。空气中有灰烬和未点燃的烟味。几乎没有人能入睡，而电视节目已经结束。我们默默无言地坐在院子里抽烟，用纸杯喝白水，这是我们唯一准许的享受，一直到午夜以后。

躺在床上的人，眼望着天花板出神，或者试图睡觉。有人听着半导体收音机——开足音量的“午夜后的音乐”——就睡着了。没有人关灯。从2点半起，“音乐一直放到清早”。这时我把收音机关上并闭掉刺眼的日光灯。从货运站方向一刻也不停地传来车辆彼此碰撞的隆隆声。在打开着的窗户下，空塑料杯在院子里被风刮得满地滚。有人在被子里手淫，没完没了，老是得不到满足。

6点钟门开了：“起床！”我们一声不吭地起床，互不问候。每个人都心事重重。我的尿瓶号码是4号。这就是说：6点04分臂上插上针头，7点04分服药，8点04分抽血，等等。

开始几次我们还站成一队。后来我们已认得站在我们前面和后面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我后面的人刚被释放出狱，哪儿也找不到工作。这里没有人会问他。把针头插进我们肘窝的两个年轻人在谈论他们下一次的考试。他们是尚未毕业的医学院学生。这两人监视人们服药。我必须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吞下两个胶囊。起先我发现自己的视野有所缩小。我试图向院子里望去，可是阳光很耀眼，使我眼睛痛。我

躺在床上打瞌睡。每小时我去抽血时就象一个梦游者。所有人都脸色苍白、面容憔悴，越来越多的人缺席，必须到床上去把他们叫来。一名妇女诉说身上热得难受、头晕、血液循环障碍。她的手臂冰凉、干燥、麻木。

第二天，我的情况很糟。这次试验本来就是荒唐的，因为副作用都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正在感受它们：昏眩，强烈头痛，心神不定，神志迷糊，还有经常睡不着觉。牙龈也严重出血。抽了七次血，时刻准备好听从召唤。其他人也都很难受。

但直到有人谈出这一点时才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头疼。他们显然都闭口不谈，这是由于害怕会不让他们再去参加其他试验。一个失业已有三年的被试验者(39岁)告诉我：“我已经忍受过比这厉害得多的试验。在急诊病房，接上橡皮管。我们那组的多数人都垮了，好些人不得不马上抬上床去。”他谈到慕尼黑有一家研究机构在夜间做特别危险的试验，“超出疼痛的极限。他们老是在找人。”——另一人谈到在慕尼黑附近一个“精神地牢”，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进行长达四周之久的试验。一个18岁的小伙子说，在慕尼黑的一家心脏中心可以参加危险的实验，“为了挣大钱让自己的心脏受摆弄”。

我(阿里)决定在“第一轮”即24小时之后中断试验。通常我(阿里)在今后11个星期中还应当再住院三次。人家告诉我，根据经验副作用只会更糟而不会更好。此外，在这整整11周中，每天——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上午——7点钟都要去抽血并把这11周的全部尿水都收藏在塑料容器里。谁要是提前退出试验，就拿不到一芬尼酬金。

法兰克福的诺贝特·里特布洛克教授认为，“约2/3的这种生物可行性研究是不必要的”。“这些都是为商业目的服务的得不偿失的研究。”\* 在用人进行试验的过程中已经发生过

死亡事件。例如，两年前有一名叫尼尔·拉什的30岁爱尔兰职业试验人在一次系列试验中突然死去。他为汉诺威钾盐化学公司试验一种治疗心律紊乱的药。在前一天，拉什已在另一研究机构作了一种名叫Depoxil的精神病药物的试验。尸体解剖结果表明，两种药物的结合是暴卒的原因。（最起码的要求是迫使制药工业签发被试验者证书，以防止这种“双重试验”。）

LAB的一个被试验者还给了我（阿里）一个地址：弗赖堡生物设计所。“他们老需要人并且给钱不少。尤其是伙食比这儿的恶劣伙食好。”我（阿里）马上动身前去。与有点破旧的LAB相反，生物设计所是一个光洁明亮、前程远大的研究机构，其建筑堪与一个空间站相比。如同阿德勒一样，接待处的女士提出了每当有新人前来求职时所提的同样问题，以防万一，只是话说得更老练一些：“是谁介绍您来的？”——我（阿里）说了LAB那个伙伴的名字。

他们立刻向阿里提出一项待遇优厚的工作：15天支付酬金2500马克，不过要“完全住院”。我问：“是否要纳税？”回答是：“不，这儿不申报。这是保健事业。”看来他们正迫切需要勇敢的被试验者来进行这项试验，因为他们试图以一笔预支来引诱他。“你如果决定参加，我们也可破例，考虑预支。”还有：“这儿的伙食也不错，免费供应。”——“干吗给那么多钱？干什么？”——一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向我（阿里）作了解释，并且据他所观察到的情况，她露出一种会心的微笑。

“这是一种醛甾酮对抗剂，其成份名叫墨斯佩里农（Mesperinon）。它能把体内病态积水从肾内排泄出去。这种矿物质肾上腺皮质激素对内分泌有影响。已在市面上流通的属于

\* 1985年8月26日德国电视二台S·马蒂斯和B·埃伯纳的周一报道《不令人生疑的副作用》中的话。——原注

安体舒通类药物。现已查明，这种物质如长期服用会引起所谓女性化，也就是男子会形成女性乳房。不过，在这一次为期两周的试验中不会立即发生这种情况。”

我(阿里)：“肯定吗？”

女工作人员：“预计不会。这正是试验的目的。要说肯定，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阿里)：“如果发生，也会重新消失吗？”

女工作人员(安慰地)：“是的，当然啦，这也会重新消失的。”

这儿她显然说得不对。“男子乳房增殖”——医学术语对男子形成女性乳房如此称呼——必须经手术切除。至少这是科学家们的一致看法。

在另一点上她也没有讲真话。阿里问：“性机能呢？能保持吗？”回答是：“毫无问题。”——实际上在人体使用墨斯佩里农可说还没有任何经验。在有关试验的说明书中明确强调有可能产生副作用如“头痛、眩晕、心悸、胃痛、皮肤变样”，如果剂量大，还会造成“男子乳房增殖或阳萎”。生物设计所企图无论如何都抓住它的被试验人不放。该所在合同中威胁说：“如立即解约，生物设计所股份有限公司可向被试验者索取由于在他身上进行试验而产生的部分费用……”这种堵口合同显然是不道德的，而生物设计所却不管这一套。这样一来，被试验人就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不管受到什么痛苦和伴发症状都得坚持下去。在一家美容公司的漂亮照牌后面藏着一个冷若冰霜的现代马布塞博士<sup>①</sup>，他受大制药康采恩的委托，把处

<sup>①</sup> 马布塞博士是奥地利电影导演弗·朗格(1890—1976)执导的影片《马布塞博士》(1922)中的主要人物，他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去从事罪恶勾当。——译注

于困境的人送去研究化学工业的销售战略。

幸而我并不依仗这诱人的高额酬金，可以对此敬谢不敏。其他许多人就不能这样做。象LAB和生物设计所这样的公司从经济危机中捞到好处，因为它把越来越多的人驱向它们。

负责人以有科学家和甚至教士参加的所谓“伦理委员会”为自己开脱。伦理委员会是自愿的监督机构，它们的判决只是在美国和日本依照法律必须遵守，但在联邦德国却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伦理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概念。这些委员会可以被公司首脑随时任意撤换或一脚踢开。即使它们象在其他国家一样是官方机构，“伦理”委员会至多只能对医学问题作出判断，可是人的伦理学至少要求深入探讨那些绝望的人，他们被挤到社会的边缘，只是因此才甘心充当分期自杀的候补人。

我建议：

应当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制药工业的最高收入者有义务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其好处是十分明显的：这些人大多数比许多有气无力的职业被试验者要强健得多，而且由于其收入也能作时间长得多的休假和休养。这样，试验的次数就可以大大减少，限制在明智的最低数目范围内。

这一建议并非是想入非非。六年前，药物研究人员还首先在自己身上试验新的药物的效用。

据说很少发生的副作用究竟是否经常发生，对此我有了切身体会。从药物实验室回来后，我的下颌齿龈开始红肿化脓。牙医诊断为“齿龈增生”，而且马上就猜到：“您是否服用含有苯妥英钠的药品？”当我作了肯定的答复（苯妥英钠是乌尔姆 LAB 药物试验的主要成分之一）时，牙科医生马上就从我臆想的病的副作用推论：“您是癫痫病患者吧？”

## 晋 升

我觉得自己身体十分虚弱，因此不敢相信自己再能继续去蒂森干活了，虽然阿里认得许多伙伴，他们即使有病或发生工伤事故仍须继续为阿德勒卖命。有的尽管得了流感和发烧，仍然坚持干16小时，因为他们害怕别人会来顶替自己的位置。或者象梅赫梅特，在干活时有一块铁块落在他的脚面上，由于他没有穿带钢罩的劳动鞋，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使得他不得不把鞋子从边上剪开，然后再用铁丝缠绕才不至于脱落。他咬紧牙关，忍住极大的疼痛，一拐一拐地去上工，一句怨言也没有。

我可以豁出去，化不利为有利。我听说阿德勒同他的勤杂工兼司机产生麻烦，便尝试耍花招去搞到司机的差事。我通知阿德勒说要跟他谈谈要钱的事。他一如既往十分恼火，问我为什么好多天不来上工，当我(阿里)表示歉意并说我(阿里)千真万确已恢复健康，今后决不再这样时，他表现得宽宏大量，让我(阿里)第二天再去。“可是要准时，正14点。”——故技重演，第二天没有到场的人是阿德勒。三小时后，约莫17点左右，我(阿里)总算在他家里找到了他。——他马上躲躲闪闪：“现在不行。你得早点来。现在我正坐在浴缸里。”——据我所见，他并未坐在浴缸里，身上的衣服全都穿得好好的。

我(阿里)：“还可以再等一会儿，坐在阶梯上等。我在门口已等了三个钟头了。”

阿德勒(恼火):“不成。这不行。明天再来。”

我(阿里):“现在我也不想要钱,只是问一下……”

阿德勒:“这也不行。明天打电话。”

我(阿里):“请,只要五分钟。我乘车来就用了—一个多钟头。”

阿德勒:“你明天打电话。我们可以在电话里谈。我不能改变。”

我(阿里):“我有件好事,因为我得帮您一把。”

阿德勒(好奇、吃惊):“什么事?”

我(阿里):“得帮帮您,不然您会出事的。”

阿德勒:“我?为什么?是谁?”

我(阿里):“等您洗完澡再来吧。”

阿德勒:“不,等一等,请进来吧。”

阿里犹豫不决地跟随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有一个阿德勒仍欠人钱不给的工人打算教训他一顿,可是阿里没有让这样做。

接着阿里扮演了一个有点傻呵呵的过分热心者的角色,他准备为自己的主人作出牺牲,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学过空手道<sup>①</sup>,土耳其拳术,名叫西苏。”这当然完全是胡扯,我不会空手道,而“西苏”是芬兰语,德文的意思是“耐力、耐性、毅力”。可他不知道。“要是有人难为您,我会帮您忙的。我只要一拳就可以叫他完蛋。”——为了强调我的狂热决心,阿里使劲用拳头捶阿德勒的写字桌。阿德勒半是感动半是恼怒地打量着阿里。“谁想难为我?”他反问道,“你想要保卫我,这很好嘛,也应当这样嘛。不过,是哪个脏鬼想难为我?”——

---

<sup>①</sup> 一种徒手自卫拳术,源自日本冲绳岛。——译注

“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阿里说，“不过我对他说，谁要杀死阿德勒，就得先杀死阿里，我是阿德勒的人。”——他没有发觉，阿里兴奋之余，完全不同往常，会正确使用德语第二格。

阿德勒上钩了。约莫有五分钟之久，他向阿里念现在和过去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劳工的名字，显然他还欠这些人的钱，在他眼里这些人现在都是潜在的杀人犯。——念到有几个名字时，阿里就仔细听起来，并要求再念一遍，但是每次又都断然地摇摇头，报复者的名字不在其中。为了不使一个同伴真的蒙受嫌疑，阿里捏造出一个假复仇者，一个“阿拉伯人，他是一个土耳其摔跤协会的会员”，有一双大手——阿里在空中比画——，最近一次他把一个“欺负和欺骗”他的德国人“一巴掌就打掉半个脸”。——“鼻子打坏了，一个眼睛闭上了，整个脸都歪了。”——阿德勒忧心忡忡地望着。阿里接着谈起自己其他的长处：他不“仅会空手道，而且也当过多年出租汽车司机”，从前“还当过另一个开大工厂的大亨的司机”。——“是什么工厂？”阿德勒变得在行起来。“是生产那种讲话机器的，”阿里解释道。“你指的是对讲机吧，”阿德勒推断正确，阿里自豪地予以证实。万不得已时，他甚至能从那里搞到证明，因为公司经理是我（瓦尔拉夫）的好朋友。“我衣柜里还有一套制服呢，”阿里继续吹嘘，“漂亮的帽子，好料子。”

“是啊，有意思，”阿德勒说，“你开车技术好吗？”——“好，没问题，”阿里说，“阿里开车时老板可以放心睡觉，车子坏了阿里也会修。”——全是谎言，不过我（阿里）可以放心的是，阿德勒的280SE奔驰车还相当新，装有特殊设备和一切可能的附件，还不至于需要修理。“这事好商量，”阿德勒说，“我总是要用车，你别让那些讨厌的家伙靠近我。你只要把名字告诉我。我同外事警察有直接联系。不等他们明白过来，他们就



滚蛋了。”——“让我来干，”我(阿里)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您用不着再害怕，只要他们知道我是阿德勒的代理人，阿里一拳他们就死了，一拳就完命。您不用警察，我干更好。”——“好吧，”阿德勒说，“星期一10点半来，我们试试看。”

阿里就这样得到了“晋升”，从吞食灰尘的重体力劳动者成为司机兼保镖。看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是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发迹机会的。对最后一名外籍劳工也是如此。

阿德勒按照他一贯的手法，又企图马上用一次新的欺骗来开始这次创造就业机会的新行动。“你还有病，”他说。“听着，我们立即把你向医疗保险管理处申报，你去找大夫开病假条，这样我就不必付你钱了，医疗保险机关就得付给你钱，你就给我开车。”

以后几个星期给阿德勒开车，可真是需要作出极大的自我牺牲。对每一个转向动作他都进行挑剔。“请认真开。”——“现在最后停止这种危险的驾驶。”——“我对你说过多少遍啦，你在这儿运送的东西是贵重物品。这辆车值好多钱。”——“我希望车子开得稳妥安全。你有责任把车子和我平安无事地送回家去。”——而阿里已经驾驶得异常缓慢小心，比驾驶他自己的破车慢三倍。已经不能称之为开车，而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轻飘飘的晃悠。可是阿德勒却草木皆兵。也许他需要这种没完没了的吹毛求疵，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多么了不起。

阿德勒往往吩咐阿里提前20至50分钟到他家去。这时阿里就会觉得自己被错当作“叫人起床的电话服务台”了。阿里接铃。过了老半天，才听到楼上传来阿德勒的懒洋洋的声音：“等在外面。等10分钟。”

接着就是等啊等啊。遇到下雨天气，没有地方可躲雨。阿德勒也没有想到把汽车钥匙扔下给阿里，好让他坐到奔驰

车里去等候。

八九点钟光景，别墅区开始活跃起来。百叶窗被拉上去，窗户徐徐地打开了。汽车房的大门自动向上升起，家境富裕的主人驾驶着保养得好的大型高级轿车去从事商业活动。一位家庭主妇把一个养着珍禽的漂亮鸟笼放到窗前。屋前的花园保持得十分整洁，草坪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

阿里难得有几次在清早七八点钟就奉召去阿德勒家，然后等上半小时到一小时拉他的主人出门。通常阿德勒的工作日不会在10点或11点以前开始，而且常常到14点、15点、最晚16点就结束。在这中间往往还有一小时午休。阿德勒的一天工作往往只限于去奥伯豪森和丁斯拉肯的几家银行检查进项。奇怪的是，所有的银行都不在他的居住区内。在此期间往往还去访问他的朋友和合伙人雷梅特。几乎总是在他的工人尚未下班的时候，为的是避开“恬不知耻的问题”和“厚颜无耻的工资要求”。他通常还打开他汽车上的警报器，因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在回家路上，他常常还到他在杜伊斯堡的网球馆与修理厂去“看看是否一切正常”，或是去找他的“逃税人”也就是和他很要好的税务顾问。阿德勒正式申报的营业额每年“在50万和100万”马克之间，而实际的业务开支几乎没有。事实上，光是把没有申报的非法工人的开支加在一起，他的营业额就要超过这个数目好多倍。

给他开车是件苦差事。他老是挑毛拣刺，老是认为自己生命有危险。阿里常常有这样一种印象，好象他运送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一具放在薄玻璃容器中的异常脆弱的用羊皮纸做的木乃伊，只要轻轻地刹一下车就有可能把它碰碎。阿德勒经常怒冲冲地纠正他或直接向他吼叫。“别超车！笨蛋，慢慢开！”或者在这种场合爱用的老一套：“请你

认真开车”或“我们要永远认真。我们又不是流氓阿飞。”而这全都是在市内50公里、高速公路上140公里时速的情况下。<sup>①</sup>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他人的交通安全，他对自己如此宝贵的生命具有一种无形的忧虑。他对警察简直怕得要命。每当他从老远看见一名警察甚或一辆巡逻车，他就让我绕远道或拐弯，只是为了尽快避开。

他从不向后看。这也是他的处世格言，因为他留下的是一片“焦土”，他喜欢唱的歌是一首雇佣兵之歌：“一百个人一个命令。一条无人愿走的路。一天复一天，谁知何处去。一片焦土，有何意义？”

有一次，我(阿里)差一点被识破。他看到我向站在马路对过没有注意我们出发的摄影师打手势。“你刚才向谁招手？”他满腹狐疑地问。“不是招手，”我转移他的注意力，“只是一种空手道练功快速反应。坐久了就得练快速反应，让胳膊、腿和手都活动活动。”为了使他明白这个道理，我(阿里)一边开车一边手舞足蹈起来。开始时他还若有所思地惊异地看着我表演。我(阿里)为了证明勤于练功，还向他说(这也是使他万一识破我的伪装时有所顾忌)，我快似闪电的反应在空手道俱乐部特别为人惧怕，有一位一同进行体育活动的伙伴不小心受到我假装的一击，之后“不省人事躺了四天”。另外一次，我曾说我能一掌把“两块旧砖头，不是新的”砖头劈断，这已使他对(阿里)肃然起敬。“阿里一击就可以致人死地，”我朝着他做了一个劈掌动作。但是为了不使他进一步惶恐不安，我(阿里)又说：“不过我已签字保证只是在我们遭到严重攻击时才还手，决不能先动手。”要是他知道我原则上反对打人和动

<sup>①</sup> 联邦德国高速公路无时速限制。不少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速度为每小时160公里至180公里。——译注

用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本领最多是跑开，真不知会怎样！

“请你别在我的汽车里乱扭乱动，你把我的座位全都弄坏了。等你到车外面时再去练你的，”他突然毫无道理地大叫起来，因为车座十分结实，我的那些无关紧要的动作绝对不会损伤其半根毫毛。——为了使他能进一步确信我认真练习空手道，从而最终地打消他开始时的怀疑，当我在埃森鲁尔煤矿热工技术所门外等他时间较长的时候，我就在他的汽车前面练起太极拳和拳击来。在马路对面的一幢大楼里，“疾病保险组织医生联合会”的女秘书们向窗边蜂拥而来，向高级轿车前面欢蹦乱跳的保镖示意，有的还给他喝采加油。阿里挥手还礼，使得“疾病保险组织医生联合会”至少停止工作一刻钟。——当阿德勒回来，看到阿里跳跳蹦蹦，窗口挤满了人时，他火了：“马上停止，你这笨蛋，你还会使我受到别人议论的。到你狄塞尔街的猴圈或你的土耳其人协会里去练这个。”——阿里说：“全都明白。可您说，在外面可以练。”他为他的老板打开车门，又毕恭毕敬地坐到方向盘前。

有几次阿里听到他的老板通过汽车上的电话如何把“叫人讨厌的”和“不听话的”人解雇。这时他绝不象人们所猜想的那样话里带着生气恼怒的语气，而是一种欣喜若狂的语气。“哈罗，亲爱的，听着，”他在汽车电话里用柔和的声音说，“现在我又甩掉了一只臭苍蝇。我刚去过鲁尔煤业公司，明天解雇 T，是啊，棒不棒？”——或者他通过汽车电话邀请工业界和政界朋友——其中有一位联邦议院议员——乘坐他的游艇去荷兰度周末时，向他的一位实业界朋友说：“又少了一个包袱。今天我解雇了一个！没什么可说的，卷铺盖走路！这家伙叫我生气。”——另一次他在汽车电话中高谈阔论：“有时必须来硬的。人人都会受到触动。软弱是最糟糕的，那就全完！”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人。日益增长的失业率，一再把愿意接受几乎任何条件从事任何工作的新的绝望者驱入他的怀抱。他的剥削对象有的他根本不认识，至多知道名字，他只知捞钱。有一次在汽车上打电话：“鲁尔煤热公司来找我，他们安装了一套新设备，说：听着，我们不许可雇人，绝对停止雇人，可我们需要电工。于是他们去到科隆那边，跟劳动局耍了花招，就雇佣了电工，实际上只记在我的帐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些人，仅仅是每月来钱。（笑）必须善于开动脑筋，办法总是有的，只要愿意。”

另一次：“我最喜欢大厂家。施蒂格电力公司我到处插手。我们在所有的发电厂都干过。蒂森、鲁尔煤热公司、鲁尔化工、荷兰通用电气公司，全都是世界著名的大厂家。通常没有一个部门、没有一个工商业管理机关敢冒犯它们。我们可以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人可以一直干到趴下为止。对他们来说，要紧的是我们迅速秘密地完成任任务。他们宁可干活的人更少一些，因为更不引人注目。而我只需要一半人员，照样可以挣那么多钱。”——

有时他十分羡慕地承认，一些竞争对手在冷酷无情和诡计多端方面比起他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谈到有些人为大康采恩“排除”有毒淤泥“要双倍的钱”。“F 接到鲁尔煤热公司的一票生意，清除埃姆舍尔河淤泥。挣的钱可老鼻子了。而且在废料上又赚了一大笔钱。用磨煤机把废料磨成煤粉再卖掉。只是有个问题，煤粉无法储存在贮仓中，因为会产生瓦斯和蒸汽，这会自自动爆炸。这里奥伯豪森的炉渣堆也是如此。市政府把它送给一个荷兰人了。从炉渣堆，从高速公路旁那一堆当中，每运走一立方米都付给荷兰人钱。这家伙拿去干什么用？他把它磨碎，然后再以大价钱卖给网球场。眼下网

球可时兴哩。那里面有酸和种种毒素。要是有人在网球场上摔一跤，就会产生严重的创伤。人们得学会这种本领：化屎为钱，而且是很多的钱。嘿，嘿，有人把手指插进大粪，拔出来时手指上却是黄金！”

尽管阿德勒完全是靠垃圾、灰尘、脏物，或借用他的语言，是依靠大粪发家的，他自己却非常讲究干净整洁。他害怕接触这个世界上的脏东西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的奴隶工人对他来说是不洁净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使他感到恶心，他想要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如果说，他们一再地为了工资要求而到他家去找他，那末，他每一次的愤慨就不仅仅基于财政上减少的威胁，而且同样使他感到惊骇的是直接面对和接近汗水、污秽和贫困，即使每一个请愿者总是穿得干净整齐地去见他。唯一的例外总是我（阿里）。我通常完全故意穿着我肮脏的沾满油污淤泥的劳动服，脸上由于煤烟和尘土而变黑，出现在他的清洁的别墅区，作为因劳动而弄脏的衣衫褴褛的苦力活生生地站在他的垫子上，使他惊恐失色。

如今阿里的衣着已和他的奔驰车相适应。笔挺的裤子、新洗过的白衬衣或灰衬衣、领带，不是笨重的湿淋淋的劳动鞋，而是擦得锃亮的低帮皮鞋。尽管如此，阿里在阿德勒眼里仍然属于来自无产阶级下层社会的下等人。单是他的地址狄塞尔街就象是个污点。在他看来，住在那里的都是等而下之的下等人，而且又是直接在最脏的地方干活的。

当我（阿里）——他的司机——又一次在清晨7点半钟在他屋前等了他半个多小时以后，我迫切需要解手，便按门铃，问阿德勒是否可以用一下他的厕所。

阿德勒：“大便还是小便？”

我（阿里）：“都有。”

阿德勒(嫌恶地):“那就在外面解手。”

我(阿里):“外面什么地方?”

阿德勒:“拐弯角上,随便什么地方,去吧。”

我(阿里):“拐弯角什么地方?”

阿德勒:“嗨,管他什么地方。”

他就象对待一条狗那样把阿里打发到街上去。到他的门前花园里去拉屎也不可能,四面八方都一目了然。我真想拉一泡屎到他的奔驰车车盖上,就拉在那颗星上。十分钟后阿德勒下楼来时,我(阿里)问他:“您的厕所坏了吗?”

阿德勒:“没有,厕所没有坏。我们不太乐意这样做。是啊,因为陌生人等等,实话对你说吧,我们怕传染病。原则上我们都不让生人使用。流行的病那么多,不知在什么地方会传染上,等等。明白吗?在这个方面,传染的危险是相当大的。”

我(阿里):“要是您有客人,他们都得到外面去解手吗?”

阿德勒(窘迫,犹豫):“我已说过我不招待客人,我的安装工人等等都不用我的厕所,这他们也都知道。没有人会问。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

我(阿里):“您也怕爱奇病吧?”

阿德勒:“你指的是艾滋病吧?人人都怕,可不是,不过我……预先防备,比方说吧,我到一个人地方去,就从不上陌生的厕所等等。我不去。”

我(阿里):“嗯。”

阿德勒:“我不干。我总是憋住回家来解手。不上陌生的厕所。”

我(阿里):“嗯。”

阿德勒:“我出门时既不上公共厕所,也不去别处。”

阿德勒继续沉思：“我也几乎不跟别人握手什么的。要是我不得不和别人握手的话，握完后马上就去洗手。”

我(阿里)：“要是所有人都象您这样想，那就不都平安无事了？”

阿德勒：“就不会再发生疾病，当然罗。可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有的人真是猪猡，在这一点上。一想到这就会令人恶心。”

真该带领阿德勒到雷梅特的厕所去参观一下现场。那里供工人使用的厕所只有两个。脏得要命。公司不提供手纸，而且几乎从不打扫。有一个厕所没有门。由于上厕所的人总是很多，人们也就将就了。有个德国人用墨水笔在这个厕所里写道：“只供外籍劳工使用。”

有时在高速公路上，在奥伯豪森和埃森之间或朝着韦瑟尔方向从田野旁边掠过，没有电话要打的时候，阿德勒也会高谈阔论起来。这时他就怀着万事大吉、天下太平的心情，把从早到晚都收听的心爱电台——“卢森堡广播电台”——和每小时一次的简明新闻的声音开小一点。虽然他对自己的土耳其司机通常也没有很多话说，不肯推心置腹地交谈，但每隔五六天也会出现一次这种情况：正在大展宏图的企业家阿德勒突然兴致勃勃，对国家大事大发议论，并热心地一句接一句向他的司机讲解。

电台正在播送雄壮的歌曲“早安，德国，我爱你……”阿里问他：“阿德勒先生，您当老板和企业家有多久啦？”阿德勒说：“五年。”在这以前在曼恩好望钢铁厂当总采购员。“可是这五年学到的东西，是我前半辈子从未有过的。对付那些无赖也是如此。”

阿里：“可从来也没有挣过这么多钱吧？什么是无赖？”



阿德勒：“不错，也包括挣钱在内。不过在我们德国有很多骗子，他们很懒，不愿干活，老想掏别人的腰包。他们只想行骗。而自己的人，自己的工人，早就不能和从前的勤劳能干的德国工人相比。希特勒确实是个独裁者，不过在这一点……”

阿里：“他杀过人！”

阿德勒：“不错，也毫无必要地发动过战争。”

阿里：“因为他打输了？”

阿德勒：“是的，因为他急于求成，老想扩张。尤其是他对犹太人干的事，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犹太人嘛，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受人尊敬……今天人们很快就忘记，他给了每个人面包和工作。他上台以后就没有人失业了……要是现在失业人数再增加一二百万，就又会这样出现这样一个希特勒。这你可以放心。那这儿就会热闹了，政治动乱等等！”

阿里：“是的，那就会轮到我們，我们就成了犹太人了。”

阿德勒（笑）：“别害怕，我们不会马上用毒气杀死你们的。我不信。我们需要你们干活。至于犹太人嘛，那已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你要知道，犹太人嘛，他们总是只会做生意，也就是让别人替他们干。别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廉价收进，高价卖出。这就是犹太人的作风。犹太人天生是懒汉，不想干活，总是靠其他民族发财致富，因此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受人尊敬，在德国、美国、俄国、波兰都是如此。而土耳其人情况不同。你自己最清楚，你们会干活。因此，这一点你可以忘掉它。到那时就会制订法律，让他们在一年之内必须统统离开德国，要是比方说失业人数再增加 100 万的话。”

阿里：“您认为还会增加？”

阿德勒：“是的，凡是懂行的人都这样说。政治家和工业界首脑人物。只是不能这么明确地对普通老百姓说而已。比方说吧，计算机和机器人越来越多。如果我能用机器来代替我的人——每台机器要10万马克——，只要能少用三个人，我也会干的。机器不会叫我生气。”

阿里：“嗯。”

阿德勒：“明白吗？机器更可靠，干活更顺利。就因为如此，到处都有这种趋势，看看那些大厂家吧，全都自动化了。而且越来越多，例如安装钢结构和管道等活计，别的国家如尼日利亚或民主德国的费用比我们低得多，因为我们这里的工资费用太高了。我们已经没有竞争能力了。他们老是说我们得减少失业人数，人人都这样说，只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下已不可能做到，相反，还会越来越多。离开学校的年轻人，他们要求工作，可是没有工作。全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什么提前退休啦，全都没有什么用处。这就象在古埃及。从前他们说：七个丰年之后会有七个荒年。我们的情况是，我们已经有了40个丰年，现在我们必须准备好迎接荒年，一直到也许会发生新的战争冲突什么的，使得一切又必须重新开始建设。”

阿里：“您认为又会发生战争？”

阿德勒：“是的，如果失业人数再增加，在德国至少会发生内战。这一点要考虑到。如果失业人数再增加100万，他们就会上街闹事，暴动。那时就会天下大乱，我们这个法治国也就完了。”

这时汽车收音机里播出一条消息：“与德国人结婚的外国人离婚后其居留证将提前缩短限期或予以吊销……”

阿德勒：“我们早就这样做了！”

收音机：“……驳回了一名在联邦德国侨居已五年的土耳其人的起诉。他的德籍妻子提出离婚并且已获得一个共同的孩子抚养权。此后卡塞尔市提前将此人的居留证限期缩短至今年8月底。”

阿德勒：“你看，现在到处都这样做了！”

阿里：“可您如何看呢？现在两人结婚了，妻子也许有了别的男人，快滚，打发走，不能再见到自己的孩子！”

阿德勒（无动于衷）：“必须回去，当然罗。听我说，德国政策反正是犯了一个错误。在经济奇迹时期，我们把闸门开得太大了，凡是愿意来的土耳其人都可以来，凡是愿意来的意大利人都可以来……这是德国政策的重大失误，这是不该做的。”

阿里：“可我们并非自行前来的，是别人把我们请来的，当时没有计算机，需要人。”

阿德勒：“是的，可此事有利也有弊。今天人们后悔了。可这也跟那有关：土耳其人来了，全部粗活都由外国人去干，德国人再也不干了，他们不屑一顾。这种精神状态今天仍然存在。德国人不愿再干活了，制造的麻烦要多得多。

把这么多外国人放进来，是个基本失策。不过我也确信，如果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走掉——我们现在有230万失业者——，那么失业人数只会减少一点儿。这和土耳其人也没有关系。

假定所有的土耳其人现在都离去，我们的失业人数只会减少一点儿，我们也许会有220万，这又有什么用？”

我们的谈话被收音机的另一条消息打断：“……他被控同谋。维巴、克吕克纳、克虏伯、曼纳斯曼和其他11家……他在这些捐助中进行合谋……”

阿里：“这个……经济部长<sup>①</sup>会坐牢吗？”

阿德勒：“不会，完全不可能，否则我国政府中有一半人都得坐牢了。根本不会。”

阿里：“钱赚了好几十亿，还想要更多。”

阿德勒：“是啊，当然罗，你不也总是想向我要钱么。这是人的本性，对吗？”

---

<sup>①</sup> 指联邦德国前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后因被控与大企业资助政党一案有牵连而下台。——译注

## 职工大会

在离雷梅特公司集合地点步行需 10 分钟的斯卡格拉克街“运动员之家”酒馆的一间小餐厅里，阿德勒召集他的“手下人”开会。他称之为“职工大会”。

我开车送他去。途中他用汽车电话同一名心腹知己交谈。他说，他要使“前线平静无事”，“事情有板有眼”，宁可让一支基本队伍合法干上一段时间，而不要在以后“拆烂污”。

他的训话定于 16 点开始。人人必须出席，这是命令，所占用的是无偿的业余时间。

我(阿里)为他提公文箱。“现在你不要离开我身边，”他对我说。“要是有人威胁我，你就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没问题，”我安慰他说，内心感到很不舒服，如今不得不以暴发户和阿德勒的打手身份出现在我从前的伙伴和朋友的面前。倘若果真有人克制不住自己感情而揍他，我当然清楚自己应该帮助谁，即使我扮演的角色因而提前结束的话。自我克制总是会有个头的。

工人们已经在一张大桌子周围坐下。其中有一些新的面孔。阿德勒坐在长桌的一头并示意我挤到桌子犄角前面紧挨着他。我向几个伙伴挤挤眼睛。我怀疑他们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安静！”阿德勒终止了大家的谈话，接着又说了一句使大多数人莫名其妙的话：“我们这里又不是犹太教堂。”① 全场立

① 在基督徒心目中，犹太教堂意味着乱哄哄的地方。——译注

即鸦雀无声，人们全都急切地望着阿德勒，看他要对他们讲什么。

他的称呼听起来完全不同往常：“亲爱的同事们……”凯马尔用脚在桌子下插了我一下，忍不住笑起来。

“我请诸位来，因为我们的队伍需要整顿。有人说我们这儿在干黑活，甚至电台还点了雷梅特这个名字。这种事当然会对业务有很大影响，我警告各位不要这样说。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打算同基本职工签订固定劳动合同。我们想使用联邦政府令人感激地提供给我们的手段，首先同靠得住的人签订定期劳动合同，目的也是对人员进行测试，看看谁好谁差。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嘛。假如我们是一个理智的集体，有些事情还可以商量。在蒂森那儿，有些公司早就不象我们现在这样合法地搞了。”

他宣布目前从蒂森那里“肯定每月有 3000 小时”可干，外加特殊任务，因此他希望“年年如此！——假定经济情况象目前这样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他们（蒂森）不会很快地说：好吧，现在到此结束。”

他叫阿里把女服务员找来，象煞有介事地宣布：“好吧，现在给每个人上一杯饮料，汽水、可乐或啤酒，我请客。”然后，他向那些满腹狐疑以至忐忑不安地坐在那里的“亲爱的同事们”说明：“大家听着！现在我向你们宣布工资等级。”他把由他任意确定而不足以糊口的工资说成是“法定工资”，好象这是经过同工会谈判达成的冠冕堂皇的东西。“工资等级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得一清二楚，从 18 岁至 21 岁为 8.5 马克。21 岁以上的单身汉为 9 马克。已婚者为 10 马克。”（在我们中间，已婚者人数最少。）“我所以拉开一点档次，”他为自己辩护说，“因为已婚者的开销更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这样

分等也可以说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这时阿德勒神情严峻地注视着大家。“谁要是不同意，请他站起来走出去！”

没有一个人动一动。没有一个人敢说出自己的意见。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不仅关系到自己的饭碗，还关系到能否生存。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后面都有好几十个人在街上等着，这些人会二话不说取他们而代之。

“8.5马克是净挣吗？”内迪姆大胆提问。

阿德勒(简短地)：“我们只付总额工资。”

内迪姆：“那实际上就只剩下五六马克了。”

阿德勒：“现在我记不清单身汉的具体数目了。可能是这样的。不过再说一遍：我们只付总额。我们不仅按劳付酬，而且也根据不同情况付酬。既然只有一个蛋糕分给大家，那就得面面俱到，考虑到大家不同的情况。”

伙伴们说，光是蒂森的“蛋糕”每人每小时就有52马克，据说其中包括尘土、污秽、高温和其他保健补助，加班费就更不在话下了。对于蒂森来说，付给阿德勒的人员这笔人头费仍然比自己的基本工人便宜。工资照付的假期，圣诞节补助，病假工资照付，所有其他的福利待遇以及不得随便解雇等等，全都没有了。这52马克由阿德勒和雷梅特两人分，雷梅特拿27马克，阿德勒拿25马克。假定往好的方面说，他这次完全不同往常，没有把社会福利金塞进自己腰包，平均开销9马克，那他每小时还剩下16马克，每月乘以3000，光是从蒂森一家，阿德勒就收入4.8万马克。

“好吧，现在我们把各位的名字记下！”当他看到他的“亡命徒”脸上沮丧绝望的表情时，便搬出他的一句口头禅来安慰他们：“是啊，我知道这在目前来说并不多，不过我准备，如上所述我们认识的时间还不长，等到半年之后我们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还可以再谈提高工资的问题，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的。”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空头支票。

“好吧，还有一件事，”阿德勒举手要求大家安静，“从今以后不能再缺勤。我们现在作好一切准备，而且也不再雇佣额外人员。今后谁要是还不来，那我们就得和他分道扬镳了，由另一人来顶替他。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我决不心慈手软！”

他以严厉的目光转向 23 岁的穆斯塔法：“这对你也适用。前天你无故缺勤，这是最后一次了。”穆斯塔法为自己辩护，说他送妻子去医院去了，生了一个儿子。阿德勒并未向他祝贺，装作没有听见，再一次说：“这可是最后一次。”尽管迄今从未发过病假补助，我们常常去上工，接着又被打发回家，但他却象使用农奴似地支配我们的时间和生命。他同样怒冲冲地训斥德国人瓦尔特·雷希特：“你那没完没了的缺勤现在也得永远停止。否则……”

瓦尔特(没精打采地)：“阿德勒先生，我们从星期六到星期日干了 20 小时。2 点 3 刻我才回家。3 点半的时候我叫来急救车，把我妻子送进医院，她必须马上进行手术。我也立即通知了弗拉赫曼先生。”阿德勒不予理会，明确地宣布：“要是你们不听，我就再象过去那样办。有人请病假，我就到他家去给他量体温。要是不发烧，那就马上开除！”接着他又作出一种双方休戚与共的神态：“等到我们彼此熟悉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彼此怎么看了，到 12 月我们再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到那时还在一起的话——举行一次小小的圣诞节庆祝活动什么的，也许我们可以搞固定合同，那时候就得这样做。全都明白吧！你们现在是一支队伍，从今以后我不愿再听到吵吵嚷嚷要钱的声音。明天和星期六你们可以加班，可以接着干！”

“好吧，就是这些，”他最后对大家说，“明天早晨准时到。”



洗干净，把脖子洗干净，还有下身，哈哈……”他从背后喊穆斯塔法：“这个穆斯塔法，他自己要的啤酒是否已付过钱？别让我最后还给你们付酒帐。”

“好吧，总算完事了，”他对他未来的内弟、领班和心腹沃尔姆朗说。他让我把他的公文箱送上汽车，并向沃尔姆朗说明：“阿里现在是我的保镖。你尽管去告诉大家。他会空手道，有一把手枪。”（我只向他出示过一把弹簧刀——作者。）“阿里一直坐在我后面，没有离开过我。来了两个人，马上想要钱。我真以为要找我算帐呢。”

沃尔姆朗（感到有点好笑）：“听说你现在打算把所有人都申报？”阿德勒（眨眨眼）：“我们也不用这么认真嘛。要紧的是先安定下来。”阿德勒看到有一对年轻夫妇走进酒馆，突然胆怯地蜷缩到柜台角落里。那个男人怒冲冲地看了阿德勒一眼，他身旁的那个金黄色头发的漂亮女人故意朝另外一个方向看。“注意，现在你也许必须捍卫我，”阿德勒对阿里说，并炫耀地对沃尔姆朗说：“你知道我在这儿可是个有名的刺杀手。”可是他纯属杞人忧天，没有发生争吵。

后来他在酒馆里对一位实业界朋友谈起他的“职工大会”：“我把他们的计时工资压得低低的，使得他们现在十分盼望加班和做双班。为了不让他们老在一起胡说八道，我随后很快又把他们分别打发回家，我说，现在你去这儿，你去那儿。对手下人要多留点心。”

一个新来的德国工人在柜台的另一头坐下。他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有几次举杯向阿德勒祝酒，显然想同他套近乎，但阿德勒看样子觉得讨厌，故意不理睬他。这位名叫瓦尔特的新工人，年纪在25岁左右，身体瘦弱，脸色苍白，喝下约莫10杯啤酒之后向阿德勒走来，以恳切的、过于响亮的声音简直

在向他哀求：“阿德勒先生，请您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我在一家公司学装配钳工，后来我病了，考试前不久我丢了工作，我坦率诚实地讲这一点，当时我还没有结婚，现在我有两个孩子，必须养家糊口。我一直在向我的第二家公司索取我的钱。”他一面模仿他从前的头头一面喊道：“‘你不会干活，’他对我嚷道，‘你只想要我的钱。’我的下一家公司是个造船厂，等到我培训期满就破产了。我总是在关键时刻不走运，不过我有技术。我有全部电焊工证明，我甚至会焊接锌粉，我能够准确地按图纸操作。请您给我一个机会，给我换个需要技术的工作吧。拿六七个马克我是无法养家糊口和付房租的。”

阿德勒显然讨厌在业余时间——而且喝了 15 杯啤酒之后——有人对他唠叨。他把他支走：“明天你先准时来上工。”接着又带着责怪口气：“今天你为什么不来？”

瓦尔特（激动地结结巴巴地）：“刚才我已对您说过，我用急救车送妻子上医院，她动手术了。”

阿德勒（示意结束谈话）：“现在你先按规定准时上班，这事以后再商量。”

瓦尔特：“是的，您可以相信我，我每天 3 点起床，我骑自行车，不会出什么事的，我总是出工的，我每天骑三四十公里。这对我来说是毫无问题的。”他一再重复那一句话，就象一张在原地打转的破唱片一样：“请您给我一次机会！”

阿德勒愈来愈觉得讨厌，边说边转过身去：“凡是始终按时上工干活的人，也都会拿到他的钱，那是错不了的。”说罢向沃尔姆朗转过身去。

后来，瓦尔特在厕所里对我说：“哎，你的头头，他不会见死不救的，他根本不象你第一天对我说的那样。”

我(阿里)今天听任他去想入非非, 沉默不语。接着他又说:“你有没有注意, 他看到我的西服和他的西服一样的时候是怎么瞅的吗?”

在这里, 阿里也不忍心向他的同伴点破。两人穿的虽然都是蓝条花呢西服。阿德勒的是一套价格昂贵的专门定做的西服, 而瓦尔特的是从百货公司买来的廉价大路货。瓦尔特为了利用他最后一次机会, 特地穿上一件白衬衣, 打上领带, 好象参加正式招聘似的。第 18 杯啤酒下肚之后, 他看到阿德勒不愿同他交谈, 便离开酒馆, 晃晃悠悠地骑上 15 公里自行车回家去了。

此时阿德勒已在喝第 20 杯啤酒并和沃尔姆朗剧烈争吵起来。在第 20 杯啤酒之前, 他还能讲出简明扼要的句子, 提出经营管理方针如:“我们现在必须走上正轨。”——“我把我的领导干部当作宝贝。”——“你们想个办法如何把费用压缩到最低程度。”

现在, 阿德勒对沃尔姆朗的攻击越来越激烈, 后者竟敢于反对阿德勒:“你这样对待手下人是不行的。H,” 他指出从前一名德国工人的名字,“去告你是有道理的。我要不是你的亲戚的话, 也早就会这么做了。”接着, 阿德勒(激动地)说:“你是个叛徒。你站在这帮临时工、这帮二流子、这帮瘪三一边。你自己就属于这帮无赖流氓!” 沃尔姆朗沉住气。我(阿里)在工作中对他没有太大好感, 可是在这里他突然表现得有点骨气。不管怎么说, 他让阿德勒感觉到他的蔑视而不退缩。

他冷淡地把身子侧过去, 好几次用“您”称呼阿德勒以保持距离, 并说:“我并不站在他们一边, 但要是有人要求自己的权利……”

阿德勒无法容忍有人竟敢于反抗他:“你在我眼里已死

了，你被解雇了。明天你可以到汉诺威去报到，搞装修。”沃尔姆朗：“我不干。我将继续留在蒂森。您是不能不要我的。我不会让自己被人甩掉。”他大概是在暗示他了解阿德勒的一些非法活动和无耻行径，确实，尽管阿德勒还多次暴跳如雷地宣布解雇他或罚他到汉诺威鲁尔煤热公司工地去干活<sup>①</sup>，沃尔姆朗仍泰然自若，其后也继续在蒂森当他的队长。

快到第25杯啤酒的时候，阿德勒变得感情用事起来，用呆滞的眼神瞪着阿里，神情活象潘第拉地主<sup>②</sup>：“阿里忠于我。他会用生命来捍卫我。”接着摆出慷慨激昂的姿态：“我会再次把他从困境中拉出来，让他离开狄塞尔街那穷地方。我要给他穿上新的衣裳，叫他和我的奔驰车也完全般配。”

一下子变得这么高尚，他自己也深受感动并沉思起来：“只要我知道如何才能判断阿里的智能就好了。”他向我（阿里）投来表示鼓励的目光。我装作好象不明白他的意思。“你知道我说的是些什么吗？你知道什么是智能？”

“知道，”我（阿里）说，“对什么都能明白领会。”

“那你是什么水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水平？”

“是的，”我（阿里）答道，“看他的举止是否象上等人！这要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工作。大多数人所能干的，要比人们让他们去干的多得多。”

沃尔姆朗想争胜（对阿德勒）：“你看他并没有听懂，表达

---

① 阿德勒通过埃森鲁尔煤热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一项在汉诺威冯·弗里奇男爵兵营施工的委托。——原注

② 潘第拉是布莱希特著名喜剧《潘第拉老爷和他的仆人马狄》中的主人公。这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地主形象，喝醉时多愁善感，不计利害，表现出高尚和温厚，清醒时就成了完全另外一个人，胡作非为，贪得无厌，从他的雇农身上榨取最后几滴血汗，对家奴象对牲口那样任意支使。——译注

不清，话说得又是这么慢。”

阿德勒企图挑动我们彼此相争：“这是在他身上进行试验的药物的影响。他并不那么笨，他懂得的比你认为的要多。”

“我并不总是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我（阿里）支持阿德勒，“我常常心里明白嘴里不说。”

有片刻之久，阿德勒用呆板的浅色眼睛审视和打量我，好象是想从阿里的话里寻找更深一层的含义。我（阿里）继续说：“我不知道我是否总是真正听懂了，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不过您可以问我，自己看看！”

阿德勒思索片刻，以便对阿里进行一次自己搞的智力测验：“罗得岛的巨人是谁？”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为了从我这方面对他进行测试，我故意给他一个错误的回答，假装把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太阳神同搆天巨神阿特拉斯混淆：“他必须把整个世界背在身上，”我答道，“被重担压得直不起腰，无法胜任。”

“好。不错。很好，”阿德勒赞扬我，看来他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他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国联邦总理的名字是什么？”阿里回答正确。“前任总理叫什么？”也答对了。至于苏联党总书记的名字，阿里也知道正确的答案，甚至——使阿德勒感到惊异——连法国总统的名字也脱口而出。“真了不起，”阿德勒赞赏地说。他把他的奴隶工人看作是半开化的人、猿人和劣等人，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文化上要比他们高出许多。在柜台旁隔几个座位的地方，一位年约半百的税务官对阿德勒没完没了的提问很反感。“提这些愚蠢的问题干什么！”——阿德勒怒气冲冲地回答：“这里是在谈业务。别指桑骂槐！”

接着继续进行测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是谁？”

我告诉了他。

“对！环境部长呢？”他这一问倒使我感到为难。我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举行的几次共同活动中认识了克劳斯·马蒂森，把他看作是比较进步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也许这问题是个圈套，如果我知道这样一个大左派的名字，他一定会怀疑的。“不知道，”我以防万一地说。阿德勒摆摆手说：“这你也不用知道，你可以把他忘掉。此人是个空想的社会改良家，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他的前任博伊默尔，是我多年的要好的老朋友。他有真正的献身精神和企业家的远大眼光。我上一次过生日，他也参加了。他是可以信赖的！”（知道谁是阿德勒的政治后台是有益的。博伊默尔在担任下莱茵社会民主党主席的那些年代曾以对本党进步干部搞阴谋诡计而著称，例如他曾勾结前联邦总理施密特将卡尔—海因茨·汉森开除出党。）

阿德勒绝非我们这个社会的原野上绝无仅有的一朵光彩夺目的毒蘑菇。他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承认和尊敬。那些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钱是如何挣来的。他们豁达大度，对这些彰明较著的“令人作呕行为”视而不见。从一定的级别起，在这些人士中奉行这一信条：“有钱不谈钱。”不管这钱是从哪儿来的，是剥削谁的，造了什么孽，我几乎敢于肯定博伊默尔先生并没有跟他的朋友阿德勒谈过这些。

人们心照不宣，在俱乐部里，在他的游艇上共同享受生活的美好方面。或者也一起到阿德勒心爱的休假地夏威夷去度假。在鲁尔区，参加社会民主党对升官发财和做生意有好处。我确信，如果住在巴伐利亚州，阿德勒一定会成为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信徒。

在另一场合，阿德勒曾炫耀他光是在最近五年就行贿20万马克，为的是捞到某些承包业务。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用不着这种直接的贿赂的。往往只需要臭味相投就可以确保彼此传递信息和转让承包任务。这也是阿德勒成为特别高级的杜塞尔多夫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的原因。介绍他入俱乐部的是“我的多年好友、杜塞尔多夫副市长阿尔弗雷德·格特纳”。

“你要是经得起考验，我就提升你当领导干部，”阿德勒对阿里说。

当阿里不明白地望着他的时候，他解释说：“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而且还不止于此。”阿里一直还不明白。“你必须把你的土耳其同伴控制在你手心中。你反正跟他们关系不错嘛。你必须对他们进行监视，如果有人背后发牢骚骂我，你就得告诉我，我就叫他及早滚蛋，省得一个烂土豆把别的土豆也传染了。伙计们生来都是好脾气，只是不能放松监视，否则他们一下子就会造反。我只想知道你是否胜任这一任务。”

我感到脑袋发胀。我决不愿意假戏真做到这种地步。慢慢地到了收场的时候。面对我的同伴和朋友，我处于一种非常糟糕的处境。即使挤眼示意也已无济于事。我觉得自己突然象是南非的一个混血儿，迄今一直站在黑人一边，也许还并肩战斗过，现在突然被白人——正因他博得黑人的信任——选中去充当叛徒，充当暗探和奸细，这是阿德勒想要我扮演的角色，同时又充当他的保镖，象是一只受过训练的猴子。

“必要的话，你也得采取强硬手段，因此你也要继续练你的空手道，”他企图进一步引我上钩。“要是你能这样做，我还向你提供一套离我很近的小住宅，将来再送给你一辆汽车。你只要始终在我附近，做到召之即来。狄塞尔街不是你住的地

方，那儿会使你堕落。”他感觉到我的反感，紧追不舍：“我不会马上叫你去对付你的同胞的。目前我跟他们的麻烦事还不如跟一些不安分守己的德国人多。现在真有两个个人竟胆敢去告我，想要我的钱。我派你去教训教训他们。你明白吗？这些浑蛋竟敢诬告我。你去教训他们，叫他们撤回他们的控告。”

他把这两个德国工人的姓名和地址告诉我，这两人离开我们已有一些时候了。我试图向他阐明，我们曾在空手道俱乐部签字保证，只是在正当自卫的情况下才运用我们的功夫。“不错，我正处于完全正当自卫的情况。他们在威胁我，你必须保护我。”

当我（阿里）一直还抱怀疑态度的时候，他让步了：“目前先不去管它。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我有很好的律师，我们先让法庭说话。不过，要是我不能胜诉，我就别无选择了，你就得去教训他们。我完全依法办事。”

阿德勒倘若不能打赢官司就要我去“教训”他们的那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叫于尔根·K（26岁）。过了一些时候我找到了他，叫他预防万一，并了解到他作为德国人并不比我的外籍同事要好过一些。于尔根失业已有一年多，因为腰椎间盘损伤而丢掉了从前的工作，到当地的大厂家——也包括蒂森在内——去找工作而没有成功。他看到广告便去找阿德勒。

“他起先给我的印象其实并不坏，没有再提什么问题，给人漫天许愿。他只问了一句：‘参加工会了吗？没有？好。那就好办啦，’他说，‘看看如何安排工作’，或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取得一致的’，‘没错儿，谁干得好，挣得也多。’

他问我想要多少工资？我过去的工资是13.5马克总额。他说这太高了，这是技工工资！由于我搞的不是本行工作，他不能付给我这些。‘你是否同意净挣9马克？’他问我。我大概



其算了算：净挣9马克也接近于总额13.5马克了。我说：行。  
‘那你从1月24日起开始干！’我一定要证明，为了年金保险等等。可是他说：‘到2月1日没有几天时间，申报你不值得。’于是我在1月份不得不没有纳税卡干了七天，实际上是干黑活。”

一个月后，当他为自己生病的女儿去向疾病保险机关索取医疗证时，才得知在这以后也未将他申报。这时阿德勒才不得已在当天即2月25日把他向疾病保险机关申报。根据规定，企业允许在一个月之内进行补报，因此象阿德勒之流的人贩子可以等出事——事故或患病——后再去“补报”，假装这个工作人员是刚刚或数日前新雇佣的。

“这个阿德勒究竟是一个什么货色，我是逐渐体会到的，”于尔根说。“我并不是最懒的人。拚了命干，结果拿到多少？每小时5.91马克，没有加班费、夜班补助和节假补助。简直荒谬透顶。而且帐目也不对头……”

‘是的，一般你每月15日领钱，’他对我说，‘你去开个户头，我不支付现金。’我到银行去开了户头。到了15日那一天钱没有来，16日钱没有来。我打电话问阿德勒：钱在哪儿？是啊，他说，已经汇走了，该到了。今天或明天钱就到了。我又去，第二天又去一次。那时已到了没有钱给车加油的地步。以前总是我的未婚妻开车送我上工。从来也不给一芬尼车费。不管怎么说：现在怎么去上工？于是我的未婚妻就给他打电话，大约在20日前后：‘阿德勒先生，银行帐户上钱还没有到！’这时他在电话里对她哈哈大笑：‘银行也不可能收到钱！’‘什么？’她说，‘银行不可能收到钱？’‘是的，’他说，‘你丈夫的同事把钱领走了！’‘为什么？’我的未婚妻问。‘我把钱给他了，可你今天找不到他——他今天加班！’

于是我就风风火火地跑到钢铁厂去找那个拿着工资袋的瓦尔特。他是阿德勒未来的内弟，他拿着我的钱在那儿遛弯儿呢！我找到了他，他刚刚换好衣服出来——说他加班全不是事实，他到14点正就下班了。我说，瓦尔特，我的工资袋在你那儿吗？‘是的，’他说并给我一张收条：‘签个字！’‘不，’我说，‘还是先点点数。’里面是2月份的工资610马克。他付了79小时的钱，但每小时总额只有9马克！而且我共计干了126小时！还短40多小时！于是我就不干了，说：‘这样不行！’‘下个月把余数补给你，’他敷衍我说，‘还给你涨工资。’

到了下一个月，仍然是老一套。

他们对我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我受到勒索：要末干双班，要末明天就别来了。或者我来到钢铁厂，领班说：‘老板没有打电话给你吗？今天你根本不用来。’于是我又可以回家去。

或者相反：我在蒂森钢铁厂上了一个双班，23点回到家里，那儿已有阿德勒给我准备好的一张火车票，我必须马上动身去汉堡，夜里零点30分的火车。早晨7点左右到达汉堡——不是躺椅卧车<sup>①</sup>，火车上挤满了人，我没法睡觉——，在BAT（香烟厂）连续干8小时，然后又被派往杜伊斯堡。我就这样有一次接连干了26小时，没有睡过一个小时。”

于尔根把有领班或工长签字的工时表拿给我看。3月经常是16小时、17个半小时、14小时、20个半小时的班，“这些都是连着干的”。

有时候在这中间也慷慨地给几小时睡觉时间。如3月12日：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22点（16小时），回家睡一个半小

---

① 一种可坐可躺的两用座位。——译注

时，夜里零点30分开始新的一班，一直干到第二天21点（20个半小时）。

两天后又是一个双班，从16点到第二天14点连轴转（22小时）。3月18日早晨6点干到14点（正常的8小时），回到家中是15点30分，睡到20点（4个半小时）。随便吃了些东西。新的一班在21点30分开始，一直到早晨7点（9个半小时），从8点30分睡到14点（5个半小时）。然后又从16点马不停蹄地干到第二天14点（22小时）。

“我们总是压制住心中的怒火，”于尔根说，“我有工作做，我想，完全没有工作就会更糟。每当领班需要人，他就问，听着，多干些行吗？因为我开始时曾一清二楚地说过：如果你们星期六星期天有事，请告诉我，我挣得太少，必须多干才能维持生活。其他大多数人，土耳其人——在阿德勒那儿干的几乎只是土耳其人——情况就更不妙了。那就十分简单：你多干些！你如不干，明天就别来了。什么叫明天？马上就可以滚蛋！”

于尔根难得见到他的老板一面。“他很少露面，拒不见客，因为他经常欺骗大家。我在受雇时见过他一次，在工地上见过他一次，在开庭时见过他一次。只有当他想要谁干什么的时候，他就会亲自打电话给谁，强迫命令他：‘今天晚上你必须工作。又是特别班。’他从来不说‘你能够’，总是说‘你必须’。如果你回答说‘不’，那你就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开除。那是害死自己父母或子女的囚犯干的活，”于尔根认为。

“我们在热交换器里干活，必须把螺旋清洗干净。又热又脏。碱粉有毒。我们三个人干了几个整天。蒂森的职工问：‘这是怎么搞的？你们难道从来不换班吗？’

那里大约有三四十度。如果离螺旋太近，还要更热。清洗螺旋，全都用手工，用铁棍把它敲下来。那儿炉渣沉积，正常情况下经过液化通过烟囱排放出去。

现在，那些东西牢牢地停留在那里。就在均热炉的下面。你要是在那里面呆过 16 小时，在高温下，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我们三个人一班。另外那两人去过卫生站两次，我去过一次，因为我们的眼睛都又红又肿，由于里面尘土飞扬，没有面罩，只有薄薄的可透气的口罩，不是可罩住整个脸部的防护面具。还有：里边没有合理的排气管，空气和脏物全都留在里面，你又不能每隔两分钟迫不得已跑出去一次。尤其是，中午 14 点必须完成，然后往里灌煤气。于是我们就忙个不停。两天之内连续干了 36 小时。之后一直还轮换：第一天到下面高温中，第二天，在严冬时节，又在室外干，气温达到零下 20 度。我们用冰镐砸冰。这直接影响我的腰椎间盘，也因为老是温度变化。有些日子我腰疼得只能爬来爬去，可是我需要钱用。后来也是在冬天，在一个堆满煤泥的工作面上，我们得把运送焦炭的带子清洗干净。我几乎动不了。有一个土耳其同伴把胳膊摔断了，因为天寒地冻，滑倒了。六星期后他又上全班来了，毫不考虑受的伤。

我离开矿山，犯了最大的错误。从前我在煤矿工作，挣钱又快又容易。煤矿象是天堂！在井下干活有截煤机，与这儿相比是个美差！你只要有时动动手，是呀，等有活干时——可是在蒂森那儿，总是干呀干呀，只是用手干。我们搬运笨重的铁块，两个人抬，因为我们比吊车便宜。”

由于阿德勒的拖延策略，于尔根干了九个星期苦工一共才挣 861 马克。他无法养家糊口（有两个小孩）。他的母亲为了他去当清洁工；“否则我们就得真饿肚子。我不得不借债。

到处借钱，拉了一屁股饥荒。”

于尔根迫不得已向社会局申请救济：“起先我每月领500马克，但以后得还。他们说：你总算还有工作！我问自己：拿什么去还？”

早在2月，于尔根就相信他已看穿了这种不符合人类尊严的把戏。他向阿德勒说他打算辞职，但阿德勒又向他许愿。

“我说，要是这里继续这样下去，我就不干了。他说：‘来吧，你知道吗，以后你净挣12马克。’我说这是一句空话，让我们下星期一拿到手。他说可以拿到手。余数补给你。但我从未见到钱。”

3月20日，于尔根甩手不干了。

“我声明辞职，先是用电话，次日又用书面，并注明，如果我的工资还不来，我将向劳工法庭提出起诉。没有回音。我再次给他去电话，接电话的是自动电话记录器，我又把我声明的内容说了一遍。没有回音。几天后又给他打电话，他只问了一句你是谁，我说我是于尔根·K。他说：‘你去和我的律师谈。’于是我就上法院了。劳工法庭。第一次开庭，糟透了。首先是阿德勒摆臭架子，根本不出庭。其次，我觉得自己倒成了被告。开庭只有两分半钟，之后我又到了外面。只说了一句话：你控告的公司搞错了！我说：为什么？他们说：没有‘阿德勒—海斯特坎普两合公司’，只有奥伯豪森的一个‘阿德勒两合公司’。等一等，我说，这不可能。我这儿有‘阿德勒—海斯特坎普两合公司’的工资清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对法律不太熟悉，又没有律师，你就毫无办法。这个家伙只要宣布正常破产，就可以渡过难关。于是我就立即找了一个律师，这又得花钱。我很可能连诉讼费补助都拿不到，因为我有工作。这样一来，现在可能还有上千马克的律师费用要我支付。从

我们最后达成的调解中，也许只还剩下几百马克。象阿德勒这种心狠手辣的生意人总是占便宜，在法庭上也是如此。

现在，最后一次开庭他来了，想要收拾我，说我是个说谎者和骗子，工时表是伪造的。可工时表我全都让我的领班签过字，而且一式双份，一份给雷梅特公司，一份给我。从中可以看到，我在3月——我在2月还没有那么机灵——在3月干了129小时，只到3月20日，其中也有36个小时连轴转。

在他不得不向法庭出示的我的税卡上，只记有总额434马克。没有盖公司图章。其余的他全都贪污了。在法庭上，他的表现好象他是最高法官。后来他受到法官的警告，因为他对陪审员进行了侮辱；作为雇主，一开始就可以承认自己有罪，因为他反正不会打赢官司。或者是，他骂我：‘骗子……伪造证件者’。

我的律师劝我和解，否则这场官司还会拖几个月，也许拖好几年。而我需要钱。按每小时工资9.5马克总额计算，他共欠我2735马克，因为其他的并没有书面证明，而只是他口头讲的。我同意他只补给我1750马克。

在这以后，在开庭以后我得把税卡再寄给阿德勒。税卡至今还未寄回。又过了将近一个月。补偿费还一分钱没拿到。他现在必须补交社会福利金和年金费，他毫不着急。不会因此而让他吃官司的。劳工法庭把他当作只是有一点放荡的正人君子看待。我们这样的人却总是吃亏！

资本家今天可以为所欲为。那些小的承包商也是如此。失业的人太多了，原因就在于此。开口讲话，起来反抗，反对这种做法的人太少了！”

于尔根无法接受新的工作，因为阿德勒——这是他的一贯手法——没有把税卡退还给他。

“4月整整一个月没有税卡，没有保险单，然后还有5月半个月。我也和雷梅特公司谈过工作的事。他们说，好吧，你可以在我们这里工作，不过必须把证件拿来，这样才万事大吉。是啊，我没有证件，都在阿德勒那里。于是我就搞了一张代用税卡，拿着代用税卡去到雷梅特公司，他们说不行，这不成，你从前为我们工作过，就必须有原来的税卡。我相信这只是借口，他们跟阿德勒都是穿一条裤子的。

在我看来，这一切太便宜阿德勒了。下一批傻瓜肯定又会上当受骗。报上又已登出广告：‘阿德勒工业安装公司招聘……’我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把他的人留住工作的——这我不明白！他在劳工法庭上直言不讳：‘我雇佣的人，工资总额没有超过9马克的。’”

对于尔根来说有一个小小的安慰：

“有些外国人情况就更糟了。如他雇佣巴基斯坦人工作，只给6马克工资。他们没有居留证。”

阿德勒的手法和工作的极端危险性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劳工的下列报告得到证实：

胡塞因·阿特西斯(56岁)曾在土耳其干过最脏的活，他对阿德勒有这样的感受：“在西伯利亚一定也比这种工作强”。“更危险的工作岗位”他以前“从未见过”：

“在汉博恩新建的炼钢炉里，我们例如得从八层楼上把这些管子搬下去。我记得我们两人怎样把这样一根管子抬下去。我们在半路上非常小心，因为我们知道这有可能要我们的命。

在一座约70米高的吊车上，我们爬上去把尘土扫成一堆，然后再把装尘土的50公斤重口袋搬下去。这活十分危险、十

分肮脏。于是我就问工长为什么老派我干这种活。他说：“是啊，你起码是保了险的，你有证件，别人没有保险。如果出什么事，还能为你干些什么。”后来他们告诉我，阿德勒只有很少几名工人是合法的，只有几个人是参加保险的。”

胡塞因·阿特西斯也不得不为他的工资奔跑。当他在不断的催促下获得拖欠的部分工资时，其总数远远低于他根据讲妥的每小时工资和经常加班加点而可以期望得到的数目。他没有得到事先讲好的每小时10马克的工资而只有9马克，另外还额外扣除种种莫名其妙的税。胡塞因工作184小时仅得724.28马克：“当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你是斗不过这些人的。而且他们还有可能伤害你，然后再把你驱逐出境。于是我就说，我最好现在想办法从他那里要回我的证件，并对这笔钱表示满意。可是他对我说：你必须先签字说你收到全部款项，只有这样我才会把证件给你。”

萨伊特·蒂门(25岁)和奥斯曼·托卡尔(22岁)也有过类似经历。萨伊特·蒂门：“我在阿德勒那儿干了三个月，而他在这段时间内从来没有好好地同我结过帐，总是有时给100马克，有时给200马克。可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干活。我总是向朋友借钱维持生活，我对他们说，一等我 from 阿德勒那儿领到钱，马上把钱还给你们。因为他说过，过几天我一定可以拿到我的钱。当我无法向朋友们还债的时候，他们以为我在欺骗他们，就不理我了。这样我失去了许多朋友。——后来我设法到别处去找工作。可是他们要看我的证件，否则就没有工作。我去找阿德勒，对他说，我有了新的工作，可是要有证件，并且我想要我剩余的钱。”阿德勒说：“只有你签字声明你不再向我要钱，才能得到你的证件。”我想了想。如果我在以后几天拿不出证件，就找不到新的工作了。我该怎么办呢！我的新老



板是阿德勒的好朋友。于是我就向他签字说我不该再要钱。这张字据早已用打字机打好。他有好多张。上面写着：

### 证 明 书

“我在阿德勒工业安装两合公司临时工作期间已钱帐两清，今后不得再提任何要求，特此证明。”

奥斯曼·托卡尔：“阿德勒每个星期都要扣除几小时。我们去问他，他说：余数下次再结帐，可是以后也没有算。我们又去找他，他说：下次再说，下次再说。他总是这样把我们撵走。当我又去找他的时候，他对我说：要是你不同意9马克扣除40%，我只要在《西德总汇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会有1000人等在门口。能有工作就不错了，你们是外国人，他对我们这样说。”

他也谈到有害健康的工作条件：

“我们在机器旁工作，那儿尘土飞扬，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简直无法呼吸，真可怕。几天后我觉得心脏和肺部疼得要命，象针刺一样。蒂森的一个工人说，铁粉是非常危险的，我有可能丧命。我应当赶快找头头去要防尘面罩。于是我就去找蒂森的工长，可他没有给我防尘面罩。他说，那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应当大惊小怪，赶快继续干活。他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是在20小时内完成不了，我们还得呆在那儿干下去，不能出去。

下工后我马上去医生那里，我咳嗽很厉害。医生对我进行了检查，立刻就问我在这儿工作。我说：在蒂森，在一家私人公司，他又问我的工作岗位在哪儿，是否有瓦斯或铁粉之类对肺有害的东西。我说那儿有铁粉。他说我并不是来找他看这种病的唯一的蒂森工人。如果我想要真正恢复健康，就应当另找工作，并给我开了药。”

## 辐 射

对我(阿里)来说,本来还计划到最老的原子能发电站维尔加森核电站(1971年投产)去工作。这个核电站亟须修缮。每年进行的修复工作还需要可靠人员。外国人,尤其是土耳其人,受到优先雇佣。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身体很灵活的关系。

关于经常受到少量辐射的远期后果,联邦德国并没有精确的科学认识。在原子能发电站进行修缮或清扫工作,被送到特别易受辐射的危险地区去的大多数外籍工人,如果得了睾丸癌、前列腺癌或甲状腺癌或者因此死亡的话,在几年或几十年后便不再在统计中出现。他们住在别的城市或者返回遥远的故乡,没有人再会过问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是否曾在一个德国核电站干过几天、几周或数月比较轻便干净的工作。原子能发电站的经营者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希望把自己的工作人员保持在比较少的固定职工的范围内。对于比较危险的工作,他们通过承包公司一再临时招聘新的人员。这些临时工常常在短短几小时或几天内,有时甚至只有几秒钟,就受到5000毫雷姆的年最高限值。我问过每小时挣10马克的土耳其和德国工人。<sup>①</sup>

一名从前的临时工说:“发生故障时一般都由土耳其人去干。他们作为机动人员被派往受到辐射污染的热区,一直呆

---

<sup>①</sup> 有关人员的讲话和材料都作出具结。——原注

到所受辐射量达到 5000 毫雷姆/年的允许限值。这有可能是几个小时,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也有可能只有几分钟或甚至几秒钟。大家称它为卖命。”<sup>①</sup>按照规定,有关人员在这一年其余时间得“停止工作”。有一人对我说:“尽管如此,还是有办法到别处去继续工作。”究竟是什么办法,他不愿透露。“否则你就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其它工作。”

为了亲身实地体验这种可能使人有生命危险的工作条件并能证据确凿地加以证实,我(阿里)到维尔加森去求职。问题在于先得进行安全审查。我提出我的替身的姓名地址以及最近 10 年的所有居住地,这样州宪法保护局便可开始其调查核实活动。资料中心的电脑动用其已储存的大批资料:是否参加过游行示威?其它活动?联邦刑事警察局也被召来参加调查。通常这种审查要六星期,情况复杂的例外可达三个月之久。看来对我——也就是我的替身——正在进行更具体的调查,反正两个月以后一直尚无结果,既无肯定的结果,也无否定的结果。也许是由于正值休假季节。不管怎样,这种延搁对我来说十分合适,使我可以例外地改变原来计划,着手进行这个项目。(再者,我曾把我打算作为“土耳其人”去接受原子能发电站辐射的计划透露给一位同我有交情的 X 线科医生和放射专家。他强烈要求我放弃这一计划。我的健康状况——由于蒂森的粉尘而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和总的情况日趋虚弱,这也是药物试验的后果——已相当不好。现在再让身体另外受到放射负担,他认为很有可能会留下长期辐射损伤。)

我并不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年,相反我觉得自己已

<sup>①</sup> 不受核电站工业影响的科学家担心这样一种在最短时间内施加的最大剂量有可能诱发辐射癌作为远期后果。(在伦琴时代开始时,人们也把据推测尚可忍受的射线最大负荷量估计过高。)——原注

精疲力竭，因为我已越来越深入到角色中去，伙伴们和朋友们的几乎绝望的境遇越来越使我自己感到沮丧，我害怕得放射癌会久病不起，有可能拖上好几年才死去。“这有可能给你致命打击，”我的朋友，那位X线科医生警告我。因此，我承认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懦弱，依仗特权置身事外。成百上千外籍劳工面临这种工作可能，迫不得已拿他们的健康甚或生命孤注一掷，即使他们的身体状况更差。而这种工作吸引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往往不需要很多体力，因而连老弱病者自信也能胜任。

再加上大多数外国人根本不了解这种工作特别危险。当我(阿里)到那里去求职，明确地询问：“这工作不危险吗？”人事处长也安慰我说：“和其它工业部门一样！”

一些证词说明维尔加森核电站工作的真实情况。

维尔加森的领班弗兰克·M说：

“一方面，这是一种可以多挣钱、快挣钱的工作。我作为领班，最近一次结帐净挣2500马克。另一方面，我决不会在那儿工作五年以上，即使我会失去我的工作。五年后我宁可去登记失业。那儿的放射负荷太高，电站太老了。那儿有一座石墨沸水反应堆，放射量甚至高过压水堆。据我看，那儿的每一个咖啡杯都受到污染。只要一走进去，还没有开始干活，放射剂量测定仪上就已有10毫雷姆。”

放射剂量测定仪是每个人在“热区”必须随身携带的仪器。它显示一天之内在工作场所产生的照射量。但是，由于害怕做不到足够的工时，人们常常对它耍弄花招。

在维尔加森工作过的一位工人说：“那是自己检查。你干脆把放射剂量测定仪放在一边，比方说放在窄柜里，没有人会发现。没有人关心此事。我在维尔加森工作期间，没有人问过我。既然不带在身上，当然就什么也不会记录……我知道赖因

霍尔特与马勒尔承包公司搞过一个项目，他们雇了许多南斯拉夫人，大约有16人。他们统统都是非法的，没有证件。他们对安全规定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后来这事败露了，他们不得不走路子。偷偷地把他们弄走。比方在格隆德，在那儿干活的全部电焊工中，也许最多只有20%是德国人，其余的全是外国人。”

弗兰克·M继续说：

“我们的承包公司大约有2500人，其中至少有1500个外国人。他们都是临时工，等到修复工作结束，他们又被解雇。大多数人总是只干几周。他们是最玩命的。他们去那儿干活，就会受到辐射。在我工作的那家公司里，有几个工地主任、领班，他们通常在那儿的时间长一些。所有其他的人只是临时的。如果他们订的是临时雇佣合同，比方说参加一期修复工作，在两周之内辐射量就已达到一个季度的剂量。于是电站的安全员就会说，你们别再来了，于是他们就被解雇了。我们也有许多土耳其人是专门从土耳其乘飞机来到此地当临时工的，一直干到达到剂量限值。需要电焊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在放射区工作，那儿每小时的辐射量我看达到1000毫雷姆，他们干两小时就被换下来打发回家。下一批接着干，也是又干两小时，他们也有了2000毫雷姆，于是也得回家。老是换人，一直到搞完为止。

通常是这样的：外籍工人来了，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干两天或两小时后又得停止。对他们只讲：你们停止工作。他们只得离开，回家去。”

关于反应堆水槽旁清洁工的工作情况，弗兰克·M作了如下报道：

“当电站停止运转的时候，每次平均更换30%的燃料棒。这些燃料棒然后就放在储存槽里一年以上，让放射性消失。更

换燃料棒时里面有水，这时总是有我们的人在场，他们也要把水槽周围的地面保持干净，以防放射性污染（外界污染——作者）扩散到整个电站。一个人紧挨着水槽干活，另一人抓住他，也就是用绳子套住他。假如一个人掉进水中，就必须在10秒钟之内把他拉上来，因为这水是不能游泳的。”

南斯拉夫工人德拉甘·V说：

“他们在雇佣我的时候对放射危险一字不提。他们只告诉我：我的季剂量是2500毫雷姆，年剂量是5000。此外就什么也没有说。这工作有多么危险，是否有危险，没有人说过什么。”

1982年8月20日，有14名外来的临时工在更换排气装置的所谓“沙过滤器”时受到强烈辐射，不得不把他们送进杜塞尔多夫专门的放射病院。核电站领导指示对此事严格保密。下面是亲身经历维尔加森这次事故的一名工人的谈话记录：

“我在那里面工作时总是提心吊胆。特别是那次事故以后。他们先是搞了**暂停工作**。后来人们还得在里面再工作半小时，然后突然宣布全部停工。我们的磨工，他们在地下七米深处。其他人都坐在楼梯间里。楼梯间旁边有一间屋子，那里堆放着全部工具。他们的工具箱就放在那间屋子里，有电线通到外面，因此房门当然是敞开着。他们全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直到后来宣布全部停工。在出口处，他们想通过自动检验器（测定放射负荷的仪器——作者）出去。可他们发现自己已完全受到辐射污染。

此后就开始了：他们必须使劲冲洗身体，洗了又洗，但无济于事。我们其他人早已到了外面，而他们一直还在冲洗。他们一直洗到下午3点，差一点把皮肤都搓掉一层。从11点半起。后来到3点才出来。我们不到3点又进去了。可以继续工作。只有机器房和大门行车道还封锁着。第二天星期六，

我们也继续干，因为工时还不够。那一天又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又去冲洗直到中午。从早晨7点到12点，但一点也没冲掉。于是星期一就去杜塞尔多夫放射病院。他们只是进行测定而已，别无其他。之后，几乎所有人在这一年其余时间都被停止工作，不能再进电站。”

德国工人霍斯特·T也经历了一次事故：

“有一天，我在冷凝室里撕破了我的防护服工装裤。下工后我走到检验器眼前时，整个盒子都亮起来，从上至下。我想这不可能！于是我就去淋浴。将近两小时。一再地：冲洗，检测，冲洗，检测。事后我不再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了。这进入毛孔，你可以搓上几个小时。他们告诉我，我一共受到2800毫雷姆的辐射。但我怎能知道是不是要超出好多倍？于是他们干脆把我解雇了。据说是没有工作可做。此外，我也不适合搞这个工作。我想要我的辐射证，因为证明上一定会记载你受过多少辐射。经过长时间反复交涉，我拿到了证明，可上面什么也没有写。他们让我把证明寄到卡塞尔承包公司去。我照办了。14天后他们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再干。现在我又领到了一张新的辐射证。我看了看，因为我得在证明上签字，上面什么也没有记，什么也没有，好象我还从来不曾在那里工作过……”

只有极少数职工能看到法律规定作为受污染证明的辐射证。这些证明都留在各承包公司的办公室里，有时会丢失或者有关当局前来检查时会出现经过加工处理的数值。那些承包公司的老板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承担对他们人员的责任。

原子工业一有机会就掩饰经常接触少量和较大剂量放射性的危险。例如凡是进入维尔加森核电站在“热区”工作的人，都以彩色录像影片对他们“说明”：“辐射可与阳光相比，”

一位广告片行业的漂亮的播音员说。与此同时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一位皮肤晒黑的少女躺在南太平洋某地海滨张开的阳伞下。工人们谈到领班们如何消除他们的担心：“辐射强度相当于在北海海滨度假两周。”最后在每一部“宣传教育影片”中都重复出现几次维尔加森的轻松格言：“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放射负荷，尽量减少任何不可避免的放射负荷。”

事实上，工业部门一开始就已把一定比例的伤亡人数考虑进去。这只停留在纸上。至于人们真正遇到什么情况，那是无人检查的。

不来梅辐射研究员英格·施米茨—费尔哈克教授说：

“今天我们知道，任何剂量的辐射，不管多少，都有可能造成损害。要末是有可能引起一种由于辐射造成的癌症，要末是在后代身上造成遗传缺陷。而辐射造成的缺陷，糟就糟在它们常常在受辐射很多很多年之后才出现，也就是要到二三十年以后。而联邦德国运用核技术还没有这么久的历史，因此现在还无法研究其后果。”

但是，到了这么久以后，谁又能证明一种致命的癌症是由于核电站“热区”这样一种工作所引起的呢？承包公司工人的健康状况事先受到检查，工作结束后却不检查。分期谋杀？偷偷摸摸，没有证人，没有证据，大规模。每年有好几万名清洁工和电焊工在德国核电站工作（单是在维尔加森，被派往危险区去的人一年就有5000人）。其中约有半数是外国人，他们往往在后果变得明显可见以前就已返回自己的祖国。

核电站的安全（包括工作场所的安全）在联邦德国由技术监督协会（TÜV）负责。科隆莱茵兰技术监督协会事故研究所曾向联邦内政部长转交过一份关于“核电站的人员因素”的报



告。这份报告至今一直没有发表。技术监督协会的工作人员在报告中探讨了由于核电站使用所谓“外来人员”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不过是对工业而不是对那些人的问题：

“首先是在同服务企业非熟练辅助人员的合作上产生问题。这些人员特别用于辐射强烈的工种以便保护自己的工作人员。按照电站主管人员的说法，这些人员常常缺乏正确的动机，工作消极……”

毫不足怪，有谁会高高兴兴地到核电站去？可是在另一处也提到：“……鉴于有计划地完成现有工作任务，放弃外来的服务工作是不可思议的。”“由于辐射负荷和与此相关的自己人员受到限制的使用可能”，经常出现“人员短缺现象”。还有：“允许的辐射量常常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几分钟）摄入的。”报告接着说：“自己人员的一项任务就是尤其在要求速度和准确的暴露在辐射下的工作中向外来人员提供相应的指导……详尽的指导往往是不可能的（在辐射量大的情况下），或者得不偿失，达不到使用外来人员的目的。”技术监督协会研究所冷冰冰地指出：“多数被使用的外来人员通常对这种危害毫无经验……缺乏专业常识在这里又造成不良后果，而且，在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员（限制其辐射量）而使用外来人员的地方是不可能进行仔细检查的……对一种几乎一无所知的危险的束手无策的感觉，有可能使那些从事辐射性强的任务的外来人员采取不谨慎态度。”

只有知情人和科学工作者才能马上领悟象1982年7月29日《法兰克福汇报》所报道的消息的内在含义。该报在“仅更换管道就动用千人”的标题下报道了维尔加森的修缮工作并以原子工业的暗语提到，那里估计会达到“1000人雷姆”。什么叫“1000人雷姆”？这听起来象是特务活动使用的暗语，或

者也许还象是短波收音机上的射频。不过大康采恩都很清楚它是什么意思。专家们可以把这个神秘的计量单位迅速折算成估计会有多少人得癌症。美国橡树岭原子能研究中心辐射防护所前所长卡尔·Z·摩根（科学家们喜欢称他为“辐射防护研究之父”）说，“1000人雷姆”相当于6至8名癌症死亡者。纯粹从统计数字上看。不知不觉地来到的辐射死神，既有可能造成阿德勒雇佣的人死亡，也有可能造成向原子能发电站供应人的“辐射饲料”的其他较大的人贩子集团中的人死亡。例如霍尔茨明登的“策尔登”或兰茨胡特的“科普费尔”或不来梅的“雅夫克”①。或……

难道他们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是多么危险？一次认真的测试证明，当人们一清二楚地向阿德勒说明这一点的时候，他连知道都不想知道。

### 核电站癌症发病率高

英国原子能发电站和其他核企业的工人患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大于普通人。根据现在在伦敦发表的英国医学研究会的一篇论文，在一组受到较高辐射的1000名工人中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数超过全国平均数八倍。

将他们的调查结果在《英国医药杂志》上公布的科学家们，研究了在1946年和1979年之间在英国原子能机构中工作的4万名男人和女人中的3373个死亡人数。

论文表明，由于白血病、甲状腺癌和睾丸癌而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大大高于平均数。此外医生还发现，长期受到微量辐射的妇女由于卵巢癌和膀胱癌而死亡的人数也高于平均数。

——1985年8月21日《法兰克福评论》

---

① 这些都是联邦德国一些较大的承包公司的名称。——译注

## 代办业务

### 或快快送命

——一次模拟现实的表演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250注。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一个名叫托·约·登宁的英国工会干部《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的话。）

无巧不成书：维尔加森核电站也有阿德勒的人在干活。人数不多，这正是他的一贯手法。最好不引人注目，化整为零。东派30人，西派10人，别的地方再派上几个人。万一在汉堡出了事，在鲁尔区同蒂森、施蒂克、曼恩等大企业的交易仍能

继续下去。同南德的鲁尔煤热公司的业务关系也不会受影响。他的一条座右铭是：“积少成多。”另一条叫做：“你有你的法律，我有空子好钻。”阿德勒同维尔加森核电站进行的人口交易，如同“海德先生”<sup>①</sup>和“马布塞博士”之间的合作关系一样令人不寒而栗。阿德勒的犯罪能量，为核工业的“技术需要”所用。他们买卖的商品：去送死的土耳其人。

我想让他们亮相，看看他们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便草拟了一个脚本。我的朋友和同行愿意参加演出：科隆演员海因里希·帕赫尔扮演核电站安全负责人施密特，我的同行乌韦·赫尔措格扮演施密特的技术助理汉森。

### 秘密使命

维尔加森核电站出了技术故障，不能并网送电，损失高达数百万。需要找土耳其工人钻进完全被辐射污染的管道去排除故障。估计他们受到照射的剂量和集中程度，将会使他们的健康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害，有可能引起癌症，作为远期后果。条件：不能让土耳其人知道这项任务的危险性，任务完成后应尽快将他们送回本国。“施密特”声称，阿德勒在本行业以承担这类业务特别可靠而闻名。通过汽车电话进行了第一次联系。我（阿里）正驾车把阿德勒从埃森鲁尔煤热技术公司送回奥伯豪森，这时电话来了：

帕赫尔/施密特：“您好。我叫施密特，是维尔加森核电站

---

① 英国 19 世纪后半期著名作家斯蒂文森的中篇小说《化身博士》（即《杰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叙述杰基尔医生为了探索人性的善恶，服用自己发明的一种药物，创造一个名为海德先生的化身。他把身上的所有恶念都分给了海德。后来海德失去控制，杀人害命，杰基尔医生无法摆脱海德，自杀而死。——译注

辐射防护处负责人。阿德勒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直截了当地对您说明是怎么一回事吧。我们这儿出了故障，单靠技术措施无法排除。于是我就想起您是帮助我们排忧解难的合适对象。我们需要在很短的期限内投入较多的人力。由于情况十分紧急，我们现在——我正好在鲁尔区——能不能碰头？过一小时行吗？如您方便的话，我建议以利希滕多夫高速公路饭馆见面。在威斯特荷芬叉口和乌纳叉口之间。1点半可以吗？”

阿德勒从车门内侧的格层中取出鲁尔区专门地图仔仔细细地观看后对我(阿里)说：“我们得快点！快把我送到奥伯豪森去见雷梅特。1点半我得再去另一方向。利希滕多夫高速公路饭馆。有个顾客在那儿等我。有新任务。”见过雷梅特后，归途中他非常着急。他催逼我无视时速限制：“加大油门，我可不能迟到。”当一位妇女驾驶一辆汽车超过我们后没有立即换车道，他简直火了：“这个蠢母猪，混帐东西，追上她，叫她让道，否则我们会迟到的。”现在，当他发现时间已晚的时候，突然一反常态说起“我们”来了。我们到达那个饭馆时迟到了五分钟。他一把抓起他的公文箱，大步流星地奔向新任务，事先也没有忘记向我(阿里)布置工作：“从车格层中取出刷子和抹布，把车里统统擦干净。还有烟灰缸。我回来时不愿看到一点尘土。”——“明白了，”我简要地说。我发现这始终是他最爱听的回答。

看到朋友的汽车已停在那里，我松了一口气。我在擦他的汽车的时候，他在饭馆里面把新任务揽到手。

那是8月7日星期三13点30分，核电站两位特使同阿德勒面对面进行了首次会谈：

帕赫尔/施密特：“时间非常紧迫，星期五以前必须全部完

成……”

阿德勒：“我是个中等企业家。我们什么都干。我们的客户都是大厂矿，例如鲁尔煤热公司、施蒂克电力公司等等。我们过去常给你们（维尔加森核电站——作者）干。”

帕赫尔／施密特：“我们曾试过两种办法。这一次我们需要 8 名可靠的工人，要求他们从前还没有干过这种活……”

阿德勒：“明白了。”

帕赫尔／施密特：“要把他们派进去。这是第一点。故障可能很快就排除，也有可能时间长一些。”

这些开场白只是旁敲侧击地围绕着这个“烫手”任务兜圈子，阿德勒立即心领神会。他迅速强调“明天就能派 8 名或 10 名靠得住的人去”。然后有的放矢地提出一个问题，表明他是精通此道的老手：“关于辐射证，能有什么办法吗？”帕赫尔／施密特早已有所准备，提出了第一个非法要求：“当然不办辐射证，”因为时间来不及，故障至迟到星期五 18 点必须排除。阿德勒毫不犹豫：“嗯，不办辐射证？……明天你们需要 8 个人，没有辐射证。明白了！我干我的，你干你的，绝对保密，等等。”

这样，帕赫尔／施密特就可以继续提要求了。他们很快就谈妥，只考虑“不是本地”的人，也就是“外籍劳工”，他们可以“立即重新撤离”。帕赫尔／施密特马上也说明让这些工人迅速离开的主要原因：“当然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接着又安慰地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那决不是单方面的原因，我是想说，癌症嘛，决不只是一种原因引起的……癌症的潜伏期可能有 20 年。”阿德勒（如释重负）：“是啊，不错。”帕赫尔／施密特（使之放心）：“也就是说，那是永远无法直接证实的。”

接着赫尔措格／汉森拿出图纸，使阿德勒不再怀疑他组

织的是一支送死队。

赫尔措格／汉森：“您看。这里是管道，直径67厘米。那些人得钻进去……”

阿德勒：“这里哪儿是……核心部位？”

赫尔措格／汉森：“这儿，这是安全高压罐。安全高压罐和机器房之间有很长的管道，放射性蒸汽由管道输往涡轮机。我们的‘耗子’就卡在这根管子中间了。”

阿德勒：“嗯，嗯。”

赫尔措格／汉森：“也许您认得这种仪器，这是一台小型激光仪，它从里面探测损坏部位。这个耗子现在卡在里面出不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因此得派人钻进去，活并不累，不过身体得好。”

阿德勒：“他们可结实呢。对，对。我明白。”

赫尔措格／汉森：“……他们得钻进去。问题只是：由于技术原因，我们现在说不清这个地区的辐射量有多大。有可能非常大。”

阿德勒：“请问，我们是否要带什么仪器去？”

赫尔措格／汉森：“剂量测定仪由我们提供。这没有问题。我们发防护服和所有一切。问题只是人体受到多少辐射，这只有等他们出来后才能准确判断。”

阿德勒(象个妓院老板谈起自己的工人)：“我有人，例如在蒂森就有不少。明天从那里抽调8人，挑最好的。我们明天一早就坐自己的交通车去。他们都是……外国人，其中有一个德国人，大体上都是外国人。他们不知情。事后也不会多嘴多舌，一星期后就叫他们上路滚蛋。”

你们有没有可能，是呀，我是个生意人，对长期派其他人员去贵处工作感兴趣。对我来说这是最理想的。搞清洁工

作，诸如此类，什么都行，长期的……”

帕赫尔／施密特：“我建议您，我们先把这件事办妥。我认为，只要这件事办得使我们双方全都满意，我们会乐意再和您联系。还有一件事，比方说，如果现在发生某种紧急情况……”

阿德勒：“哦……？”

帕赫尔／施密特：“……您还有没有劳动力……”

阿德勒：“当然有罗，我有预备人员。可以马上换人。”

帕赫尔／施密特：“……由于某种原因，事后他们也得返回本国，在不长的时间内。”

赫尔措格／汉森：“我们必须作好一切准备。风险很大。也许可以发一笔补助使得他们比较愿意回土耳其去。”

阿德勒：“是的，要是付给他们合理的价钱……”

帕赫尔／施密特（在酬金问题上故作慷慨）：“算算看，嗯，大概有12万至15万马克……”

阿德勒：“你们现在把问题向我说了。我是企业家，什么都干。我想挣点钱，工人们也应当挣点辛苦钱。好吧。我现在去挑人，我明白你们的难处。好吧。什么人可以使用？什么人在领事馆的遣送名单上榜上有名？这我清楚。什么人跟外侨管理机构有麻烦？我也清楚。好吧，我们就用这些人。”

到此，阿德勒对这笔“生意”已心中有数。他又问了一遍这两位“安全负责人”的姓名：“您是施密特先生，您是……？”——“汉森，”赫尔措格／汉森再次作了自我介绍。阿德勒以为自己想起来了：“哦，您的名字我也熟悉……对，对，是维尔加森的……”这笔有利可图的交易增强了他的信任。他也向两位“伙伴”再次保证自己靠得住，然后马上就谈到关键问题——钱。



阿德勒：“是啊，我把我的人掌握在手心里。我们有了主顾，他们就得埋头干活，闭上眼睛干活，不得东张西望。谁要是胡说八道，就叫他滚蛋。”

别处也有这种事，我们在蒂森也干过（这种）事，什么也没有透露，滴水不漏。

这就是说，明天开始，1985年8月8日。好吧，那我们就简短地再次肯定一下：你们愿出多少钱？”

帕赫尔／施密特：“我们的预算大约是12万至15万马克。风险由您承担，也就是说，如果以后产生后果，您得负责叫他们远走高飞。”

阿德勒：“现在再次提个问题，我好心中有数：他们干完后身体受损……是吗？”

帕赫尔／施密特：“我想我们都是明白人。我们也为此付款。这是一种放射性污染，一般必须在事后进行治疗。只不过是样，我们不能这样做，那就会到处乱传，或者有人在这儿呆的时间长了，他就会讲出去，有些情况就会传出去。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防止这一点。”

赫尔措格／汉森：“这些人干完活儿必须马上离去！马上离去！”

阿德勒：“全都明白……开诚布公说吧，我现在有一些伙计，我把他们找来。然后你们就把他们派到危险区去，是吧？对，这不成问题。”

这就全都清楚了：把“伙计们”派到“危险区”去，对阿德勒来说“不成问题”。只剩下一些枝节问题仍需澄清。

对运输作了安排。帕赫尔／施密特将提供核电站的一辆面包车次日去杜伊斯堡接人。阿德勒还宣布他的固定人员现时住在维尔加森“转弯处”旅馆，他自己也跟去，最好当时就能

收款。

他们一同离开了饭馆。我(阿里)从阿德勒满意的表情上看得出来他已谈妥这笔人口交易。我按照他的要求把车门打开,他一言不发地扳动自动开关,把软椅调到他认为最舒服最轻松的位置上。

“回奥伯豪森。”他只说了一句就沉默下来,若有所思。有一阵子,我还以为我或许冤枉了他哩。这种明目张胆伤天害理的事使他感到畏缩了,他拒绝不干了。他并非如此肆无忌惮。没有人会如此心狠手辣。他不会草菅人命。虽然他的人员在蒂森厂并非那么一目了然地也在慢慢地被送死,浓密的重金属粉尘象定时炸弹一样在某些同事身上也会渐渐致癌,但他在那里还能不往那方面想。这一次的情况要明朗好多倍。蒂森的粉尘人人都看得见,虽然许多人并不清楚其有害的后果,而核电站的辐射使人患病甚或死亡,却没有一个被送死的人会知道。也许他现在正在进行思想斗争,我这样想并且已在希望——他会拒绝不干。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他所考虑的却是另外一回事。他在他的小记事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一些数字,看来是在算什么帐。突然,他打破沉默说:“你能不能在明天以前迅速找到七八个想挣点钱的同胞?一件美差,不过得是好样儿的!”

我假装在考虑。阿德勒说:“你要是一下子办不到,我就去问K,他总是有一些人的。”K是一个土耳其工人,阿德勒把他提升担任一种充当看守助理的囚犯的角色,每当他需要新的人手时,就让K去物色。

“我也能,”我(阿里)只是说,“要什么样的人?”

“不需要什么专门技术,”阿德勒说,“我只看重一点,要找那些最穷最穷的人。告诉他们,我从前也穷……”

我惊诧地望着他：“您穷？您什么时候穷过？”

“是啊，战后我们大家都穷。可以找那些害怕被驱逐出境的人。”他觉察到我的惊讶，便迅速作出说明：“我想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在这里过得很糟糕，你明白吗？我一向关心公共福利，我从来就是社会民主党人。”

“这是啥呀？”我问。

“这是为工人办事的政党，”他向我解释，“我是这个党的党员。”

“干什么工作？给多少钱？我想知道。”

“挣的可不少哩，”他说，“两天 500 马克。干的……是轻活，清洁工作，十分干净，连手都不用弄脏……”

“在什么地方？”我（阿里）想知道。

他含糊其辞，更确切地说他在这一点上也在说谎：“就在方圆 100 公里之内。”（实际上维尔加森有 300 公里远——作者）

“尽管去找一些没有居留证、不敢抛头露面的人，”他继续说，“不过，任务完成后，最好马上就回土耳其去。你要是能给我把人找来，也可以拿到 500 马克。”

“好，是否也可以找收容所里的人？”

“嘿，千万别和官方打交道！”他摆摆手说。“你要知道，这是black<sup>①</sup>，这钱……”

“什么叫black？”我问。

“黑的，不纳税。我付给他们现金。用不着看证明什么的。这一切统统都在桌面下进行，他们宁可这样。这样他们就有钱回土耳其办点什么。要带点过夜用的东西，贴身衣服

① 英语：黑的，黑市的。——译注

等等。其他什么都有。你到什么地方去找人呢？”

“啊，有些人躲在地下室里。”

“哦，这很好，”他说，“既然他们住地下室，也就不同什么人来往了。他们有多少人？”

“嗯，大约5个……”

“好，”他说，“再到别处去找几个，也许你能找到8个人。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打电话到网球俱乐部找我也行。最好别把他们带到我家里办公室，把他们带到你家去，带到狄塞尔街，到时候我就去你那里接他们。只是有一点很重要：事后他们都得给我远走高飞！这一点我要求立下字据，他们也得保证一定离开这里。他们不是必须离开吗？他们全都受到外事警察的追捕吧？”

“是的，”我说，“有的是这样，有的是这样。”

“好吧，他们统统都得离开此地，这一点必须明确！别让我过几个星期看到他们还在这里。这是接受这项任务的条件，这是先决条件……”

我又更详细地问干的是什活。但他只说：“这你不懂。会向他们讲清楚的。毫无问题。重要的是，必须帮助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吃了不少苦……”

他的口气像个神甫，声音突然变得一本正经起来。但接着他马上就恢复常态：“只是得能让我放心！”

“明白了，”我说。

他叫我晚上打电话向他报告执行情况。晚上21点。我打电话，在他的网球馆的餐厅里找到了他。他已接到他的业务委托人施密特的通知，6个人就够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无法动员更多的人参加）。

阿德勒看样子有难处，不能畅所欲言。在有业务往来的

朋友和对他的底细了如指掌的职员面前，他不可能标榜自己为土耳其人的大恩人，或把他那在鲁尔区对做生意有好处的党票说成是“为工人办事的政党”。否则这会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

“我怎么对伙伴们说，才能使他们也相信呢？”我进一步使他为难。“嘿，现在可没法说，”他支支吾吾。“过一小时给我家里打电话。”

在家中电话机旁，他的声音又带上一点庄重的语调。当我(阿里)又追问：“如果他们问您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我该怎么说呢？”他确实又把他的乐善好施行为升级了。他不再说什么“最穷最穷的人”，而是说“最最最穷的人”——“我想再给他们几个马克”。但当我打断他的话，企图向他进一步说明一些土耳其劳工的悲惨境遇时，他几乎再也无法掩饰自己对此多么不感兴趣。只是为了让我继续办这件事，他才勉强说了一句“这我们以后再谈”，甚至同意我的建议，准备给“最最最穷的人”搞工作许可证和住房——尽管他心里有数，他已答应“安全负责人”，让那些外籍劳工尽快滚蛋。

次日上午。9点30分。

核电站代表施密特打电话问阿德勒是否都已——象已商定的那样——安排妥当。

阿德勒：“我已经安排好人了。不过现在请您实话对我说，您究竟是谁？您不是维尔加森核电站的施密特先生。这我知道。施密特先生，您就实话实说吧。您究竟是谁？让我知道我在跟谁打交道。然后我们再做这笔生意。”

我们早已料到阿德勒会到维尔加森去查问并发现真的安全负责人并没有离开过核电站。帕赫尔/施密特早就有防备，曾对阿德勒说过：“您不要到办公室找我。这件事非常机密，

因此我会不得不拒绝见您并对您说：‘我不认识您，我们从未见过面，没有这事。’我们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安全部门，敌人到处在伸长耳朵偷听，即使在我们内部也是如此。”看来阿德勒并不是自己打电话而是通过第三者获悉这一点的。不过我们也针对这种情况早已准备好一种说法。

帕赫尔/施密特：“请放心。这是一件绝对机密的事情。这要比施密特大几号。这是经理处直接决定的。”

阿德勒：“对。我理解。”

帕赫尔/施密特：“为了保密，当然就需要有一定的信任基础……”

阿德勒：“对，我也有。”

帕赫尔/施密特：“如果没有信任基础，我看整个事情就得重新考虑。我们的处境不允许我们……”

阿德勒：“是……”

帕赫尔/施密特（提高嗓门，慷慨激昂）：“正因为我们有负责德国的电力供应，根本没有其他办法……”

阿德勒：“是啊……”

帕赫尔/施密特：“昨天我已对您说过，您打电话是问不出名堂的。在我们那儿，这也是绝密的事，您明白吗？”

阿德勒（插话）：“对！”

可是阿德勒仍心怀疑虑，不过帕赫尔/施密特的权威神态越来越驱散了他心头的疑云。

阿德勒：“施密特先生，由谁给我委托？正式的委托书？”

帕赫尔/施密特：“根本就没有委托书，您明白吗？”

阿德勒：“明白。”

帕赫尔/施密特：“您听着。第一，我们现在只需要6个而不是8个人。这就是说，价钱从原来的13万降到只有9.5万

马克。我说……”

阿德勒：“嗯……”

帕赫尔/施密特：“……咱们就别斤斤计较了，就算11万……”

阿德勒：“嗯……”

帕赫尔/施密特：“……不过其中也包括回国补助或回国奖励。”

阿德勒：“是，不错。”

帕赫尔/施密特：“我们大概其算了一下，每人在5000马克上下。我们必须保证做到这一点，而且您也得把这笔钱全都付给那些人，阿德勒先生！”

阿德勒：“那个自然罗！”

帕赫尔/施密特：“第二，必须保证他们是真正壮实的人。”

阿德勒：“他们都很壮实，没问题。”

帕赫尔/施密特：“我们可不想看到他们刚受到几个毫雷姆<sup>①</sup>辐射就垮下来。”

阿德勒：“不，不，他们会忍受的，不会那么快就趴下。”

帕赫尔/施密特：“如果您需要领班之类的人，那也得是个外国人。”

阿德勒(插话)：“当然。但是，施密特先生，现在还有一点。这真是维尔加森核电站的委托吗？”

帕赫尔/施密特：“是的。”

阿德勒：“是吗？果真如此？”

帕赫尔/施密特：“当然是的。您的理解完全正确。您有

---

① 雷姆是辐射剂量当量(即生物剂量)单位。为了放射性防护的目的，便于将生物所受的各种辐射剂量统一衡量，采用以雷姆表示的剂量当量单位。千分之一雷姆为毫雷姆。——译注

什么顾虑？您看，您要我实话实说。我已经大大地满足了您的要求。”

阿德勒：“对，不错。”

帕赫尔/施密特：“比方说，我不知道您究竟谈出多少情况。所以反过来我想请您，倘若您有什么顾虑，请告诉我这些顾虑从何而来。我们可以谈谈嘛。可是您必须……”

阿德勒(插话)：“是的，我理解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等等，有时还得隐姓埋名，这我理解。只不过，如果有人来说，这里，我是……并自我介绍说：我叫施密特，是维尔加森核电站的，而我知道这并非事实……您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上所述，我有顾虑：我究竟是在干什么？我确实是在和电力公司打交道，还是和什么人打交道？您知道，我不愿马马虎虎粗枝大叶或者严重违法乱纪，不。”(阿德勒清清嗓子)：“是啊，施密特先生，如果我可以说的话，我不知道，可我想知道，我的对方是否真是电力公司？”

帕赫尔/施密特：“……什么马马虎虎粗枝大叶，我没有听清楚……”

阿德勒：“……是的。”

帕赫尔/施密特：“……可能违法乱纪。要是您那方面有什么情况，您当然得告诉我。”

阿德勒：“不，我这方面……”

帕赫尔/施密特(插话)：“诸如此类的事情。”

阿德勒：“我这方面毫无问题，我向您提供人手。”

他们讲好再碰头一次。阿德勒建议在火车总站前面的汽车站碰头。

帕赫尔/施密特：“14点。那时再谈财务问题和付款办法。好了，阿德勒先生，这样做行吗？”



阿德勒(心满意足):“行。”

疑心打消了。贪婪使他欠考虑。

8月8日,星期四,12点。

阿德勒叫一个土耳其司机临时帮忙驾驶他的280SE奔驰车送他到杜伊斯堡—布鲁克豪森去接见他的送死队。

他不让汽车直接停在狄塞尔街,而是停在交通要道威廉皇帝大街拐弯角上蒂森炼焦厂的对面。他的豪华型高级轿车在这个贫民区引起轰动。在窗帘后面,土耳其妇女忧心忡忡地向外窥视,可能在担心又在计划拆房子,或者以卫生差为理由强迫居民搬出破旧不堪的房子,然后将其封死。土耳其儿童保持着毕恭毕敬的距离,站在阿德勒的奔驰车周围仔细察看。阿德勒不知如何是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断地东张西望。蒂森厂的烟囱几乎一刻不停地喷吐着滚滚浓烟,一阵微风把煤烟直接刮到离工厂不远的住宅区。人们不仅闻到煤烟,而且尝到它的味道,口中会咬到煤烟末子,有时眼睛火辣辣地作痛。某种硫化物——视天气和一天的时间而有所不同——会使人憋得透不过气来。这个地区的哮喘病人和支气管炎患者大大超过平均数。儿童脸色都非常苍白。有个瘦小的男孩引起我的注意,他约有五六岁,神情显得十分呆滞,没精打采,未老先衰,活象个大人。

虽然在杜伊斯堡市中心区阳光灿烂,这儿却是灰蒙蒙一片,光线暗淡;在工厂的滚滚浓烟后面,太阳半遮着面,透不过来。我在马路对面一直观察阿德勒,感觉到他在这儿多么不舒服。狄塞尔街及其周围地区在他眼里,是下等社会,是地狱的边缘。对他来说,真正的地狱就在由蒂森厂卫队守卫的栅栏和围墙里面。那里的空气更加叫人受不了,还有轰隆隆的机器声。

阿德勒从来还没有走错路，跑到我们进行生产的地方去过。看到这些，他脆弱的神经会受不了，最后还会做恶梦。

阿德勒穿着他那套考究的西服，在这个环境中显得很协调，近乎奇装异服，虚假，就象这个地区竞选招贴画上衣冠楚楚的绅士。这些招贴画长年累月贴在那里，因为到这个地区为消费品大做广告得不偿失，啤酒和香烟广告则是例外。

我们的“全部人马”由6个土耳其朋友组成。我向他们交了底。使我奇怪的是，他们对这项代办业务的性质、目的和意义以及阿德勒的丧心病狂并不象我那样感到吃惊。他们已经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多年，经历过种种事情。为了不使我们之间产生太大的隔阂，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是德国人。否则这又会使阿德勒发觉而产生怀疑。

我从平行的一条街把这一群人带到狄塞尔街家中，没有让阿德勒看到我们，然后再去接阿德勒。他本来想让“手下人”——他这样称呼他们——到街上来见他，可我说：“不好，太危险，因为有人没有证件。”我这样说就为预期的收场埋下伏笔，不过这是后话。

“既然不得不如此，”阿德勒说，并向狄塞尔街10号走去。楼道里弥漫着一股尿臭味。厕所都在住宅外面的过道里。有一条下水管道堵塞了。阿德勒三步两步就登上楼梯。我打开一层和二层中间阁楼的门，向他表明我的土耳其友人已准备好待命出发。

“你们好，”他进屋时简短地说，瞟了大家一眼并清点人数：“二、四、六。很好。好吧，大家听着。嗯——你们全懂德语吗？”

“是的，大多数人都懂，”我骗他说。（这就让他费心作一次短短的讲话，从而使他更加暴露。）

“我们是奥伯豪森一家安装公司，”他自我介绍说，“我们接到一项任务，在维尔加森核电站进行修缮工作。这需要两天时间，我们需要五六个人。我们挣的钱不少，你们也能挣不少钱。好吧——如果还有问题，尽管问吧。我立刻回答所有问题。”

他显得坦率直爽、和蔼可亲，谁要是从来没有进一步和他打过交道，可能起先会对他产生好感。为了使他能更多地表演，我事先已跟土耳其朋友讲好，让他们用土耳其语提问。我（阿里）——对土耳其语可说一窍不通——就“自由地”进行翻译，也就是说，由我向阿德勒提出当时我认为重要的问题。迄今他也从来没有注意到我和土耳其伙伴从来不用土耳其语交谈，我讲的德语根本不象一个外国人所讲的那种典型的外语德语。我使用部分罕见的概念，干脆只是删去词尾，例如不是说 Prellung，而是说“Prell……”，或者用“Begeg……”代替“Begegnung”。通过一些复杂的成语，有时我也能套出他更加明确的说法。他一点也没有察觉，因为对他来说，“他手下的外国人”只是会干活的牲口而已。只要他们忍气吞声地为他当苦力，他绝不会对外国人怀怨恨情绪。相反，他是少数真正赏识他们的人之一。只有在他们竟敢大逆不道，索取他们早该得到的工资的时候，他才骂他们是“流氓，无赖，瘪三，懒鬼”。

“这个土耳其同事想知道，我们怎么去？”我问他。

阿德勒向我们推销这次维尔加森之行，就象一位广告宣传员推销一次备有咖啡点心招待的免费旅游。“统统免费，”他说，“3点钟有大轿车到杜伊斯堡火车总站接你们，两天后也有车把你们送回来。住宿免费，伙食免费，统统免费。”（这时我又想起他喜爱的那首庸俗的流行歌曲及其叠句：“……远离故土，失去法律保护，一百个人，我在其中。”）

“这个同事怀疑，”我对阿德勒说，“是否告诉他，为什么500马克——这么少活给这许多钱？”

于是阿德勒便一五一十地从头讲起：“好，你们听着，是怎么回事。你们熟悉德国。我们有各种发电站。其中有一个核电站，现在需要我们去干活。这个电站目前停止供电，对设备进行检修。在检修过程中发现**有些东西**需要修理。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搞完，因为下周他们又得供电。还有，举例说吧，核电站出了一点小毛病，这事不能登报，否则绿党<sup>①</sup>马上就会跑来，等等。然后，他们实际上就会迫使核电站停产，哼。”这时他的声音中含有不加掩饰的厌恶语气：“德国就有这种政治团体……现在必须做这些工作，以便使发电站下周又能供电。为此他们支付**一大笔钱**，你们也**该挣一大笔钱**。”

“阿德勒先生，”我（阿里）继续提问，“这人说，德国人总是欺骗他们。”

阿德勒听了一愣；为了赢得时间，他先装傻：“你说什么？”

“他说德国人总是欺骗他们。”

“可我有没有欺骗过你？”阿德勒反问道。

可惜这时不是向他摆他的欺骗行为的合适时机，他还拖欠我将近2000马克，在有些工作中诈骗别人的工钱，把一部分工资税和社会公共福利税塞进自己腰包，“等等”！

“您是否自己再对他们讲讲您给土耳其人什么，”我说，为了掩饰这难堪的局面，使他下台。这一句话正中他下怀。阿德勒摆好姿势，让他的新司机把火递给他，乘机机会可以把自己描绘成被侮辱、被蹂躏、受到他和他那一种人剥削的人的救命恩人。这个到处伸手，能拿就拿，剥夺他手下许多人的健康

<sup>①</sup> 联邦德国的一个政党，主张保护自然环境，反对利用原子能发电。

和生存基础的阿德勒，现在自我标榜为“给人工作的人”<sup>①</sup>。

“我从独立经营以来就和土耳其同事合作共事。至今他们还从未撂过挑子，等等。我和他们处得总是很好，和德国同事则相反。我也认为，我也愿意继续这样下去，我要继续和土耳其同事合作，给他们工作。”

自己捞钱，叫别人拼死拼活地为自己干活，他称之为“合作”。“同事”这个概念也含有“劳资合作”的积极意义，其目的是使被敲骨吸髓的人听上去犹如一贴镇痛剂。

“他们中有几个人要被赶回土耳其。”我把他往这个题目上引。

“哦，这可没有必要，”他慷慨地说。“我们不用德国人，老实告诉你们吧，因为他们乱说。他们到处传话等等。你们呢，我了解土耳其同事，你们嘴严。明白了吗？因此我不要德国人。德国人就别提了。”

“那个阿特，”我指着—个土耳其伙伴说，“住地下室……”

阿德勒摆摆手打断我的话：“好吗。行。O.k.没关系。我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可以帮帮忙。”我抓住不放。

于是他又注意树立自己的形象，如同战后大多数企业家—样：“帮忙，当然可以。我很乐意帮助最贫穷的人。我自己从来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社民党党员。我是为工人办事的。比方说，我们想要帮助那些现在需要挣几个马克的人，要是他们以后必须回土耳其，你们就有了500马克或者什么……你们又多挣了几个马克，是吧。”

我（阿里）指着土耳其伙伴西南说：“他问这活是否危

<sup>①</sup> 德语Arbeitsgeber（直译：给工作的人）有“雇主”的意思。这里突出“给”字，以衬托上文的“拿”字。——译注

险。”

又是给阿德勒的提示。他的讲话足以为核电站的任何一位新闻发言人增光：“不，并不危险。那是一座大型核电站，安全装置非常严密，就象德国所规定的。德国的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有好几千人在那儿工作。根本不存在什么危险。”

我(阿里)：“还从来没有出过事吗？”

阿德勒：“德国核电站还从未出过事。”

谈到核电站，他的话甚至可能符合事实，虽然在维尔加森核电站附近曾经坠毁过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倘若这架飞机撞在电站上，很可能会造成一次其规模无法想象的灾难。不过，在核电站发生的事故中常常有人员伤亡，联邦德国核动力工业也正式承认迄今已有5人死于事故。

对阿德勒来说，反正这工作是“不危险的”，而且也不累，如同他所说的。我(阿里)想知道：“他们是否得登高？”他支吾其词：“不，这是，嗯，这是发电站，我不清楚，可全都是大楼，是吧。”

我(阿里)：“他还想知道具体干什么活？”

阿德勒：“那是修理活儿，钳工活儿，轻松的钳工活儿，轻松的修理活儿。不过这些活都得有人去干，因此需要五六个人。我们计算过，只能这样办。我们得有五六个人，才能在两天内完成。那儿得派人去。那儿有安全装置。是啊，那儿首先关怀的是人，这你们也会看到的！”

他还进一步发挥，更加掩饰他的骗人勾当和草菅人命做法，这在他自己听来一定也是闻所未闻的：

“在那儿工作的人不会出什么事，当然不在话下！安全装置十分严密。一座核电站即使停产，当然也会有放射性。不

过人们会告诉你们能走多远，到了那儿会马上把你们撤回来的。不能让人的健康受到损害。这一点你们自己也会看到的。我认为，不然你们也可以说嘛，不然我们就不干了，等等<sup>①</sup>。这你们自己也会觉察的。只不过，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干活，我们给工钱，以后就别再提了，不要去谈论出故障什么的。可见核电站对此极为重视。当然要做到：完事——大吉！一直到下一次。我们常接到这类委托。必须绝对保密，闭口不谈，埋头干活。完事——大吉！这样就能挣到钱！全都明白了吧。今天中午我们出发，最迟星期六下午干完，再把你们送回杜伊斯堡火车总站，你们回家去，这事就算完了。你们拿你们的钱，我们就不再提这件事。这不合情合理么？”

我的土耳其朋友难堪地沉默不语。演戏的兴致不知在什么地方消失了。

正如所有某种工资级别以上的狡猾骗子一样，阿德勒一再地申明他言而有信：“我雇的人都能领到他们的钱。只要我们说定了，那就绝无问题。明天就先发250马克，等干完活以后马上再付250马克现金。我的司机阿里跟你们一起去，负责照料你们。你们都听他的，他也担保你们一定能拿到钱。”

他又强调了一遍德国核工业如何完美无缺，如何对人关怀备至：“工作服由他们提供，还有劳动鞋、头盔等等，什么都有。再说一遍：别多嘴，尤其不要和记者谈，否则……”

他煞有介事地从钱包里抽出一张50马克的钞票，一面递给我（阿里）一面说：“好，现在我给你50马克，让小伙子们还能吃点什么。他们肚子里得有点东西，加点油，才不至于干完活就趴下。明白了吗？”他在往外走的时候（摆出慈父般神气，以

---

<sup>①</sup> “等等”是阿德勒的口头禅。——译注

恩人自居)又说：“好，回头见，小伙子们。3点钟再见。我可以放心了吧！全都明白吗？”

50马克由7人分，每人可以得到价值7.14马克的临刑前的最后一餐。

我又想起他爱听的那首蹩脚的伤感歌曲，他坐车时老放这盒磁带。歌词里有“命令”和“无人愿走的路……”还有“一天复一天，谁知何处去。一片焦土，有何意义？”然后是不断重复的副歌：“不受法律保护，我也在内。”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暗示十分明显，这首歌才成了他的心爱歌曲。他对歌里的激情完全无动于衷，只是玩世不恭地听听。

下午2点，阿德勒与核电站特派代表施密特及其助理汉森在杜伊斯堡车站餐厅会面。

他们再次把所有的细节说得清清楚楚，以免阿德勒以后借口没有听清楚或不属于他管而开脱自己。

赫尔措格/汉森：“阿德勒先生，今天上午我们取到了新的实测数据。它们甚至超过了我们所担心的最坏情况。这次行动将十分困难、非常棘手。那些人要钻进去的管道里有辐射……”(看看邻桌以防别人听见，悄声说)：“您的人一下子受到的照射，相当于年允许限值的30倍。这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阿德勒：“比方说，如果不这么干，那又会怎么样？”

赫尔措格/汉森：“那我们就无法并网送电。这可不行！这会把管道全给毁了。停产损失将达几百万、几十亿马克。”

阿德勒：“是啊，没办法。必须让他们钻进去干。”

然后又自我安慰：“桌面上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向我要人，我就给人，然后他们登上车，你们把他们送到维尔加森。对我来说，这事其实就算了结啦，完事大吉。我并没有犯法。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些人不会提出很多问题，他们连维尔加森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所关心的只是“money”①、“black”、“cash”②和“不纳税”。

阿德勒：“我想知道怎样拿到我的钱？由电力公司出帐吗？”

帕赫尔/施密特：“这不直接正式入帐，否则我们也就不会这样保密……”

阿德勒：“做这种生意，我当然也得考虑考虑。我帮你们，就这么说吧，渡过难关。那你们也可以照顾我，全部款项都不入帐。”

帕赫尔/施密特：“这是专款。根本不入帐。”

阿德勒(贪婪地)：“我说，其余的款子你们怎么支付？支票还是现金？”

帕赫尔/施密特(仍不松口)：“一半现金，一半转帐支票。”

阿德勒：“是电力公司的支票吗？”

帕赫尔/施密特：“不是直接由电力公司出面，通过第三者。”

阿德勒：“可别让财政局以后听到风声！”

赫尔措格/汉森：“您和当局是否有过麻烦？”

阿德勒：“没有，您知道，只要您履行义务就没事儿。我也总是拿到医疗储金会和财政局的结清证明，劳动局甚至正式派人检查过我。(笑)他们只想挑毛病。只要你交税还算按时，他们倒也不会来找你麻烦。”

赫尔措格/汉森：“您的人员如果出了工伤事故，您是如何

① 英语：钱。——译注

② 英语：现金。——译注

处理的？您能对付吗？您要明白，我们可不愿他们事后去看医生什么的。”

阿德勒：“这会得到处理的。我的客户不会受连累。这根本不会出现在事故统计表里。前不久我们在鲁尔化工公司遇到一次事故。客户与此毫无关系。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马上会倒下吗？”

赫尔措格/汉森：“要是有人晕倒在里面就麻烦了。那里面大约有10米远。”

阿德勒（毫不在意）：“能不能用绳子什么的再把他拉出来？”

赫尔措格/汉森：“得试试看，可是非常困难。管道有个大弯。我们得注意别让大块头进去干。”

阿德勒（使他放心）：“不，他们都不胖，都是些穷光蛋，饭都吃不饱，瘦得象排骨。”

赫尔措格/汉森：“但愿他们不会马上就晕倒。纯粹从辐射技术来看，我们的经验是：倘若受到强烈沾染或照射，最早在四星期后——不过那时他们都已离去——会出现急性辐射损伤症状：掉头发、阳痿、呕吐、腹泻、全身虚弱，等等。至于远期损伤，我们反正无法检查，等到多少年后出现癌症，那时人们早就把这次出工忘了。”

阿德勒：“我认为，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不会吓懵的。我可不会吓懵的。我完全沉得住气。工作就是工作，我理解核电站有些事情不必向公众透露，当然啰。这是我的事，每一个人都干自己的事。”

赫尔措格/汉森：“嘿，在咱们之间说说：维尔加森是一堆废铁。”

阿德勒：“是啊，我知道，有年头了。——您是否就是几年

前和我打过一次交道的那位汉森先生？”

赫尔措格/汉森(故弄玄虚):“那您就别以为那就是您眼前的我!”

我(阿里)走到他们的桌子旁边。

阿德勒:“哦,他来了。这是阿里先生,他负责照看这一队人。”

对我:“明白吗?这两位先生说的话就是指示。”

还说:“小伙子们都准备好了吗?”

我(阿里):“他们问个没完,什么都想知道。他们有时象小孩,问个没完。有人认为他们得去跟恶龙斗<sup>①</sup>……非常危险。”

阿德勒:“哪有此事,核电站是安全的,世界上最安全的。今天上午我也对他们说过。安全装置,统统都有。”

“全都明白,”我说。阿德勒打发我到那支“队伍”那里去,他们这时一直在车站广场上等着。

我走了以后,阿德勒对核电站代表说:“他当然不知内情。他是他们的代理人。他说行就行。他负责维持秩序,让他们好好干。他们象孩子一样。他们既然要问,也就想得到放心的答复。”

赫尔措格/汉森想知道“阿里”是否“靠得住”。这给了阿德勒机会,再次把自己标榜为乐善好施的人,胡吹一通:

“这个可怜虫,您知道,我是一年半以前把他召来的。您知道,为了餬口,他干什么来着?”

帕赫尔/施密特:“不知道。”

---

① 这个典故出自德国著名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尼德兰王子齐格弗里德和巨龙斗,将它杀死。“和恶龙斗”的意思就是要完成艰巨危险的任务。——译注

阿德勒：“给什么搞试验的医生去当试验品。他们给他打针。

赫尔措格/汉森：“是在土耳其吗？”

阿德勒：“在这里！在德国。竟有这种事情，真叫我无法理解。他们用动物做试验，就已够糟的了。”

赫尔措格/汉森：“他去干这个了？”

阿德勒：“他干了！他到我们那儿去的时候，走路晃悠悠，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就对这事进行调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大夫又给我打针了，我每星期挣 800 马克！我说：现在可别干了！这简直不象话！老弟，现在别干了！他可是个好人。”

赫尔措格/汉森想知道：“您究竟是怎么具体对他们讲的？”

阿德勒如实地报告执行情况：“他们去核电站，有紧急任务，事关紧要，使核电站能重新供电，这件事要保密，别让报纸什么的大肆宣扬出去。我说：那儿采取防护措施，德国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当然啰！你们会领到防护服，你们什么都有，你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帕赫尔/施密特：“条件是：他们在今后两周之内要离开此地……”

阿德勒：“在今后两周之内他们就不在此地了。”

帕赫尔/施密特：“远走高飞！”

阿德勒：“行！尤其是，我没有很多管理人员，我这儿谁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是唯一的知情人，这样也不错嘛！要是我办什么事还得先通知 10 个人——这种事还是不干为妙。总之，你们可以相信我。我们什么都干！”

“我们什么都干”，是阿德勒和工业与建筑业大康采恩大

多数其他的合伙人和人贩子的指导思想。

“我们什么都干”<sup>①</sup>是资本主义的口号，不过应加上一句：“凡是有利可图的事。”如果说，除了第三帝国的试验（利用被杀害的集中营囚徒的尸体，每具尸体可获得价值 11.5 马克的脂肪和骨胶）以外，至今还没有把人熔化去制造肥皂，这并非由于人道的原因，而只是因为用人体制造肥皂划不来。

阿德勒同施密特、汉森一起离开车站餐厅，去把“队伍”送上所等候的大汽车。

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把这次测试进行到如此地步，搞一辆大轿车开到维尔加森去。那样的话，第二天阿德勒就会象他所说的那样到那里去收取他的一半“酬金”（“cash”/“black”）。有一阵子，我曾考虑让他大吃一惊，亲自去感受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艾希曼<sup>②</sup>也从来不曾亲眼见过堆积如山的尸体，他“仅仅”负责把那些仍然活着的人运往大规模灭绝营。我曾打算晚上在维尔加森“转弯处”旅馆的一间小房间里把几个

① “我们什么都干”是克虏伯康采恩的广告用语。按照这条格言：“我的宗旨是，为国家培养许多忠实的臣民，为工厂培养有特色的工人。”后来这些臣民表现得如此出色，在 1914 年投入一场战争，被上面刻有 KPZ（克虏伯专利定时炸弹）字样的英国榴弹炸得血肉横飞。克虏伯就这样发了双份战争财：从阵亡的英国兵和死去的德国兵身上发财。对每个阵亡的德国兵，克虏伯从英国军火康采恩威克斯那里获取 60 马克的牌照费。德国战败时，克虏伯的财富增加了 4 亿金马克，后来在 1933 年前又及时将 4738 440 马克花在准备新战争的希特勒身上。哪里有利可图，克虏伯就到那里去捞，不管大小，从阵亡将士和苟延残喘的数万名强迫劳动者身上牟利。这些人一部分就住在狗舍里，还不如奴隶。在克虏伯各车间的外墙的牌子上写着：“奴隶就是奴隶！”——原注

② 阿道夫·艾希曼（1906—1962），法西斯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1939 年起任保安总局犹太处处长，1941 年把大批犹太人送往灭绝营。战后逃往阿根廷。1960 年 5 月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送至以色列，1961 年 12 月 11 日被判处死刑，1962 年 5 月 31 日执行判决。——译注

“受到辐射伤害”的土耳其朋友指给阿德勒看。由化妆师精心化妆：他们脸上“皮肤”一片片脱落，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下，麻木不仁地躺在床上和地板上。

这样也就够清楚的了。所缺的仅是结局，这个结局不能使阿德勒怀疑这里是在演戏，最后促使他——在消灭痕迹和销毁罪证之后——逃往国外。

最好是让这一切象一个鬼魂一样在他眼前重新消失。就象那个瓶中魔鬼，被放出来后又叫他变小钻回瓶中，然后——塞上瓶盖。

阿德勒、汉森、施密特和我(阿里)正向他们的“队伍”走去，准备把他们装上车去送死的时候，突然来了“便衣警察”。他们出示了证件，要检查身份证。两个土耳其人仓皇逃跑，其他人暂时被“押走”。这一切进行得非常之慢，犹如一次首次即兴排演。这一定会使阿德勒象在恶梦中观看电影慢镜头那样惊心动魄。

当时还出了一个几乎造成严重后果的差错。原来负责扮演巡逻便衣(为保险起见还配备了手铐和玩具手枪)的两位朋友——一位是中学校长，一位是新教牧师——中的一位把阿德勒误认为偷偷拍照的摄影师冈特·青特，走过去向他问候。帕赫尔/施密特反应很快，随机应变。他介绍说：“这是我们核电站的保卫人员，负责这次特别行动的安全保卫工作，以防万一。”阿德勒赞扬道：“组织得真不错。”只是现在如何收场？我跟土耳其朋友商量，能否让真警察来把他们抓走。有几个身上未带证件，不过，要是他们真被带到警察局去，这只会使一切变得更加逼真。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便打电话给警察局，一五一十地叙述

在什么地方正在同非法入境的土耳其人做人口交易。5分钟后就开来了两辆便衣巡逻车，从车上跳下6名警察，向那一群土耳其朋友走去。正在这时，他们看到了摄影师冈特·青特正在15米远的地方用望远镜对准他们。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跟自己联系起来，以为——后来我从杜伊斯堡刑警队那里非正式地打听到——某家杂志给他们设下了圈套，以便证明只要有人告发，就可以多么轻率以及采用何种方法逮捕外国人。于是他们回到自己车上开走了。

现在我们又象刚才一样无计可施了。时间紧迫。

由于“核电站汽车”一直还未来到，阿德勒变得心神不定。我们这一群人中的西南的女友盖西内想出了一个急救办法。她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大学生酒馆去找来两位客人，匆忙之中当然不可能把详细情况告诉他们。我们只对他们说，请他们帮忙搞一次假逮捕，旨在揭露人口贩卖行业中的一条大鱼。他们同意了。后来知道，其中一位是绿党的市议员。

他们以相应的反权威的态度客客气气地“逮捕”了我们的土耳其朋友。与现实生活中的粗暴做法相反。他们把我们的朋友“带走”时的的确确搂着他们一起走。可是，如上所述，阿德勒却大惊失色。

阿特进行反抗，胳膊被拧到背后，我（阿里）跟在后面跑。阿德勒一直还不愿相信这笔生意怎么会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化为乌有，心惊肉跳地质问上气不接下气往回跑的我（阿里）：“这是怎么回事？”

“警察，”我只是说，“抓人，因为没有证件。”这句话非常灵验。阿德勒稍许缩进脑袋，向四周张望着，一面迈着快得惊人的步子，作出明显的逃跑动作，走向他那停在公共汽车站前面

的奔驰车，步子虽快而不至于象在逃跑，大概为了不引人注目，而且不因此而失身份。

他干脆撇下他的客户，让他们站在大街上。帕赫尔/施密特还尾随着他，要他说明：“出了什么事，他们干吗都跑了？这是怎么搞的？您不是说过这事靠得住吗？”阿德勒并没有停止逃跑，一面走一面气喘吁吁地说：“没错，全都靠得住。您马上给我汽车里打电话。”他跳进立即开动的汽车时，帕赫尔/施密特还从背后对他喊道：“阿德勒先生，我们需要您的合作……”

## 尾 声

### 或对罪行轻描淡写

为了使一切善始善终，帕赫尔/施密特当天晚上又打电话给阿德勒。阿德勒在电话里（有点尴尬，企图大事化小）：“是啊，施密特先生，今天中午竟有这样的事。”

帕赫尔/施密特（用强烈责备的口气）：“是啊，您这是怎么搞的，阿德勒先生？”

阿德勒：“是啊，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帮家伙不怎么干净。我对他们也不十分了解。”

帕赫尔/施密特：“不知您打算如何解决？”

阿德勒：“是啊，您听着，现在我已安排好了，我向你们另外派人。”

帕赫尔/施密特：“不，这已经不行了，阿德勒先生。您现在不必再管此事了，我们现在自己已经安排好了。这事必须在明天 18 点以前了结，这我们已向您讲过。我们还认为您是个老手呢，阿德勒先生。”

阿德勒（为自己辩护）：“那六人中只有两人……”



帕赫尔/施密特(打断他的话):“两人,两人,您知道,六人中有两人,这是百分之多少?”

阿德勒:“知道。”

帕赫尔/施密特:“您自己算得出来,阿德勒先生,这是1/3,阿德勒先生,1/3,这是33.3%,您懂吗?”

阿德勒:“是的,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帕赫尔/施密特:“是啊,现在我们怎么办呢,阿德勒先生。我们有两人负责保卫工作。我们方面万事大吉,我们的大轿车来了,而您倒坐上汽车跑了。您甚至都无法解释清楚。下一步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全得重新安排——不用您参加了,再见!”(咔嚓一声把电话挂上。)

半小时后我(阿里)打电话给阿德勒。

阿德勒立即对我(阿里)展开进攻:“你给我找的究竟是什么人?真是一群混帐王八蛋!”

我(阿里):“可我对您说过,那两个住地下室的人没有证件。警察把他们带走了。”

阿德勒(幸灾乐祸地笑着):“是的,我看见了。”

我(阿里):“其他人要钱。他们没有责任。把别的工作放下,现在分文未得。”

阿德勒(鄙夷地):“现在他们也真不要脸起来。告诉他们,这件事吹了。什么也没有。”

我(阿里):“可您说您要帮助他们!”

阿德勒:“不错,不过他们先得干活呀!”

我(阿里):“警察去过狄塞尔街,想要了解全部情况。我不在。现在要我去交代……”

阿德勒(打断我的话):“嘿,你当然不能说出我的名字!我不愿,我不能被牵连进去,明白吗!”

我(阿里)(天真地):“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阿德勒:“比方你可以说,有一位摩勒先生或其他什么人,他答应给工作,于是你就找了那帮家伙。这……”

我(阿里):“他们要是问此人的长相呢?”

稍停片刻。

阿德勒:“什么也别提——就说你不知道!”

我(阿里):“什么也不知道?”

阿德勒:“你装作什么也不懂。最好说你不懂德语。”

我(阿里):“行。谁还能帮伙伴们做些什么?”

阿德勒:“对那帮家伙不行,对你可以。咱们以后再说。我的委托人也许很吃惊。他们也许很恼火。真是乱弹琴!——总之,有人来问你,你就说是摩勒先生或杜伊斯堡什么人……他住哪儿,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办公,你也不知道。这是你安排的,想给他们找一点活儿干。”

我(阿里):“我说不说原子的事?”

阿德勒:“哦,不不不不,千万千万别说!”(接着笑着说):“他们现在抓住谁了?”

我(阿里):“住地下室的两个人。现在他们得被赶回土耳其去。”

阿德勒(沾沾自喜,乐滋滋的,同时放下了心):“被送回土耳其,可怜虫!他妈的,有这种事!在火车总站那儿竟有那么多警察,我真没有想到!”

我(阿里):“可是您特别交代过在火车总站集合。”

阿德勒(带责备口气):“要是你事先跟我说一声,我们会换个地方。”

次日,8月9日,星期五。

阿德勒让他的新司机、阿里的“兄弟”阿卜杜拉 10 点钟去接他。他到周围较远地区的几家银行去，心情舒畅地记下了户头上的进项，又到雷梅特公司去领取了他的那一份赃款，在汽车行驶过程中跟他的新司机聊了聊他眼下的心事。

阿德勒：“供货期限简直长得要命，得提前一年订货，才能及时得到新型号。”

不惜任何代价求得增长，一直还是资本主义的信条，尽管已不是疯狂扩张和爆炸性增长。“不进则退”是古往今来一切军事统帅、征服者和资本家的座右铭。阿德勒的谦虚程度符合总的经济情况：“我要把 280SE 换成新系列的 300 SE<sup>①</sup>。到秋天就换。到那时，现在这辆车就已有一年半的历史了。”（现在这辆车连同全部附加设备和多余装饰在内，价值 10 万马克左右。新车将大大超过此数。）

阿卜杜拉（引阿德勒谈这个题目）：“那两人现在正在蹲监狱。”

阿德勒：“他们很可能被驱逐出境。我很同情这帮家伙。可是另一方面，我想对你说，也许这样对他们更好。他们呆在德国有什好？又不能自由行动，不是吗？”

阿卜杜拉：“此话不假。土耳其天气好……”

阿德勒：“是啊，他们呆在这儿干什么呢？他们住地下室。老是害怕警察。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一无所有。”

阿卜杜拉：“也没有工作。”

阿德勒：“他们在这儿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阿卜杜拉：“阿里现在当然有点伤心。”

阿德勒：“是啊。全吹了。我们真不该在火车站前面集

---

① 280SE和300SE都是奔驰车的型号。——译注

合。应当到别处去集合。——真他妈的！总站前面老是有警察跑来跑去。”

阿卜杜拉：“问题就出在这儿。”

阿德勒：“对，对。”

阿卜杜拉：“您看是否还会从那儿得到委托业务？”

阿德勒：“从他们那儿总会有的。我早就在维尔加森干了，年复一年这样下去……”

阿卜杜拉：“他们给的钱肯定也很多吧？”

阿德勒：“是的，我们总是从他们那儿得到委托。我们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目前他们很恼火。糟糕的是，我的客户是个很讲信用的单位。只是有时他们那儿的活并不是那么地道。他们也怕，比方说，如果这事被报纸宣扬出去，说核电站出了事故……”

阿卜杜拉：“他们更怕。”

阿德勒：“他们更怕。”

两人都笑起来。

阿德勒：“他们马上就溜了，哈哈。他们更是吓得要命。通常只有持有有效的辐射证的人才能进原子能发电站。这是国家的规定。发电站领导却说：去他妈的。我的人就这样进了电站，没有辐射证。这已经是违法行为！所以他们得小心。违反了德国的法律，因此他们也怕警察。”（笑）

阿卜杜拉：“可他们对此付给的钱当然不少，是吧？”

阿德勒：“他们对此付给的钱不少。他们犯法，我们对法律也马马虎虎，懂吗？这样就能多挣钱。就是这么一回事。要是德国政府知道他们所干的事情，包括现在他们正在干的事情，他们就会倒霉！”

真他妈的。每天都净是新的料想不到的事情，你信吗？”

(笑)

阿卜杜拉：“伙伴们被抓走的时候，我兴许是害怕了。”

阿德勒：“有个警察同时抓住两个人，这样，是不是（比画）。也许我也会在那儿被带走的。他们会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处在我的地位，是不能冒这个险的。我不想同警察等等打交道。”

阿卜杜拉：“比方说，在我们土耳其就没有这样的法律。”

阿德勒：“我知道。那儿要自由得多。可这儿就是这样，对于任何屁大的事都要制订一条法律。你动不动就会又触犯了一条法律。老兄，这儿是德国，别忘了这一点。他们盯得可紧啦，这事在这儿罚得可凶啦。如果这件事败露出去，核电站总经理起码要蹲一年监狱。情况很不妙。所以他们也很小心，不让自己受牵连，保持手脚干净……”

我反正不会出事。要说有人触犯了法律，那就是核电站的人。是他们触犯了法律。

他们对我说：我们需要6个人进行抢修。我说：O.k.，可以给你们人。至于你们用这6个人去干什么，我就知道了。你们不办辐射证之类的证明就让他们进去，那是你们的事情，不是吗？”

阿卜杜拉：“我对此一窍不通。”

阿德勒：“算了，我们又长了一次见识。下一次无论如何别去火车总站集合。嘿，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他妈的！”

作为有可能发生的核电站严重事故的缩影，这出戏已演完了。在现实生活中也许已有过规模更大的类似的或更加恶劣的代办业务。这次演出如果有助于唤起人们注意，促使公众和大众传播媒介增强对这些秘密天地的监督，那末我们的

心血就没有白费。这里问题不在于阿德勒这个人。就其犯罪能量和想象力而言，他只是个平庸之辈。把他说成是十恶不赦的恶魔就大错特错了。他只不过是这个蔑视人的尊严、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的制度成千上万个帮凶和受益者中的一个罢了。